

炎黄春秋



关于解放初刘少奇“天津之行”
葛佩琦“大右派”的“铁案”
是怎样翻过来的

郎平回国意在重振女排雄风

李小龙、成龙
“双龙”挑战好莱坞

台湾归来祭陵人

不做闺秀做战士
的陈学昭

4
96



陈学昭

敬我人文始祖 爱我中华文明 把黄帝陵 整修得更加 庄严肃穆



座谈会主席台



李瑞环(中)、王光英(左)、程思远(右)出席座谈会



出席会议的顾问和各界代表

始于1992年的黄帝陵整修工程,已使庙前区大为改观,新建的轩辕桥,再现的“泪水月夜”,把陵区烘托得更为雄伟、古朴、肃穆。1995年来谒陵的海内外同胞已达到40万人次。

3月18日,黄帝陵基金会成立三周年暨整修黄帝陵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黄帝陵基金会名誉会长李瑞环出席并讲话。他肯定了陕西省和黄帝陵基金会所做的工作,同时指出,黄帝陵的现状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不相称,希望有关部门抓紧做好整修工作。李瑞环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通过黄帝陵整修工程,可以让人们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以振奋精神,增强凝聚力,从而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帝陵基金会名誉会长王光英、程思远和基金会顾问、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曾为整修工程捐资的省市政府和企业的代表出席座谈会。

黄 商报道 陈 林摄影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镒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 (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 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飞龙无线电电讯发展公司
深圳市基建基础工程公司

理 事: 孙敏伟 宋晓洛

秘 书 长: 徐 孔

副秘书长: 段向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天津街 7 号

邮 编: 100802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 11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杂志社电话: 6170955

定 价: 4.00 元

目 录

专 稿

- ②关于解放初刘少奇的天津之行…………… 陈英茨

求实篇

- ⑨葛佩琦“大右派”的“铁案”是怎样翻过来的…………… 戴 煌

殒星篇

- ①⑨谋杀刘少奇的“湘江案”泡汤记…………… 胡 牧

- ②④邹韬奋在日伪鼻子下脱险…………… 王 荫

赤子心

- ③⑩郎平回国意在重振女排雄风…………… 周 童

- ③④李小龙、成龙“双龙”挑战好莱坞…………… 东方舟

春秋笔

- ④②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国民党元老陈诚…………… 左双文

- ④④海外华人学者陈源的一段是与非…………… 吴海发

人海浪

- ④⑥“中国女婿”李敦白…………… 李健民

- ⑤①宋霭龄给孙中山当秘书的日子…………… 名 芳

同心结

- ⑤⑥台湾归来祭陵人…………… 高健中

文荟园

- ⑥⑩不做闺秀做战士的陈学昭…………… 陈伯良

- ⑥④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 陈忠祥

- ⑥⑨开明书店与文化人的情结…………… 王汉华

- ⑦③纪念长征胜利 60 周年 (诗) ……………… 晓 初

古镜台

- ⑦①黄梅案乾隆帝为何出尔反尔…………… 傅 贵

- ⑦④历史上的刘墉…………… 王俊义

九州景

- ⑦⑦山西有个“克难坡”…………… 孙觉民

编读窗

- ⑦⑨《还历史本来面目》等三则…………… 本刊编辑部

关于 解放初 刘少奇的 天津之行

●陈英茨



刘少奇、王光美由天津回香山时摄

鉴于当时天津形势 毛泽东要刘少奇赶紧去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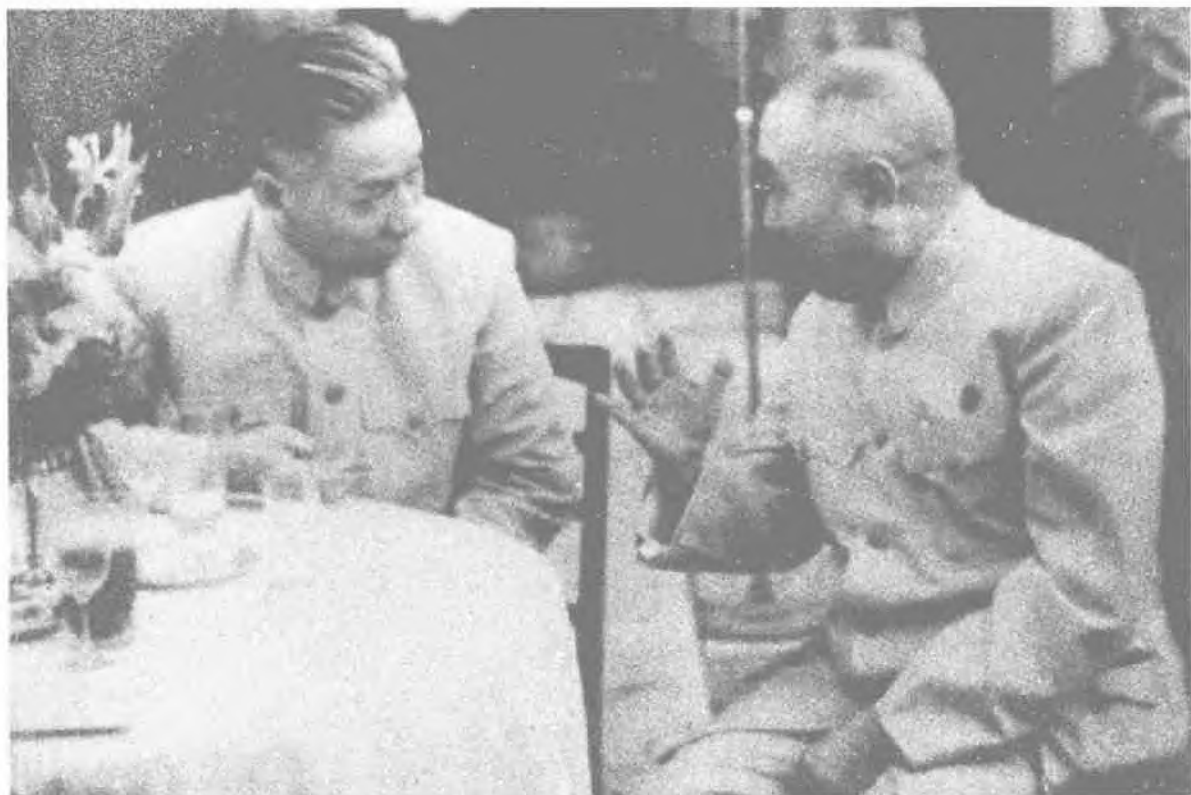
历史一页页翻过，“文革”至今已30年了。如从它的导火线、酝酿和准备的时间来算，则远不只此数。不过，作为一个标志，1966年仍是不可忘记的。而“文革”的目标之一是最终打倒刘少奇，恐也不容争议，这在当年的8月，就已经很明朗了。

作为刘少奇的重大“罪行”，1949年4月的天津之行是其中之一，自然成为“文革”中“批判”的热点和重点。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来龙去脉如何？当时和今天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十几年来，王光美同志作为刘少奇的夫人，从不愿谈少奇的事，她相信刘少奇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因此，她愿让人民来作评说，自己不便多言。笔者因有志于研究刘少奇的经济思想，又得住处相近之便，在往访光美同志时，谈到刘少奇解放初的天津之行，并参考她以前写过的文章，草成此文。不仅希望读者对此事能有个较全面的了解，更望对今天多种经济成分对国有和集体经济的一个补充加深理解。

原来少奇的天津之行，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并要他赶紧去一趟。天津于1949年1月15日解放后，接管工作比较顺利，但由于种种原因，生产的恢复不大好。存在着许多思想和实际问题。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主对党的政策不了解，有的还很担心企业被没收，本人被斗争，绝大多数关门停产，勉强能够开工的不足30%，致使大批工人失业；加上国营企业也开工不足，造成近百万人生活困难。因此，有些私营企业的工人和店员，就自发地起来斗争和清算资本家，吓得资本家惶惶不可终日，有的便弃厂携款外逃了；而有些党员干部，因怕犯右倾错误，对工人、店员的这些过火行为，不敢劝阻，甚至暗中支持，致使整个经济滑坡。

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它的生产恢复得如何，不但对天津本身，对整个华北都有影响。因此使得当时负责平津接管工作的华北局书记薄一波非常着急，两次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说工业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等等问题之外，工作中没有处



1951年7月刘少奇同黄炎培亲切交谈

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是存在的突出问题。

少奇同党中央和毛主席等人，是1949年3月25日乘火车到达北平的，下午检阅了仪仗队后，即乘吉普车到达香山住地。3月26日，少奇便草拟“城市工作提纲”，还重点研究北平市接管后的各方面工作，尤其是恢复与发展生产等经济方面的问题。3月27日，少奇听取了彭真、叶剑英、李葆华（当时还叫赵振声）、薛子正等的汇报，主要是物价、税收、财政、房屋土地、供给制与薪金制以及军管会与联合办事处（与傅作义的）存废问题。28日，又听取了彭真、李葆华、赵毅敏、刘仁、沙可夫和李昌等关于教育经费、教材和校长人选以及戏剧、电影、文艺和宣传等方面的汇报；29日，又主持财经、工会座谈会。彭真、李立三、肖明等同志出席；30日、31日、4月1日，又听取汇报并讨论了党政工作和工青妇以及人民革命大学的问题；4月2日，又约薄一波等谈平津接管情况，一波特别谈了对外贸易问题。4月3日又出席了北平市委会，讲了如何把旧北平变成新北平等问题，也就在这一天，主席让他去天津。师哲同志的《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说，中央机关在香山期间，“刘少奇一进京就离开中央去天津参观访问，拜亲会友，忙作一团”，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天津与北平不同，那

里的大中型私营企业比北平多得多，又是华北地区的金融中心，外贸和航运的港口，公私与劳资关系，也比北平复杂和严重得多。

少奇接受任务后，第二天便到华北局薄一波同志处。光美陪少奇进城，先到了后圆恩寺的华北局。一波向少奇谈天津情况，少奇讲，你写的两次报告我都看过了，今天主要是向你报到，主席让我去天津一趟。一波说，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儿就上哪儿，何必来告诉我呢？少奇说，“这是组织原则。”又说，“我去天津可能呆的时间长些，今后党中央、毛主席有什么指示，望及时转告，我在天津的情况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汇报，有些重要问题请您向中央和毛主席报告。”

临行前，光美向少奇建议回家去看看父母。她说：“父母多年不见了，不知他们怎样惦记我呢？叶剑英同志进城后，给我家打过电话，说我同你结婚了，可他们还没见过你呢？”少奇笑着说，应该、应该，咱们这就去看望他们。

光美的父亲知道少奇是湖南人，特地到曲园饭庄订了一桌湖南菜，那天，恰好她六哥王光英也从天津来到家，听说光美要来，还换了身漂亮的西装。

少奇听说光英在天津办企业，便向他询问工商界情

况,询问天津企业界人士心情怎样?有什么意见等等。还说,他近日就去天津。王光英大略地讲了一些,可能心里还有顾虑,对企业界人士的意见没有多讲。便说,现在南方还在打仗,天津的工厂哪些可做军服,哪些可造子弹,哪些可改做装甲车等。少奇笑着说,仗不会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现在主要是考虑建设的问题了。少奇见光英不肯讲工商界的意见,便有意地先把他所知道的讲了一些。光英见少奇很了解天津企业界状况,便打消了顾虑,也把所见所闻真实地讲了出来。但马上表示自己在大学是学技术的,兄弟姐妹中一半是党员,自己也不愿再当资本家了,想参加革命做技术方面的工作。少奇向他解释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说党的干部很多,专家也有一些,但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如果你能穿着工商界的衣服,却站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一边,那不很好吗?这比当个党的干部作用要大得多了!

天津“三黄”陪同 刘少奇径直下基层解决问题

4月10日,少奇去天津,除秘书吴振英、警卫李树槐外,还特邀请了龚饮冰和卢绪章同行,因为他们长期在白区以银行、外贸等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对金融、外贸很内行,而少奇又很重视这两方面的工作。北平市委的李葆华和张文松也同去,葆华不久就回北平,让文松留下,把少奇每天的活动和讲话等,及时报告北平市委。

列车晚9时到达天津。天津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市长黄敬、市委副书记黄火青以及吴德等到站迎接。随后,少奇一行被安排在近郊小刘庄的一座两层小洋楼住下。

当时,天津市晚上还不断听到零星的枪声。一天晚上忽然枪声大作,黄敬即刻把他们接到市内一座坚固的大楼里。后查明那晚枪声大作是一兵工厂爆炸,便又回到原来住的地方。

当晚,确定了第二天的活动日程,并由黄敬全程陪同。

4月11日上午,少奇等来到中纺一厂,工人们见有军代表陪着,感到是来了大干部,便跟着围观,想多听到点东西,少奇便决定请些工人和职员一起坐下来谈谈。他首先请大家谈谈厂里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大家谈了一些,少奇作了解释,希望工人、职员和接管干部团结协作,把厂子搞好,支援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

下午由黄克诚、黄敬等汇报和研究工作,黄克诚谈了总的方面,少奇表示满意,说“很有成绩”。当黄克诚讲到不少来自农村的干部,现在不适应城市工作时,少

奇说,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尽快适应环境,学会管理城市,不然就误事了。黄敬讲了天津目前劳资关系紧张,资方财产有的被冻结,有的被分掉,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还有的要求分红,造成资金困难和管理上的混乱,我们的干部自然是站在工人一边,一些工厂难于维持生产,有的复工复业都成了问题。少奇立即说,这不行,这是一种“左”的行为,是自杀政策,要抓紧纠正。并说,接收工作做好了,仅仅是开始,只有把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才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那时群众的生活才能真正改善,人民政权才能巩固。他当场和黄克诚、黄敬等商定,军管会下面成立调解劳资纠纷的劳动局,资本家可以到那里反映意见,也可直接到军管会来谈。少奇还要派一流干部到工会去,劳资纠纷严重的企业更要马上派强的干部去。也就是说,少奇是边听汇报,边和他们几位研究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以后也都是如此的。

12日,少奇视察灰堆子纸厂,下午听工商局汇报工商管理 and 物资分配问题;13日视察中央电器器材厂,下午听取市场、粮食管理和金融等方面的汇报;14日视察汽车修配厂,下午听取贸易部门的汇报。这些天工作中,中间很少有休息。一直到5月7日又赶往唐山解决那里开滦煤矿工人正在酝酿罢工的问题。

少奇的天津之行,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大体上讲有民主建政问题,恢复与发展生产问题,经济工作和工会工作、文化教育、文艺、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家的政策等等。

刘少奇阐述“四面八方” 多次强调正确对待民族资本家

少奇认为首先要做好干部的工作。他说政策能否正确的贯彻和落实,主要决定于干部。少奇在天津近一个月,开得最多的是干部会议,市委干部会开了三四次,各系统、部门的干部会不下十次,他每次讲话,总是先讲解、阐述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谆谆告诫干部为完成管理改造、发展天津的任务,必须诚心诚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努力争取知识分子,再就是要尽可能多地争取能跟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他在谈到怎样管理好城市时,指出关键在于理顺“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政权建设要与民主管理结合起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最好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会,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不是苏联的苏维埃,也不是过去的参议会,是人民管理政权。他说,城市的特点是集中,城市是由市政府管理的,主要的是经济工作。贷款找银行,卫生找卫生局。国家机器主要

是警察、法院、监狱。还特别讲了我们党的两个转变。一是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这是重大的历史性的转变，方针、任务都有极大改变；二是共产党过去是从城市转入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又从农村回到城市，由城市领导农村。要充分认识这两大转变的意义和难题。要好好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改正错误和缺点，使我们的各项建设日益完善。为此，他叙述了石家庄、济南和沈阳的教训和经验。说石家庄在接管初期，搞清算斗争，把工商业算垮了；斗争会决定一切，可以捆人打人，没收财产，甚至把人整死；发动妓女斗老鸨，却不查封妓院。人们只看到斗争会，却看不到政府。还把这种无政府状况误认为是一种革命行动，不予制止，反而鼓励支持。少奇说，这既是群众运动中的尾巴主义，实际上又是党和政府在后面发动的。这些在后来纠正了。到以后接管济南特别是接管沈阳，我们的干部就好得多了。少奇说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的同志必须牢牢记取。他还特别强调，要禁止在群众大会上、主席台上以及法庭上喊口号，如“该打不该打？”“该杀不该杀？”这种方式是煽动群众的盲目性，不让群众自己思考，说重些，这是希特勒的一种作法。希特勒就是依靠煽动群众的盲目情绪吃饭的。

少奇说，我们不能什么都靠群众去直接解决，那还要政府干什么？他还说，城市贫民的要求我们不能全部满足。那种“挖穷根”的办法是不对的。“挖穷根”会挖到工商业资本家头上去，挖光了工商业，毁灭了城市，贫民就更没有办法。国家政权建立之后，主要就是依靠民主和法制。决不能再搞什么斗争会之类的东西。

笔者认为，少奇这个思想很正确，可惜没有被接受，干什么都是大搞群众运动，干什么都是大批判会、斗争会开路。民主和法制没有得到发展，甚至连行之有效的党的组织原则之一的“少数服从多数”，也没得到实行，而变成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最后发展到“文革”那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程度。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宣布再也不能搞这种运动，实在是太正确了。

少奇根据当时不少干部在对资本家问题上怕犯右的错误，深入讲解了党对资本家的政策。他说，今天，民族资产阶级不但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相反，是我们团结争取的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在中国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当前我们如果对工人的过高要求和一些错误做法不教育、不制止，或者排挤和打击私营企业，必然使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受到影响。当然，我们并不是主张资本家第一，工人第二，现在的情况是资产阶级在我们这里连第四位也排不上。我们对资本家的重点不是团结而

是打击，甚至在报纸的宣传上也有这种倾向。这样就要犯“左”的错误了。他还说，我们必须分清敌友，我们对资产阶级是又联合、又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今天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而是太不发展。

笔者认为：这正是列宁的观点。列宁在《两个策略》一书中讲过：“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而“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并且说“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我们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比当时的俄国，更少得多、更是发展不足了，所以限制和打击资本主义，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不想少奇同志这个正确的论点却遭到后来那样严厉的批判和反对。

少奇接着还谈到，在英、美、法等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而我们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才几十年。所以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应该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好处多，坏处少。其实，这个话，少奇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讲过：必须重视私人企业恢复生产的问题，但当时并没有引起所有同志的重视。现在真的遇到了这个问题，一些人还是束手束脚。为此，少奇在天津座谈会上还从理论上引证了马克思的话说，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的物质条件形成之前，资产阶级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即使把它推翻了，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马克思选集第一卷171页）。少奇1948年12月在华北财经会议上也讲过：“为什么不是消灭资产阶级？困难很多。消灭了以后怎样？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回来的。”

少奇在津期间，听取了各个部门的汇报，其中，对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尤为关注。例如少奇在听取工商、粮食、外贸、金融等方面的汇报时，说平抑物价必须打击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并且要加强金融管理，同时还需运进和掌握一批粮食和物资，否则物价是稳定不下来的。对他们提出的由政府设立纱布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的想法，明确地给予支持。少奇认为天津市搞好对外贸易十分重要，这不但对天津、对整个华北都有重要影响，因为天津历来就是进出口重要港口。只要我们掌握了进出口贸易权和海关权，就如同掌握了一把钥匙，只要拿到了这把钥匙，开关自如，中国的工业就有了保障，就不怕外货冲击。必须进口的要进口，自己能制造的就不要进口，能多出口的就多出口，不应出口的就限制出口。关税和贸易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就可免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又说，对外贸易也要公私兼顾，要组织对

外贸委员会，也吸收一些对外贸易的资本家参加，有些贸易可允许私人做一部分。并且强调，目前对外贸易第一是出口，第二是哪些东西出口；首先是国家出口，国家不成则私人出口，私人办不成外商办也行。不过要计算成本，适当加税，或者加超额利润税。他还指出要搞好外汇工作，接待好中外海员，创造出良好的贸易环境。

少奇在文教干部会议上发言时，还强调过，由于当前国家经济困难，要奖励私人办学；对报刊工作，他说，不要为写评论而写评论，应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好坏意见都听，不要限制畅所欲言。电影、戏剧和文艺作品，不要审查和限制太严，要让戏班子有饭吃。越是限制禁止，大家反而越想看，只禁止那些政治上反动的和淫秽的。要多创作人们喜闻乐见的新作品，那些没有生命力的，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淘汰了。

重视工人工作 既帮助解决存在问题 又教育大家眼光放远

少奇在天津还着重谈了要把工人阶级教育好、组织好的事。他说由于党的主要力量过去长期在农村，城市的力量较小，因此工人阶级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这些事办不好，就谈不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因此，少奇在天津视察期间，非常深入地了解了工人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并设法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失业的问题，他说，这些问题不能完全解决时，要搞好社会救济，开展以工代赈。先解决吃饭问题。他在天津职工代表会议和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称赞工人阶级在天津解放、接收和恢复与发展生产中作出的贡献，代表中央向职工代表致热烈敬礼。并说，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就是你们的党。党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解放而奋斗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共产党只有依靠你们，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没有工人阶级，党就失去了依靠。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全国最大多数人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工人要求得解放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要长期的奋斗和努力才能做到。

他说，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还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否则是不能战胜敌人也不能解放自己的。工人阶级有三个朋友，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小资产阶级，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队伍就大了。这个队伍的指挥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要当班长、连长……司令官。这样就可以打胜仗了。我们要分清敌友，不要把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敌人对待。他们是团结对象而不是斗争对象。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又联合又斗争，

但斗争不能过火，不能破坏联合。现在是以联合为主。要注意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少奇认为做好工人的工作，是落实对资政策和改善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在很多场合他都要讲讲劳资关系。他在参观了东亚公司后，就同工人们举行座谈。他说剥削与被剥削，不是人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要说意愿，共产党是主张消灭剥削的。但那是以后的事，目前还不能这样做。这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性，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上海有位资本家向毛主席诉苦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希望把“剥削者”按希腊词典释义改为“利益分润者”。少奇说，这个不行，不在于名词，因为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例如永利公司是用八百元资金开办起来的，现在的巨大资产，是既有剥削、也有利润。剥削是指人和人的关系，利润是指人和物的关系。

少奇在和天津工人座谈时，还批评了一些私营工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一倍，有的还要求两倍甚至五倍，有的要求临时工改正式工，退职的要求复工，还有的不遵守厂规，不服从管理人员的调度等，说这不但将使资本家无利可图，也是做不到的。现在私营厂有很多困难，供销渠道暂时被割断了，产品卖不出去，原料运不进来，还反映税收太重。少奇讲，我们目前还是按着国民党时的税制收税呀，他们讲，国民党时，请次客送点礼，就免了，减了；现在可是实打实的收啊！少奇和工人同志说，如果我们对资本家要求过高，不体谅他们，他们就要歇业，关厂关店，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更不利于工人。少奇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我现在不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告诉你们，就是对你们不负责任啊！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还说，中国私营经济本来就不发达，再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打击和排挤，私营经济比战前更萎缩了，而当前最大的困难是物资缺乏、商品缺乏、人民生活困难、工人失业。允许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对工人都是有好处的啊！

天津当时除劳资对立以外，公营企业中，工人同职员的对立情绪也很严重。为此，少奇一面做工人的工作，一面做职员的工作。他对工人说，以前，有些管理人员，打骂过工人，或者做过其他什么坏事，为工人所痛恨，这样的人应该痛改前非，尊重和正确对待工人，工人们也要帮助和教育他们，但不要开斗争会之类，要认识他们也是工薪劳动者。

为做好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工作，少奇还提出召开一次全市公营企业职员的大会，并亲自去讲了话。他说，现在的工厂是国家和人民的工厂了，你们也成了国家工厂中的经营管理者。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

层，又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国家对你们和工人是一律同等看待的。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是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现在国家需要发展工业，交给你们一个生产任务，这是很光荣的。共产党相信你们，你们也相信共产党，相信工人群众，要互相信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也要指出：职员必须认清自己的缺点，过去有些人看不起体力劳动者，这是不对的。工人和职员在政治上、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体力劳动者很辛苦，脑力劳动者要尊重他们。在解放前，资本家曾利用职员欺压剥削工人，像打骂工人，克扣工资等等，做过一些对不起工人的事，因此存在着不团结甚至对立现象，对此，你们应该有所认识。认识有两个办法，一是改正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二是自我批评，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这样就能得到工人的谅解，团结就会搞好。

重点做资本家的工作 讲政策，释疑惑，谈利害 目的是发展生产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少奇天津之行的重点是做好资产阶级的的工作。因此，他在这方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找资本家谈话和座谈，参观他们的企业，鼓励他们说真心话。在会见的人中，既有李烛尘、周叔弢、宋棐卿、资耀华、毕鸣岐、朱继圣、边洁清、孙冰如、劳笃文、王翰庭等著名企业家，也有各行各业的中小工商业者。有些座谈会开得非常活跃和热烈。大家纷纷发言和提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如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前途等。对此，少奇都作了回答和解释。他说，党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的。前者是我们的朋友，后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他们的财产是要由国家没收的；对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保护和鼓励其发展。我们强调发展国营企业的重要性，同时也重视私营企业的发展，因为中国的私营经济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必须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关于会上许多资产阶级反映的普遍存在恐惧心理、怀疑心理、担心国家不允许私营企业存在、准不准许私营搞进出口、是否会对私营企业限制得过多过死等？少奇都一一作了回答。对于党政机关、公营企业和贸易机构都不愿同他们接触，报纸光讲资本家坏，不说一点好，尤其是劳资纠纷、职工对立等，少奇都表示一定解决好。

在同众多资本家的座谈和谈话中，少奇感到这些人当前最关心的还是恢复与发展生产的问题。所以很高兴，因为党最关切的也是这个问题，这就有了共同点。因而少奇说，政府的方针就是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而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国家的以外，还

有私人的。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人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并且说，也许将来私营生产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

他还多次在一些场合讲过：“在中国，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消灭现时还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我们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他还引证党的两个阶段理论，说明当前是实行新民主主义，不能过早消灭资本主义经济。

座谈会上，许多资本家还反映了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如原料没有来源，商品无处销售，贸易公司收购的价格压了又压，不但无利可图，还要赔钱，这个生意怎么做？李烛尘还以久大盐业公司为例说，久大把盐运到山东临清销售，那里的贸易公司就压低价格。因为没钱赚，只好把盐又运回。少奇说这些问题都要解决，最好由政府出面，召集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共同商量，从原料到市场，共同安排和分配，这就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

座谈会上有人说，现在是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剩汤，连“剩饭”也吃不上。

少奇说，其实不然，因为中国的工业还很不发达，国营工业还是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

少奇知道，对于广大的中小工商业者，除了听政府怎么讲以外，更重要的是看大型企业家的态度，因此他花了很多时间做大型企业家的的工作，周叔弢是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经理，算是大企业了。他有一男一女都是我党地下党员，他比较开明和进步的，但他也有些担心。他对少奇说，我们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赚了钱，发展到两个厂、三个厂，现在还想再开几个厂。但是厂子开多了，剥削工人也更多了，成了大资产阶级，我的罪恶可就更大。少奇马上回答，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有功绩的，你想多开几个厂子，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还有功劳。少奇还对周叔弢说，企业不在资产的大小，关键在什么性质，如是官僚资产阶级，小也要没收；民族资产阶级呢，多大也没关系。在参观仁利毛呢厂时，少奇也同该厂的总经理朱继圣谈了这些问题，朱还送给王光美一本他用英文出版的关于工厂管理的书。

少奇在1948年七届二中全会前，就考虑过将来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不通过激烈斗争甚至流血来转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也想就这个问题听听资本家的意见。东亚毛纺织公司总经理宋棐卿，也想再办个厂子，但也是有顾虑。少奇就同他说，你现在才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八个厂子，到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

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还给你加薪水，你干不干呢？宋秉卿说，那当然干。所以，经过天津的这些活动，少奇对赎买政策更有信心，认为这是一项有利于国家民族的无产阶级政策。

少奇在天津除讲解政策、进行思想教育外，还非常重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其实，有些问题是公私营企业共同的。这些，少奇都同有关部门的领导作了安排。

虽然少奇此行主要在于帮助公私企业恢复与发展生产，做好资产阶级的的工作，但少奇无论对干部、工人或资本家，都明确而深刻地谈到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区别资本家的文明和野蛮两个方面，采取不同对待，文明的一面要合作；野蛮的一面要处罚，但要慎重。还说，工人和资本家是存在矛盾的，这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和减少这些矛盾。“劳资两利”就是一种办法。这个政策必须正确执行，并且从现在开始。资本家要正确对待工人、尊重工人，过去资本家对工人的欺压，是造成工人的对立和反抗的根源之一。当然，工人也要遵守厂规厂纪，对少数工人的不合理要求，我们要做工作，给以劝阻。还强调资本家不要去做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不要非法经营，不要收买工人、工会人员和党员，拉这个打那个，也不要拿工会、政府的某句话作资本，去挑拨工人、工会或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那不但合道德，也是不合法的。还说，我们对资产阶级是有限制的。

劳资两利是一种限制，公私兼顾也是限制，如果只利私方不利公方，只利资方不利劳方，那就不是限制了，所以，只有私方同时也兼顾公方，劳方，这两个政策才能正确执行。总的说，就是限制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少奇还明确告诉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是要消灭的，但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目前离那个时候还很远。即使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希望能够和平地过渡，不要采取激烈的斗争方式，更要避免流血。我们是这样主张，希望资产阶级也要配合，不要做不利于国家民族的事。

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无论干部、工人和资产阶级，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大家都感到心里亮堂了，积极性大为提高。但应该说明，少奇的这些讲话，是广泛地、认真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一些专家的意见，然后加以分析，比较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有的采纳，有的解释，可以说，善于听取各方面不同的意见，是少奇的很大特点，因而也可以说，少奇的讲话之所以受到拥护，就是集中了群众智慧的结果。

那时少奇的工作真是夜以继日，每晚都工作很久，有时通宵达旦，只有每天晚饭后光美同他散步半小时。黄敬由于整天陪同少奇，还要处理少奇交办的事和他市

长的工作，也很累，常常开着会在沙发上一靠或一躺就睡着了。一次少奇对他说，你这么累，还自己开车，如果撞伤或撞死人，你也得受处理，你那个市长还怎么当？黄敬觉得有理，才不自己开车了。

还有一次，少奇想去看看他在任顺直省委和北方局书记时工作的老房子，但由于变化很大，没有找到。幸亏龚饮冰同志找到了他当年建立地下联络点“万源湘绣庄”的旧址。少奇也在那里住过，弥补了他怀旧的一点情绪。

那时，正赶上唐山开滦煤矿的工人酝酿罢工，他要赶去解决。还说人民政府没有权利禁止工人罢工，即使有国民党暗中破坏，我们也不怕，以后工人会相信我们的。因为光美怀孕快临产了，没有去，搭了彭老总的车和陈叔亮的夫人康岱沙，一起回到北平，并去了双清别墅，主席见了她们很高兴，问到少奇在天津的情况，光美说，参观了一些工厂，开了不少座谈会，也会见了一些资本家，主席笑着说：“就是让他去做资本家工作的。”后来少奇回到北平，向主席作了汇报，经主席批准，中央把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摘要，在党内作了传达。

以上的事实，使人更进一步认识了所谓“一头扎进了资产阶级怀抱；背叛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钻进党内的代理人”等，是何等的荒谬！后果是何等的深重啊！

（文中小标题为本刊所加）

（责任编辑 杜 晋）

讲话结结巴巴

真痛苦呀！



——矫正口吃效果好

它是治疗口吃的一种新方法，由传统口吃疗法与现代电子技术相结合研制而成，能帮助患者改变讲话结结巴巴的坏习惯，养成流畅自如讲话的好习惯，达到矫正口吃的目的。荣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86202341.6。适合个人购买使用。已生产十多年。深受欢迎。请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免费赠送资料。欢迎来信联系购买

（附邮费 2 元）我厂长年办理邮购

来信请寄：浙江省天台医疗仪器厂邮购部

邮编：317203

电话：(0576) 3661388



葛佩琦「大右派」的铁案是怎样翻过来的

● 戴煌



葛佩琦 教授

经历过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的人，或是读过记述这段历史文章的人，恐怕无人不知闻名全国的“大右派”葛佩琦。这个当时被划为“极右分子”，后又作为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的葛佩琦，到底是什么人？如此“铁案”又是怎样铸成和怎样翻过来的呢？

原本一热血满腔的 爱国青年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东平度县仁兆镇潭泥沟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家读过村塾，后靠半工半读在北京崇实中学毕业，1933年暑假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在华北危亡、祖国危亡的1935年，爆发了震撼全国、永垂青史的“一二·九”运动。葛佩琦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并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执委会委员，与朱穆之（当时叫朱仲龙）、韩天石等分别担任学生会总务、副总务（即主席、副主席）。

12月16日凌晨，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的所有学生宿舍，被国民

党军警包围。葛佩琦率领北大西斋同学向门外冲击，与身后举大旗的两位同学立即被军警逮捕。被关押在市警察局的葛佩琦与各校被捕同学一起，坚强不屈，高唱救亡歌曲以表心迹。数日后，被捕学生保释出狱。

1936年1月，平津学生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传播抗日救亡火种。葛佩琦与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在后方募集捐款，支援南下同学。

作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成立后，葛佩琦立即参加了这一组织，并作为北大学生运动的骨干之一，参与了营救被捕同学、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支援绥远抗战等一系列活动。

他终于成了中共的 秘密党员

1937年卢沟桥抗战爆发。葛佩琦被推选为“平津流亡同学会”的执行委员之一，与南下同学一起到了南京，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和另两位执委受同学会的委派，举着《平津同学会上政府意见书》，先后访问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沧、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教育部长王世杰、军委会第六部（民运部）部长陈立夫等党政要人，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分配平津流亡学生上前线参加抗日救亡。同时他们还访问了沈钧儒、张申府等社会名流，得到了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在平津同学会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共原北平市西城区地下区委书记李华与蒋南翔，会见了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先期到达南京的博古。博古指派李华成立中共南京市委并担任书记。平津同学遂在党的直接领导下

开展抗战救亡工作。他们组织战地救护队去正在激战的上海昆山一线,抢救伤兵;又组织宣传团,鼓舞南京人民的抗敌热情;同时成立了迎送流亡学生小组,在短短三、四个月内,输送到各抗日根据地、延安或大后方的,就达万人以上。

1938年1月上旬,葛佩琦等100多名男同学在战地服务训练班毕业后被调往武汉。他们立即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秘密取得联系,向已是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的博古汇报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当战训班副主任黄仲翔,要分配他们去河南第一战区工作的时候,葛佩琦立即去找先期到达武汉的蒋南翔,要求解决党的组织关系。蒋南翔说:你先随着大队去河南,到时候会有人找你。

果然,在葛佩琦离开郑州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找葛佩琦谈了话,要葛有事直接找他联系,到豫东的主要任务是抓武装。

1938年春天台儿庄大战之后,又发生了徐州大会战。5月24日,国民党部队自徐州败退,苏北、豫东的主要城镇也随之陷入敌手。程潜的第一战区长官部从郑州撤至洛阳。经他派在豫东的40名民运指导员中的39人,随着军队撤到黄泛区以西,只有葛佩琦一人仍留在商丘地区。葛佩琦主动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等人,发动各县民众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宋克宾任司令,葛佩琦任政训处长。短短一个多月,就发展为一支五六千人的抗日游击队,成为当时黄泛区以东惟一的一支抗日武装,拔除了日寇在陇海线上的几个据点,并收复过两座县城。

6月下旬,这支游击队派秘书李洪(中共地下党员)去洛阳向长官部汇报豫东战况。葛佩琦适时请李洪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向刘子久传达他的入党申请。7月上



1992年9月30日国庆节前夕,葛佩琦夫妇在天安门前留影

旬,葛佩琦应程潜电召赴洛阳。

一天晚上,李洪陪同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的刘子久,来到葛佩琦独自住宿的房间,向葛佩琦宣布:“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葛佩琦顿感周身热血沸腾,为“一二·九”运动以来的最崇高的愿望终得实现而感到无上荣幸。他决心为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身在“曹营”心在“汉” 屡建奇功

离开洛阳前,刘子久交给葛佩琦一个任务:做好宋克宾和国民党地方部队官兵的统战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支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他并写了一封介绍信,要葛佩琦面交彭雪枫。

1938年冬,彭雪枫率部到达豫东。宋克宾等人不但表示欢迎,还送了几百套棉军衣,给彭支队战士御寒。葛佩琦单独与彭雪枫见面时,转交了刘子久的信,汇报了豫东的抗战活动和敌我情势。彭雪枫对葛佩琦的工作大加赞赏,要葛佩琦有事

直接与他联系。

1939年,彭雪枫支队在永城县境与日寇作战,葛佩琦代表豫东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前往慰问并参加了为牺牲战士举行的追悼会。会后,彭雪枫约葛佩琦单独谈了话。这时,宋克宾的部队已扩大到一万五千多人。葛佩琦说,自己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老穿着国民党的军官服,觉得很不舒服,要求到自己党的部队中去工作。彭雪枫大笑。他劝葛佩琦说:为了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你继续留在宋克宾这里为党工作,比调去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葛佩琦这才下了决心在国民党部队继续干下去,除非党组织有了新的派遣。

这时,程潜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由洛阳到了西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由卫立煌接任。卫立煌撤了宋克宾的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之职,但宋克宾没有交出原来由葛佩琦帮助扩建的豫东抗日游击队。后来在程潜的支持下,这支部队改编为下辖三个师的国民党暂编第二军,宋克宾为军长,葛佩琦为政治部主任,调河北省抗日。

在河北大名、南宫之间,这支部

队与扫荡的日寇频频发生战斗。由于人生地不熟，武器装备又差，部队损失惨重，军心颇为动荡。绝大部分官兵都主张返回豫东老家，葛佩琦竭力反对。因为原来的防区已被河南省保安队接收，豫东陇海沿线又被汉奸张岚峰部队所控制，一时难有立足之地。可是宋克宾却说，张岚峰也是豫东同乡，又在西北军中共过事，不至于不给碗饭吃。

葛佩琦预感宋克宾等人有率部当汉奸的危险，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绝不能被他们裹挟去投敌；遂连夜只身潜出围寨，历数昼夜，越过日寇铁路封锁线，奔向彭雪枫部队原驻地永城县书案店。到了书案店，才知彭雪枫已率部东进，吴芝圃副司令还在附近一个村庄，当晚也将出发，葛佩琦立即向吴芝圃汇报了宋克宾部队的险象，并问是否可以再由他自己去把宋部的部分部队拉到永城，与新四军合作抗战。吴芝圃说，这不符抗日统战政策，要葛佩琦尽快去西安向程潜报告，力挽宋部不当汉奸。并说，如果宋部真的投靠了敌人，你就利用程潜的关系留在水行营，长期埋伏，等待党的新指示。

葛佩琦与吴芝圃分了手，经多日迂回跋涉到了洛阳。他想向刘子久汇报党的工作，没有找到刘子久。他好不容易到了西安，程潜已获悉宋克宾率部叛国投敌，立即召见葛佩琦，问他能否把他当民运指导员时组织起来的这支部队再拉回来？葛佩琦说：能！程潜让他去参谋处看看有关策反的文件，听候命令。

1939年8月中旬，程潜任命葛佩琦为“天水行营豫东特派员”，主要任务就是策反汉奸部队反正，并给他派了三名联络参谋和一个通信班及电台。

9月初，他们到达黄泛区以北的鹿邑县秋渠集。葛佩琦分别派遣三名参谋潜入敌占区开封、商丘、徐州。他本人也化装潜入商丘，侦察到

宋克宾部队已被改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第三师”，宋为师长，驻商丘以东30华里的马牧集。他同时还侦察到，他当年扩编的游击第六支队袁天柱部，也已投敌被编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独立团”，驻商丘以南的马头集。经数月周密策划，袁天柱部于1940年2月率先反正。

接着，葛佩琦又与宋克宾的部队取得了联系。他们也答应反正。他立即报告了天水行营。程潜复电说：及早发动，有功者奖。不久，程潜又来电说：策反工作可与何柱国军长合作进行，已另给何军长去电知照。

何柱国是豫东前线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葛佩琦知道，他正在策动“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另两个师的反正。葛佩琦仍一心想把宋克宾部队拉到彭雪枫那边去，以壮大自己党的武装力量。他专程赶赴洛阳，找到了刘子久，汇报了这一新的重要军情。刘子久说：你若把宋克宾部队拉到新四军，目前困难较多，难以成功；你与何柱国合作，是符合抗日统战政策，有利于抗战的。

这样，葛佩琦才与何柱国紧密协作。1940年10月下旬，由何柱国的骑兵接应，三个伪军师同时反正成功，被合编为国民党新七军，削弱了日伪在豫东的力量。

1942年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葛佩琦又遵从党的指示，利用与蒋鼎文的关系，随其调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少将参议，将主要精力投入党的地下活动。

未几，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头衔，赴豫东日寇占领区搜集情报，在豫东敌占区的许多城市乃至北平、上海等地，都设有联络站或联络员，各种情报源源而至。他想将这些情报首先报向延安，但苦于“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直接同他联系的刘子久匆促离去，没来得及安排葛佩琦的秘密组

织关系。

葛佩琦当时不知这个中原委，他只能直去西安转延安。可巧在西安见到了北大数学系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李年，又得以与1936年冬曾任北大学生会主席的陈忠经（中共党员）相会。陈、李都劝葛佩琦留在西安，同党中央情报部门在西安的负责人赵耀斌接上组织关系，并直接为其提供敌情。葛佩琦欣然同意。

但这时候的葛佩琦，已成豫东日本特务机关黑名单上的赫赫人物。1942年秋，当他又一次潜入商丘时，日本宪兵队紧急全城大搜捕。葛佩琦在地下同志的帮助下，机警地脱下伪军军服，用一根绳子吊下城墙，才得以脱险。

葛佩琦所领导的情报站每逢获得重要情报，均通过电报或密函，分别发给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站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1943年春，在南京召开的伪军师以上将领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文件，同年夏上海伪币狂贬、物价飞涨、日寇“以战养战”等敌囊之密，陇海线商丘站日寇军车运载部队和军用物资情况的分析报告等，都是经葛佩琦之手搞出来的。

1945年日寇投降。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派他的王牌军青年远征军进入东北，并由远征军总司令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中共中央作出进军东北、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决定。在东北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与葛佩琦商谈后，同意葛佩琦搭乘美国空军飞机去徐州，再转赴北平设立地下联络站，以便向东北转移地下工作人员。

葛佩琦虽然身着国民党少将戎装，但没有“接收大员”头衔，没法遵照赵耀斌的指示，接收一家敌伪文化机关开办报社或书店建立地下联络站。他通过私人关系，在北平西单以南一百多米的绒线胡同西口，租下一个大四合院，以住家作掩护，

接待经北平去东北的地下同志。

1946年春节过后，由赵耀斌派遣、陈忠经“举荐”，李年、邢国彦、王书鼎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做情报工作。接着，赵耀斌又派遣葛佩琦去东北，陈忠经向这个政治部的主任余纪忠作了介绍，余纪忠立即表示欢迎，并送来了“派葛佩琦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命令。

葛佩琦去沈阳坐进了杜聿明的司令部，被余纪忠任命为政治部第一组代理组长，专管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葛佩琦凭借这“政治工作”的掩护，不断地为自己的党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把书面报送长官部政治部的部队番号、驻地、人数、编制、主官姓名等等，编成国民党东北驻军一览表，送给党的地下情报组织；

——把跟随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余纪忠出席两周一次的国民党驻沈阳重要头目联席会议，作为获得机密情报的重要来源；

——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将新六军在辽南的部署和动态、安东（现名丹东）一带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及新修防御工事等情况，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副长官郑洞国率领榴弹炮营和坦克大队离开沈阳驰援四平等等敌情，密报给地下组织……

总之，在1946年春天到1947年秋天的一年半的“深入虎穴”中，葛佩琦尽管随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仍恪守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行动守则：静似处女，动赛脱兔，机智果敢、沉着慎独地获取了大量情报，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夺取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特殊作用，功不可没。

组织遭破坏 他成了“断线风筝”

既然置身“虎穴”，就难免虎狼伤害。1947年10月10日参加了

“国庆纪念会”的当晚，担任“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工处第二科科长”的李年同志、掩护地下电台的“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王书鼎同志、住在王书鼎隔壁的“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同志，同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系统的“行辕二处”的人所逮捕。葛佩琦接到李年爱人——地下电台译电员何英芬的告急电话后，立即作出如下判断：如果黑名单上也有自己的名字，早已被暗中控制，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没有，也不会因为“为朋友说了几句好话”而被捕。

第二天，他就打听出了事变的根底：“案子”是北平方面人办的，行辕二处只是奉命协助；“案由”是共党嫌疑，被捕人员下落尚不可公开。同时他还得知：从西安来到“东北通讯社”电台的申台长，十天前就失踪了。他估计，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台长身上。

得一位老朋友的帮忙，他与这位老朋友一道去拜会了东北行辕的崔处长。这位崔处长说：在行辕内部出了共产党的“案子”，陈（诚）代主任很生气。你们过去和李年有交往的人，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言行。好在他们又从军统特务沈阳市督察处处长得到可靠消息：北平来办“案子”的人已经回去，看来不至于再扩大。这位督察处长知道葛佩琦是程潜将军的老部下，不会因为与李年有过来往就怀疑他。葛佩琦这才明白自己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决心留下继续为党工作。

但是，地下组织和电台都被破坏了，所获新的情报统统发不出去。更令葛佩琦伤心的是西安方面传来消息，与他保持联系的赵耀斌也被逮捕。

此时，我们党在东北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沈阳解放指日可待。而葛佩琦在这大好形势下，却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与党失掉了一切联系。

11月2日，沈阳解放。葛佩琦

怀着无比兴奋的激情去寻找党的领导机关。但沈阳解放伊始，党的领导机关尚未公开。他去沈阳市政府询问，在拿不出任何有力凭证的情况下，自然没有结果。

他赶回和平解放后的北平，且在1949年3月找到了因“证据不足”，从南京监狱放回的“共党嫌疑犯”李年、王书鼎、邢国彦等三人。但他们与葛佩琦只有共同工作上的关系，而在组织上与葛佩琦单线联系的赵耀斌却没有回来，且情况不明，葛佩琦仍然没法接上组织关系。

4月初，一个偶然的机会，葛佩琦在全国总工会碰见了分别近10载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也很高兴，按照接组织关系需经党的组织部门的规定，介绍他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

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华北局组织部时，负责接待的同志告诉他，根据现有调查材料，证明他确实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他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还不能恢复；不过可以接受他先安置工作的要求，介绍他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时期，然后再分配工作，同时继续调查处理他的组织关系。

到了华北联大政治研究所，他才明白他已成了“党外人士”；因为四五百名学员几乎都是从北京各大学来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一部分社会名流，清一色的党外人士。毛泽东首登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华北联大改称中国人民大学。过去和葛佩琦一道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被分配到情报总署。当年抱着“科学救国”愿望投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葛佩琦，自愿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担任了理化教研室物理小组长。

由“党外人士” 变成“党的敌人”

1957年春，“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整风运动热浪滔滔。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接连两次给葛佩琦送来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葛佩琦觉得他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只是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才断了组织关系的。党籍迟迟不得恢复，反让他以“党外人士”身份参加活动，心里十分不快。

第三次送来通知，并有系总支的一位同志来当面动员，他才老大不情愿地跟了去。

到了会场，主持人请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在一些党外人士发言之后，葛佩琦才站了起来。他就党内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这是1957年5月24日。

隔一天，《北京日报》二版头条，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在23日和24日连续召开的讲师以上教师座谈会的消息，引题为《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大字正题为《中国人民大学赶快前进！》。

文中共有5个小插图，比较详细地报道了8位教授、讲师的发言。最后一个小插图是《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文中说：

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认为“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作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

对《北京日报》的这一报道，葛佩琦没有提出意见。他认为虽然摘

发得生硬、不周全，但这和一些领导人也常爱说的“弄得不好，就会亡党、亡国、亡头”的忧党忧国忧民之情，并没有本质之不同；而且“群众为什么对我们有恶感，因为我们作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显然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道，却使他“炸了头”。他认为编者断章取义把他的话改成了“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葛佩琦当天下午面见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事实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

5月31日，《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道，其中有一个小插图是《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文中说葛佩琦论述了这样一些话：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的。

……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联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受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以后的6月5日、6日、7日，《人民日报》接连刊出“读者来信”，对葛佩琦进行批判。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正式吹响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对葛佩琦的批判也随之白炽化了——就在这天报纸的第七版上，又刊登了《要跟葛佩琦划清思想界限》的长约三千言的报道，在《葛佩琦连续发表反共言论》这一小插图下：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挣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葛佩琦看到这段报道很生气，认为已经远离了他的原话。他当即写了更正信，并于第二天上午亲自送给了《人民日报》社。信中说：

“六月八日你报七版刊登的我那个发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请予更正。”并说：“我要重述一遍……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这段话应改为：“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绝于

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葛佩琦这一更正信换来的是各界人士的连篇累牍的全国范围的大批判。

葛佩琦这一“人人得而诛之”的“特大号”反共人物,“理所当然”地被划成了“极右分子”。

雪上加霜 他被抓进了监狱

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于当时几乎妇孺皆知的“要杀共产党人”的葛佩琦,自然会怀疑到他的历史背景。

1957年12月24日深夜,葛佩琦被逮捕,并在他家搜出了他当年身穿国民党军装、骑在日本战马上的照片。着警服的人说:“这不是你反革命的证据吗?”葛佩琦则申辩说,那是他做地下工作时的照片。

葛佩琦被送到北京城东北角草岚子胡同,那个原是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地方。

负责他这个案子的是一位年轻的审讯员。不知这位年轻人是出于对祖国现代史和党的地下工作知识的无知,还是对阶级敌人的无限仇恨,每次对葛佩琦“历史经历”的询问,都是南辕北辙,无“果”而终。比如:问到1938年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的问题,年轻人问:“你组织游击队干嘛?”葛佩琦回答:“抗日。”年轻人把桌子一拍:“胡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你会抗日吗?”

再如,问到解放战争中的情况,年轻人问:“你说说,你在东北当‘国民党少将’,都干了些什么?”葛佩琦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地下组织派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国民党的大量重要军事情报,报给了我党地下组织……”年轻人打断他的

话:“你是‘国民党少将’,谁承认你是共产党员!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你再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

这样的审讯进行了36次之后,1958年秋天,对葛佩琦开始了第二个阶段共达30次的系统审讯。重点是追问葛佩琦出卖了共产党的哪些利益,才当上“国民党少将”的……

1959年3月4日早饭后,葛佩琦出庭受审。门楣上边写着“法庭”二字,审判席上坐着审判员、检察员、书记员、陪审员,台前直立着法警。这一切提示他:维护真理与革命法制的关键时刻到了。

在检察员宣读完《起诉书》,审判员要他陈述意见时,他再也不能默默忍受不准提及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的禁令,开始为自己作论据充足、法理畅然的辩护。他说:

《起诉书》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条:第一条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是“现行反革命”。根据事实,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现将理由陈述如下:

《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不错,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职;但这不是我的真实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有关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我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了国民党的大批重要军事情报,报给共产党……这类事实证明,我不是“为敌效劳”,而是为共产党效劳,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效劳。上述事实也证明,我不是“蒋匪特务”,而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派遣,打入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以上事实证明,我的历史

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所以《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借党整风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认定这条罪名的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肃反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老百姓把用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进城、现在坐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因为党组织要他们作情报”;“今天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等等。

《起诉书》从报刊上引用了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根据以上两点理由,《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我既不是“历史反革命”,也不是“现行反革命”。请求法庭依法宣告无罪释放。

6月29日,距离葛佩琦为自己作辩护的3个月又25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他作出了“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判决书》全文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

报,报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多次诽谤我党,鼓动蒋匪帮反共反人民的气焰。解放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被告本应感恩自悔,痛下决心,彻底改造,重新做人,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的进攻,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被告这些严重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证物:匪(指国民党)军衔花8个、帽徽1个、证章3个、军服两套、军服带两条全部没收

看了这份《判决书》,葛佩琦的目光久久地凝注着其中“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这八个字上,对照自己走过的48年人生历程,他内心发出无声的呐喊:究竟谁“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苍天可鉴!

葛佩琦当然不服。他立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而且接连申诉了多次,都被一一驳回。

直到1975年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葛佩琦才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被释放,从而结束了那榛莽漫漫的囚徒生活。

一位不断为他带来喜讯的老者

1978年春寒料峭的一天上午,葛佩琦迁京后居住的交道口东大街96号大杂院出现了一个老者。他就

是李逸三。这位1926年曾奉党派遣从事“军运”、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30年在洪湖苏区带兵的老共产党员,1957年整风“反右”时,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亲耳听过葛佩琦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认为,葛佩琦当时说了一些“带刺”的话是可理解的,因为多少年来一直未能恢复他的组织关系。但在校党委决定把葛佩琦划为“极右分子”时他也违心地举了手。后来,他虽然坚决反对把葛佩琦当作“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再后来又被调离了中国人民大学,然而对那一次的违心举手,一直深感对不起葛佩琦而难释于怀。葛佩琦搬进这个大杂院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了,而且还住在京城东南部的劲松小区。那时他就风尘仆仆地来过这个大院,看望葛佩琦。后来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要来一次,每次来都给葛佩琦捎来一些水果点心、零花钱、粮票,以及对葛佩琦至关重要的信息:

胡耀邦主管中央组织部了,恢复了“党员之家”的传统,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排着队去上访;

中央五个部的代表在烟台开了会,决定为所有还没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去帽子,也可以为少数错划的平反改正;

中央又发了个文件,对凡是被错划的“右派”,错多少就改正多少,不受人数的限制,不划框框,完完全全的实事求是……

每一次传达了这些好消息,李逸三都鼓励葛佩琦上访。但葛佩琦认为自己的问题非同一般,他的身上也压着“三座大山”——“极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如果不把这“三座大山”都搬掉,他休想回到党内;而要把这些“大山”一一都搬掉,又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他觉得,问题的起缘在中国人民大学;要上访,也得先从人民大学

访起,犯不着贸然直奔党中央。在李逸三向他透露了党中央决定为所有错划右派全部都改正平反的消息后不久,他就去了人民大学。他去拜访成仿吾校长。仿吾老询问了他这20年的情况后,表示将他的申请改正报告转给学校人事处。

在学校迟迟没有答复的情况下,葛佩琦才横下一条心:去党中央上访。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落下了帷幕。彭德怀元帅、陶铸以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的平反——毛泽东错误决定或首肯的这些震惊全国、全世界的重大冤案的彻底平反,陡增了葛佩琦力争平反自己的历史沉冤的信心。12月25日,他就去上访中央组织部。

那时中央组织部的北院墙外,就是灵镜胡同。在胡同中间开的一个小门,就是中组部信访处的接待站,通向中组部后院。葛佩琦摸到那儿,胡同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上访队伍了。轮到他去领登记表,接待的干部问他姓啥名谁,他一说出那三个字,立刻就有好几位上访的人围拢了上来问长问短,有一个人还惊喜地说:“没想到你还活在人间!”

他拿着领到的上访登记表和一位好心人让给他的当日接待谈话的号码,一并交给接待人员。

不一会,接待人员就叫他进屋,对他说:“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

葛佩琦到了前门传达室,传达室的同志对他和颜悦色,彬彬有礼。约摸十分钟,从办公大楼来了一位女干部,问了他的住处和生活情况后说:领导要接见你,但今天开会去了,请你后天上午再来。

12月27日上午8点,葛佩琦准时到了中央组织部。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在办公楼会客室接待了他。郝一民一句问候:“葛佩琦同志,

这许多年你受苦了！”葛佩琦顿时觉得有一股热泪要夺眶而出。因为这是自从沈阳、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被敌人破坏之后，三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党组织的一位负责干部称他为“同志”，还说他“受苦了”。这对他可真是“换了人间”！

葛佩琦向郝一民陈述了自己的历史经历和1957年的蒙冤经过，提出了三点请求：一、请求恢复他的党组织关系；二、请求改正把他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三、请求为他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后的冤案。

“好的。”郝一民说，“请你把你要求解决的这些问题，给我们写一份材料，我们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处理。我个人的意见，你最好先要求解决错划右派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恢复党籍。”

“你说得对。”葛佩琦说，“但是，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派遣的，一步一个脚印，有人证可查。就是在‘肃反运动’中，也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突然被逮捕了呢？”

郝一民认为葛佩琦提出这一疑问，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正当的，

也应该由人民大学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胡耀邦、陈野苹 直接过问这一案件

1979年元旦后不久，葛佩琦将郝一民要他写的材料送去了，中央组织部及时批转给人民大学，要求认真复查葛佩琦的“右派”问题。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已恢复了“党员之家”传统的中央组织部的这种深切关怀一个同志政治生命的态度，还远远没有影响到所有的单位。这年4月初，葛佩琦拜访了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正在复查。”

葛佩琦告诉他，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歪曲了他发言的原意，他当即向学校党委副书记聂真作了更正。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据说也是他的那个“发言”，也与他的原发言不相符，他在第二天就送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更正。按照中央宣布的政策，被他更正过的那些“发言”，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1993年1月31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灵堂举行葛佩琦遗体告别仪式

(16页以此为准)

“我们研究研究再说。”这位负责人说。

这个“研究研究”是很慎重的。把当年在人民大学经历过“整风反右”的一些学生班团支部书记，都请了回去“研究研究”。研究的结果，谁也说不出口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事实。但对当年中央定的这个案子，没有人敢于平反。

葛佩琦又眼巴巴地等了七个月——即等到当年11月12日，才等来了人民大学党委《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这是一个“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的结论。葛佩琦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继续申诉！

第二天，葛佩琦就拿着这个《复查结论》和1957年《人大周报》上刊登的那个“发言”，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那里的律师问葛佩琦：

“报纸上刊登你的那个‘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同意？或是否要你在那发表的稿子上签过字？”

“没有。”葛佩琦说，“在刊登那个‘发言’之前，既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也没有让我看过那个稿子，当然也没有我的签字。不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周报》登出了那个‘发言’之后，我立即到人民大学党委作了更正，这有人证可查。”

“既然如此，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没有经你签字同意的‘言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是不能作为划你右派的依据的……”

有了这一答复，葛佩琦开始了新一轮上访申诉。

恰巧，这时又来探望的李逸三给他直接点破：“上访胡耀邦！”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葛佩琦来到了北京东城富强胡同耀邦家的大门口。

不久，出来一位干部。葛佩琦向他通报了姓名和来意，他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着材料吗？”

葛佩琦把一封约有五百字的申诉信递了过去。那位同志说：“耀邦

同志现在正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你的信转上去。请你留下电话,以便将处理情况及时通知你。”

“我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没有电话。”

“那只好请你再辛苦一趟。明天下午还是五点来。”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按时前往。那位同志就出来了,交给他一个中间印有竖方形红格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它去中央组织部,找陈野苹副部长。”葛佩琦感激不已。一回到家就拿出放大镜,仔细看那个用红粗铅笔竖写的大信封。右首写的是“中组部”,中间红竖长条格格里写的是“陈野苹副部长”,左下首是胡耀邦的签名。他从信封中抽出了他自己的那封申诉信,看到了耀邦对它作了这样的批示:“指定专人,督促有关单位对葛佩琦同志落实政策。”再细看,耀邦在申诉信落款时间“三月二日”的“三”字下面,点了两点大红点,葛佩琦这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把“四月二日”写成“三月二日”了。连这么芝麻点的小笔误,耀邦都予以点正,可见他对冤苦人的申诉信看得多么仔细、多么诚心!

第二天早晨八点半,葛佩琦就到了中组部。陈野苹到中南海中央书记处开会去了,他的秘书任小彬来到会客室接待了葛佩琦。

过了两天,任小彬电话告诉葛佩琦:陈野苹副部长已指定中组部干审局一位副局长处理你的申诉。

葛佩琦见到了这位副局长。这位副局长在了解到人民大学“不予改正”的依据,仍然是1957年报纸的不实之词,且葛佩琦可以提出没有说过那些话的人证与书证后,对葛佩琦说:“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们将通知有关方面重新复查,查出来的材料会与你见面的。”

葛佩琦回到他那自称“96陋室”的八平方米的小屋,首先想到的是“反右”时任人民大学组织部长、

过后又一直惦念他的“知心老头”李逸三。1980年11月17日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

信中陈述了他向人民大学申诉、向中组部申诉的全部经过,并寄去了有关证明材料,希望李逸三能助他一臂之力。

11月20日,仗义执言的李逸三立即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现任国务院参事,向您反映一下葛佩琦的冤狱问题。

先谈谈他的右派问题。1957年,我在人民大学任党委常委等职。当时鸣放时,我们请他帮助党整风,他向党提批评意见,说了些错话和气话、刺话,如说:

“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

“搞的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

“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少数党员),六亲不认”。

这三段话,是引的原始会议记录。他谈这些话时,我在场,据我记忆,这基本上是他的原话原意。

当时1957.6.8人民日报上登载的葛的话,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实是有出入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

……

据我所知,葛是1938年入党的党员,抗战八年和解放战争四年共计十二年,是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档案可以证明这点。

1949年解放至57年,共九年之久,他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我们组织上不但不承认他在地下的工作成绩和组织关系,反而对他一再审查,看成嫌疑分子。

因此,上面我引述的那三段话,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我认为他的话有错误,也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但)是不是据此就定为右派,至今不予改正,我认为

是值得再研究的问题。

……

下面,我说一下葛佩琦坐十八年冤狱的问题:

葛佩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共计十二年的历史,有人证和物证,证明是历史革命分子,可是在57年划右派后,来了一个“新账老账一起算”,说葛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开始判处无期徒刑,在坐了十八年牢之后,被特赦出狱。

葛出狱后一再申诉。大约三年以前已经查明是历史革命分子,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听说北京市人民法院也早已重新作出判决,认定葛是坐了十八年冤狱……

解放前,葛佩琦是虎口余生;解放后,长期压在“右派”帽子底下,妻离子散,双眼接近失明。葛被划成“右派”时,我也举过手,我是问心有愧的!

为了使这个历史革命分子早日过上人的生活,我特向您喊:冤!

耀邦同志是否见到这封信,或对此信是否又作过批示,不得而知;但此信发出后的许多迹象是令人振奋的。反应最积极、最迅速的是法院系统,距李老逸三发信只二十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对葛佩琦一案作出了“再审判决”。

12月10日上午,北京市高院正式开庭,庭长刘罗彬宣读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80)高刑监字第893号”《刑事再审判判决书》,再审判判决书中说: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认定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59)中刑反字第106号刑事判决书及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75)刑字第27号裁定书;

二、宣告葛佩琦无罪;

三、原判没收的黄金四十一两六钱八分折给人民币叁千陆百伍拾叁元壹角肆分整,发还本人。

1982年1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作出了《关于葛佩琦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问题的复查结论》：

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 and （80）60号文件的精神，对葛佩琦在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撤销一九五七年划葛佩琦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政治名誉，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恢复原教学六级工资待遇。

至此，压在葛佩琦身上的“三座大山”被全部推倒，剩下的就是恢复党籍的问题了。

1982年5月4日，他又给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的经历和目前亟待解决的党籍问题。罗青长发函证明，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在给葛佩琦接上情报工作关系时，就同时给他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82年6月18日，人民大学党委收到罗青长这份材料的同时，也收到了葛佩琦当年的主要入党介绍人刘子久给人民大学党委的信：建议恢复葛佩琦的党籍。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将这些材料报送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于1983年5月23日作出决定：

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

这样，终于恢复了他的“三八式”老党员的本来面目。

他以革命者的本来面目 度过了最后岁月

葛佩琦大冤案彻底平反的消息迅速广传于海内外。

葛佩琦先后收到了近千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有的人还从天津、上海、长沙、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专程来看望他，真情祝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全面恢复，祝贺他从深重灾难中得到解放，呼吸到了

充满活力的清新空气。

1984年6月，即葛佩琦被恢复党籍的一周年之际，他的一些老同学、老战友聚会于北京烤鸭店，热烈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当年的人党介绍人、时任劳动人事部顾问的刘子久即席赋七绝一首，以表贺忱：

中州风雨忆当年，
与君共读马列篇；
道路坎坷成往事，
疾风劲草有今天！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葛佩琦为教授。

1988年春节的大年初三，当年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学，搞了53年来从未有过的春节大团拜。陆平、韩天石、邓力群、刘导生、吕东、朱穆之、袁宝华、孙思白、

谢邦治、顾大椿、任继愈、甘重斗、胡昭衡、佟成、刘祖春、田价人、沈学桢、刘玉柱、杨锡钧、纪坚博、孟桂芝、李小慧、刘居英、汪鸿文、叶修直、关士聪、刘火、李兆翔、白文治、于克三、姚震江、朱国平、张震寰、吴承明、宋尔廉、王寿仁等人，与葛佩琦忆昔思今，无不感喟万千。

葛佩琦于1993年1月13日上午11时55分，因心脏病抢救无效辞世。新华社电讯中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直不阿，心胸豁达，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著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贡献一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责任编辑 洛松）

《东方之珠——香港社会大写真》

本书作者黄际昌原是《人民日报》驻香港首席记者，他以优美的文字和敏锐观察力，把香港的社会民俗和文化大观，以及港人与大陆的骨肉亲情，声情并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书中特别记述了香港著名摄影家、社会活动家、探险家、香江奇女李乐诗到南极、北极和登峰探险的经历，以及知名企业家、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等人物的传奇事迹，读后既增长见闻，又激励奋进，是1997年香港回归前了解香港既有深度又有风趣的一本读物。

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大32开，8印张，定价9.00元，已出版。

购书请汇款至北京文津街7号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邮政编码：100802，免收邮费。

谋杀刘少奇的 “湘江案” 泡汤记

● 霸 史



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三度接见刘少奇

阴险毒辣：代号“湘江案”计划出台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台湾蒋介石集团一直不甘心其失败，处心积虑，妄图“光复”大陆，推翻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曾多渠道派遣行动特务潜入大陆，制造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企图暗害我中央领导人，都未能得逞，又利用我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机会策划暗杀行动。1955年，台湾国防部情报局获悉周恩来总理将率团赴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消息后，在香港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我代表团部分成员乘坐的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起飞后不久被炸毁，我代表团11名成员牺牲。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因未乘坐此机而幸免于难。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柬埔寨时，驻金边的国民党特务妄图进行暗杀，只因时间紧迫和器材不足未能下手。

进入60年代后，我有关部门不断获悉，台湾派往柬埔寨、缅甸、印尼等地特务，一直在策划对我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的暗害活动，特别是西哈努克和苏班德里约访问我国后，台湾特务机关加紧探查我国家领导人的回访时间、地点，并积极进行暗害准备。台湾国防部情报局自1961年9月获悉刘主席可能访柬的消息后，同年10月即指派上校级的行动特务张霈芝由台湾抵西贡，向情报局“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转达关于暗害刘主席的秘密指示，并着手筹建专门负责此项行动任务的“金边组”。与此同时，情报局还批准了“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策划的暗害刘主席的两个行动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在刘主席的座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具体办法是将C—4或TNT炸药两磅（配有美制定时器）放在刘主席的座机内或捆扎在机外，使之在空中爆炸。该案由金边组中校级特务农稔祥督导，由张达昌运用亚四（均为行动特务）具体执行。农也曾计划收买金边机场运输行李的汽车司机具体执行。第二个方案，是在酒会上投掷手榴弹。具体办法是：先侦察酒会地点，预先将手榴弹运进会场，并控制会场电源，伺机进行暗害活动。1962年2月中旬我获悉，“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已选好投掷手榴弹的地点，并经情报局批准。该案由金边组重要特务文锡龄、农稔祥督导，由张达昌和张森运用柬埔寨人，或出席酒会的华侨，或亲自执行。文锡龄也曾计划收买“大厦饭馆”侍役魏振秋具体执行。

为了执行上述计划，“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曾于1961年10月、1962年2月、1963年1月先后通过南越当局从西贡运往金边三批行动器材，并由南越驻柬代表处转交台湾情报局金边组。这三批器材计有：C—4炸药4磅、雷管及定时器各2个、燃烧弹1枚、手榴弹7枚。台湾特务机关将这一行动计划命名为“湘江案”。

这些情报反映出十分严重的敌情，说明台湾国民党特务和阴谋暗害活动是早有准备的，他们初步摸到了我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一些规律，并总结了以往几次失误的教训。因此，他们制定的计划更为详尽、周密，谋害手段也更加毒辣、多样。

针锋相对：我方严密反破坏 安全措施

刘少奇主席于1963年4月12日——5月16日访问印尼、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国的计划决定后，为了确保刘少奇出访的安全，3月中旬中央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负责，总参谋部、外交部、调查部、公安部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重要决策报周恩来总理批准。旋即各部门立即按照各自工作职能，积极开展工作，部署有关安全措施：

——1963年3月17日，公安部指示一局驻广东机构加紧调查有关刘主席出访安全的情况，要求搜集台湾特务分子在印尼、泰国、缅甸和南越的活动情报、转款情况和可疑行动；

——同年3月28日，在广州各有关部门组成刘少奇出访安全保卫小组，由公安部一局副局长李溪林任组长，以协调有关部门的工作；

——4月2日公安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所属各有关单位抓紧了解港澳和有关地区的美蒋特务情况，搜集敌特针对出访的破坏计划，了解行动特务和骨干特务的行踪、爆破器材储藏情况以及向印尼、缅甸、柬埔寨和南越等地输送特务、转运器材的情况；

——4月9日中央安全领导小组下达关于刘少奇主席出访安全保卫统一部署的意见；

——我驻印尼、柬埔寨、缅甸使馆党委，从3月以来对刘主席出访的安全保卫工作，分别作了部署，成立安全保卫组，建立敌情调查、现场保卫、专机守卫等专门小组，派前站人员对刘主席将要访问的地区检查布置保卫工作，对住地、访问路线、活动场所等，绘出图表，拟定方案，布置警卫力量；

……

随着各有关部门有条不紊地工作，一些重要的情况及线索陆续显现出来：

——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兼中委会二组副组长沈之岳于4月26日抵澳门；

——驻南越西贡的台湾特务廖时亮，专程赴台接受指示，策划对刘主席访问柬埔寨的暗害活动，廖于4月27日返回西贡；

——1960年曾往印度阴谋破坏周总理出访未逞的

台湾特务蔡定中，于3月间由台抵港，4月中旬又离港去东南亚，据悉蔡此行与破坏刘主席出访有关；

——台湾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处长徐人隽，率领7人，于4月20日经香港赴泰缅边境活动。

从纷繁复杂的敌情和严峻的形势可以看出，敌人搞行动破坏阴谋重点是在柬埔寨。负有安全保卫任务的公安政治侦察机关和情况部门，密切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采取了一系列的安全保卫措施。

敲山震虎：我派员赴港当面警告特务头目廖时亮

执行柬埔寨“湘江案”计划的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及其下属“金边组”，该站站长是廖时亮。廖1939年考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级人员训练班”，入军统黔阳班受训，开始其特务生涯。大陆解放时在广西被俘，获释回乡后，不久经广东逃往香港，几经辗转又跑到台湾重操旧业。1955年起被台湾情报局派往西贡当甲种站站长，公开身份是台湾驻南越“大使馆”主事。他在国内有一亲姐姐，姐姐、姐夫均在国家计委任职。

公安部一局驻广东机构为了监控廖的活动，多年前就物色了廖旧时的同窗好友罗炯林，进行有关的情况调查。1963年4月初，当获悉敌“湘江案”计划和廖时亮将经香港去台湾接受任务的情报后，迅速将罗炯林从长沙调到广州。

4月19日，公安部紧急通知一局驻广东机构：台湾当天电令“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派一人返台研究“湘江案”计划，并将携带坑道爆炸所需追加的30磅炸药回西贡支援“金边组”。估计很可能是廖时亮亲自返台。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刘主席出访的安全，非常重要，要求派人到香港启德机场掌握情况。

公安部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发现廖时亮是在消极拖延时间，加上得知他以往曾在敌人营垒里有过动摇，在报经中央安全领导小组杨尚昆、孔原（调查部部长兼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同意后，于4月21日，向公安部一局驻广东机构下达了廖时亮到港时由罗炯林出面向廖递交警告信，和用传话的方式，阻止、扰乱廖的行动的指示。警告信由当时任公安部一局局长凌云通过电话口授给在广东的李溪林。

当日，按公安部的指示，罗炯林被派往香港，由熟悉港澳情况的张济忠随行指导。

根据情报，我方只知道廖将经港返台。但是廖何时乘坐哪次班机返台，却不清楚。因此，张济忠和罗炯林到港后，每天在香港启德机场守候。张、罗约定，一旦

发现廖时亮，由罗炯林上前与廖时亮见面，递交警告信。然后，由罗随机应变，通过行动暗号暗示廖的意向。

时间到了4月24日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候，廖时亮终于露面了。罗炯林在闸道出口处把廖时亮叫住。廖见到罗，惊喜交加，听了罗炯林简要转达我方的警告后，则神色紧张，耳根泛红。

“有关方面托我捎一封信给你！有关方面对你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完全清楚的。你决不能做危害祖国人民的坏事！如果台湾方面对你逼得很紧的话，你应该设法拖延应付，决不能让这种事情搞成功啊！”

廖时亮低头无语，力图保持镇静。

“你们的行动是断无成功之理的。现在我方与柬埔寨方面已经采取了措施。国内的亲属都很关心你，特别是明夫和东姐（注：指廖的姐夫和姐姐）。你等下看看信就知道了。这次确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希望你当机立断，争取主动，珍惜自己的前途！”

说着，罗炯林将我方的警告信交给了廖时亮。

廖时亮向四周扫视了一番，未发现异常，表面上似乎平静了一些，说：“等一下再看吧，机场给我安排住在金边酒店，先住下再说。”

说完，叫了一辆出租车。罗炯林按约定，用手帕擦擦脸颊，示意张济忠廖已接信，然后主动替廖时亮提起箱子和纸包，让廖时亮先开车门。这是罗炯林与张济忠事先约好的又一暗号——如果由罗用右手先开车门，即表示廖随罗去红楼酒店（罗下榻之所），由廖开车门则暗示随廖而去。

小车载着他们很快消失在拥挤的车流里……

到了金边酒店，廖时亮一进房间，便迫不急待地展开信来，一行苍劲雄浑的行草直刺眼帘——

时亮先生：

数年来，先生潜居南越，所作所为，对祖国不利。惟念过去曾有不曾自绝祖国表示，当予等候，以示宽大。最近台方妄图在柬推行破坏阴谋，柬我双方均已洞悉，决无成功之可能，徒显其穷途末路，罪戾不浅。台湾之行，关系重大，尚望珍惜前途，慎重自处。汝姐对先生也寄有厚望。当机立断，此其时矣。

专此

布达

知名不具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这封警告信虽寥寥数语，却字字重似千斤……

何去何从？廖时亮额头上渗出冰冷的汗水，他皱着眉一声不吭，接连看了三遍，然后匆匆走进盥洗间把信烧了。他着实给吓了一跳。想不到自己的计划和行踪，早已在中共的严密监视之下，而且送信的人竟是自己的同乡邻居、中学和大学同窗，还是南京伪政府时期的同事

和拜把兄弟炯林。惊恐之余，他不禁为中共情报之准确、手段之高明所折服。

“这不是明夫的字，也不是东姐的字呀！”廖时亮盯着罗炯林说：“这信肯定不是他俩写的”，表示只有见到东姐或明夫的亲笔信，他才能相信。这其实是廖时亮的缓兵之计，他是想先拖住罗炯林，到台湾后再视情而行。罗炯林因为事先没有看到信文，不知内情，听了廖的话一时有些窘迫。但他马上镇静下来，在这之后的数小时里，他发挥出多年当教师教书育人的本领，沉着应变，摆事实，讲道理，劝廖弃恶从善。而廖时亮在这几个小时里只是沉默，不停地抽烟，最后他表示：

“我只能这样答复你，如果这种事是由我去执行，那在时间上和地点上搞一点差错还是好办的，而且发现不了。如果我们传达任务给了行动组，负责与我联系的一部分我或许还能设法喊得住。但是据我知道，在那边的行动组并不止一个方面，我能控制一个方面，却喊不住其他方面，因此这个事情要我下担保那是不敢保证的。请你转告东姐，我只能在能力范围内尽我的力，但不能保证别的方面不行动。我的意见最好是刘少奇不去柬埔寨。”

廖又说：“我对国民党的确是无所留恋，但是共产党我也不能一下子就相信，这个问题我还要考虑，我没有得到可靠的保证咧！”

“你要东姐明夫亲笔写信，这就是你指的保证吗？”

“是的，明夫虽是至亲，但我更相信东姐，我要看到她的亲笔信才能相信。”

“那么这也不难，我可以办到。只要你在半个月内能回到香港的话，我是可以办到的。”

金蝉脱壳：廖时亮潜回河内执行“湘江案”计划

时间转眼到了第二天，即4月25日，廖时亮乘11时的飞机去了台湾。一直在机场紧张守候的张济忠看着罗炯林送廖登机，直至离开香港。

罗炯林告诉张济忠，廖时亮买的是往返机票，临行前他希望进一步得到我方的保证，并报告了他与廖在金门酒店会面的情况。张济忠迅速向上级报告了这次见面的情况。

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在获得了详细的情况汇报后，迅速批准了公安部派郭佩真携带廖时亮姐姐的亲笔信去香港会见廖时亮。

4月26日，郭佩真带信抵达香港，并在启德机场等候廖时亮。

但是敌人并不是总被我们牵着鼻子走。

就在郭佩真到达香港的当天，我方获悉廖时亮4月26日发电给南越站，他于4月26日飞马尼拉，27日回西贡。当天我又获悉“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向台湾报告，该站已与南越当局商量好，可用外交邮袋运器材到金边，如廖时亮27日能到西贡的话，5月1日可如期运抵金边。由此判定，廖避开香港绕道菲律宾回西贡了。

27日，我获悉“南越站”又向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报告：廖时亮及带回的东西（指爆炸器材）已于4月27日17点30分运抵西贡，4月30日即可运抵金边。此时，刘少奇访柬的先遣人员已于4月26日先行到柬。情报局“金边组”已停止其他工作，全力搞湘江案。

耐人寻味的是，26日这一天，廖时亮在离开台湾飞往马尼拉的同时却给罗炯林来了封信，内称有事留在台湾，要罗在香港等他。这显然是欺骗。狡猾的敌人企图以此转移我方的视线，而一意孤行地返回西贡，执行罪恶的“湘江案”行动计划。

尽管如此，在香港对廖时亮的警告，动摇了敌人的信心，干扰了敌方的行动，打了一场很好的干扰战。

此时，距离刘少奇主席访问柬埔寨仅有4天的时间了，敌人的爆破器材已经运到金边，廖时亮指挥下的台湾情报局金边组正在加紧实施“湘江案”计划。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一场更加紧张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着……

众志成城：中柬联手终使敌人计划泡汤

在我获悉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湘江案”计划后，中央安全领导小组指示我驻柬使馆要迅速查清该案执行人员的下落，依靠进步华侨将敌人的情况掌握起来。

4月中旬，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决定，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紧急调王幼平（原驻柬大使，在柬华侨中有很好的影响），以外交部顾问的身份赴柬，协助使馆工作。随后，使馆又成立了由陈叔亮大使、王幼平顾问、公安部一局副局长刘坚夫等组成的安全领导小组，共同领导此项工作。

据刘坚夫回忆：金边的华侨知道刘少奇主席将要访问柬埔寨的消息后，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他们自发地、主动地要求协助为我驻柬使馆做好刘主席来访的安全保卫工作，无偿提供汽车，每天有多辆小汽车停放在使馆门前供使馆使用。当地的华侨商会自发地动员华侨组织队伍，担负警卫任务，就连依照柬埔寨风俗向刘主席献花和洒花的少女队伍，也是华侨商会根据安全原则动员华侨子女组成的。由于我驻柬使馆长期坚持党的正确的对外政策和群众路线，深得当地华侨的拥护，在华

侨中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通过依靠华侨的力量，我使馆很快查明了情报反映的人名和地址，并迅速组织人力将这些可疑分子监视起来。

由于我国情报部门的出色工作，我掌握了国民党情报局“金边组”与“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的交通联系，获得了金边组与台湾之间的来往信件。这些信是明文夹带密写，虽然知道信里另有“内容”，但无法破译。使馆安全领导小组发急电，请示公安部立即派技术专家到金边。

公安部接到电报后，急派技术专家姚良俊携相关技术器材赴柬。4月22日，姚良俊经缅甸抵达金边。此时我已扣住了敌人7封信件没有送出，时间非常紧迫。姚良俊一到使馆，即顶着高温酷暑，投入紧张工作。

经过7个昼夜的连续奋战，姚良俊不仅破译了这7封密写信，还译出了多封我方新获得的密写信共21件。这些信件都是“金边组”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有关“湘江案”的请示报告和批示答复，内容涉及坑道爆炸阴谋的全部细节，包括在金边机场通往皇宫的大路下挖掘坑道的地形图、行动方案、组织情况、人员名单、爆炸器材贮藏地点和爆炸方法等等。据姚良俊回忆说：当时我们获得了关键的三封信。一封是坑道地形图，此图画得非常详细，坑道具体方位一目了然；第二封是行动人员名单，其中包括越南人、柬埔寨人，共两页纸，约20多人。这份名单不仅报告了参加行动的人员，而且是爆炸成功后论功行赏的依据，当然也是作为“牺牲”后抚恤的根据；第三封是金边组请示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如果西哈努克与刘主席同乘一辆车行进时，是否引爆。台湾的答复是：炸。就是要使刘少奇与西哈努克“同归于尽”。多么阴险毒辣！台湾反动当局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刘主席出访。

我驻柬使馆立即将密写信的内容报告给中央安全领导小组。

敌情如此之严重，时间又是如此紧迫。当我驻柬使馆安全保卫小组获得敌金边组准备实施坑道爆炸阴谋的详情时，正值刘少奇主席一行4月27日结束对缅甸的访问返回云南昆明休息。5月1日刘主席又将开始对柬埔寨的访问。周恩来总理和杨尚昆主任派公安部一局凌云局长和王幼平一起直赴昆明向刘主席、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和代表团其他领导同志汇报这一重要情况，并征求刘主席的指示。刘少奇主席在听完汇报后，微笑着只说了一句话：“敌人不让我去，我偏要去。”短短一句话，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也表现了我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广大指战员充分的信任，因而也激发了同志们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保卫国家领导人出访仅仅依靠我方的力量不行，尊重对方，及时向对方通报情况，将安全责任交予

对方是国家领导人出访安全的重要保证。当时的柬埔寨，国内政局并不十分稳定。在国际上它虽然支持“一个中国”，愿意同中国友好相处，但仍有亲台湾的势力存在。在中柬双方确定了刘主席访柬的具体时间后，4月初，我驻柬使馆派专人与西哈努克的私人顾问宋双会面，对他们在安全保卫工作上的友好合作表示感谢，同时将我掌握的台湾国民党重要特务名单送柬埔寨政府，希望他们采取必要的处置。但是柬方一直到4月底还没有采取措施。在我破译了坑道地形图等密写信后，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通过备忘录的形式再次将台湾特务的罪恶计划通报给柬埔寨警察总监朗诺，同时也通报给了柬国防部二厅，向他们指出了敌情的严重性。柬国防部立即报告了西哈努克亲王。在知道我方掌握了台湾特务行动计划的确凿证据后，西哈努克亲王下令对台湾特务采取行动。

4月28日，柬埔寨警方根据我大使馆提供的备忘录和台湾特务分子名单，开始搜捕敌金边组。30日，也就是在刘主席访问柬埔寨的前夕，金边组遭到毁灭性打击。柬埔寨有关当局仅在金边市就逮捕了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系统的特务分子张霈芝、农稔祥、张达昌等百余人。在特务分子张达昌家中发现已经挖好的通向大路的爆炸坑道和挖掘坑道的工具，搜出炸药两包，雷管一支，手榴弹一枚，导火索一束和毒药一包。这次行动彻底粉碎了台湾特务机关的罪恶阴谋，保证了刘主席的访问成功。事后，西哈努克亲王感慨地说：刘主席这次访问是用生命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友谊；如果刘主席的安全出了问题，柬埔寨的安全也会成为问题；刘主席这次访问拯救了柬埔寨。

刘主席率中国代表团在柬访问共5天时间。在短短的5天时间里，刘少奇主席以他谦虚温和、平易近人的性格魅力赢得了柬埔寨人民和广大爱国侨胞的敬重和爱戴。刘主席不以大国领导人自居，谦虚谨慎，尊重柬埔寨的民俗和民情，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5月6日刘主席一行安全返回昆明。

由于中央正确的安全工作方针，国内外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动员了数以万计的专业人员和华侨群众，取得了安全保卫工作的完全胜利，粉碎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阴谋。

刘主席回国后不久，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出访工作表彰大会。刘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出席了会议。陈毅同志高度评价了安全保卫工作。他风趣地说：“你们都是无名英雄，碰杯的、照像的是我们，但没有你们，损失就大了。”

（责任编辑 洛松）

邹韬奋

在日伪鼻子下脱险

●王 荫



群贤毕至

1942年，新四军军部统驻在苏北盐阜区阜宁县时，陈毅同志为了加强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与文化建设，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宣传动员一批有名望的进步人士来解放区考察。陆续到达的有著名文学家钱杏邨（阿英）、夏征农、黄源、蒋天佐、艾寒松，还有著名报人范长江、哲学专家车戟、历史学家吕振羽、画家胡考、赖少其、音乐家贺绿汀、舞台美术装置家池宁等数十人。他们到达新四军军部时，受到陈毅军长与盐阜区党政领导的热情欢迎。

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家、新闻出版家邹韬奋先生，也是来解放区的名流之一。当时他在香港办宣传抗日的书刊《大众生活》。香港沦陷后，在我地下党的掩护下，从香港到广东东江辗转至上海，再由上海组织派革命母亲华老太与年仅21岁的王兰芬护送扮成商人的邹先生过江。华手持佛珠扮成岳母，王与邹扮成夫妻通过敌人封锁线，于11月经靖江到南通骑岸镇，受到苏中行署文教处长刘季平等同志的亲切接待。邹韬奋到达东台三仓河（当时属苏中）后，受到一师师长粟裕与刘炎等领导的热情欢迎。邹在该地还考察了一段时间。

此时，因日寇集结重兵即将对盐阜区发动第二次大“扫荡”，陈毅特致电住在阜宁县羊寨乡孙何庄的三师师长黄克诚，委派盐阜行署文教处处长戴伯韬专程去苏中一师所在地，于12月底将邹先生接到三师师部来。当邹先生到达孙何庄时，受到黄克诚师长与张爱萍副师长的竭诚欢迎。张副师长在欢迎会上还赋诗一首，诗云：

报国志气冲斗牛，笔走龙蛇岁月稠，

苏北敌后得幸会，感君正气心相投。

邹韬奋先生因旅途疲劳，身体不太好，加之耳病有时疼痛，需要服药治疗。黄师长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就安排他住在师部，便于军医给予治疗。年底，陈毅军长

托人缝制一件皮袍，派专人送到三师赠给邹韬奋先生御寒。

邹先生来此半个月，经常深入到部队、机关、学校、农民家中走访，与战士、干部、教师、农民聊天谈家常。当时大家只知道他叫李尚清（化名），不知道他叫邹韬奋。他像普通百姓一样，不嫌农民房子矮小，不嫌他们家里脏。与农民座谈，了解他们家庭生活状况与当地风俗民情。他边问边谈边记笔记。有时他还参加地方群众组织会议，他耳闻目睹根据地的人民虽然过着艰苦的贫困生活，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过着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民主自由的平等生活。新四军是官兵平等，同吃一锅饭，同吃一样菜。住在老百姓家里，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群众干活挑水扫地，而群众组织妇抗会亦帮助军队缝、洗衣服，做军鞋慰劳军队。军爱民，民拥军，亲如一家人。加紧生产，参军参战，拥军优属支援前线，同仇敌忾，抗击日寇的生动局面，使他感到无比兴奋。他认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他通过实际调查考察，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希望，他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在写给陈毅军长的信中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送客避难

1943年2月19日刚过完春节，黄、张二位师长考虑到敌寇来扫荡时，对邹韬奋先生的生命安全颇有影响，经商量后，拟把他送到阜东县的临淮乡杨芷江先生家“打埋伏”。因那里离海边较近，比这里安全。必要时可乘海船下海避风。二人商定后便去征求他本人意见，邹说：“听从二位师长安排。”黄师长还向邹简要地介绍了杨芷江的情况，说杨虽是出身地主阶级，在军阀吴佩孚手下干过事，但他却是嫉恶如仇的爱国民主人士，颇

有才华，擅长诗文，与我党我军处得很好，你去后可保安全。目前，我们还有二十多名干部在他那里“打埋伏”。先生如同意去，走时当派部队护送前往。邹先生表示同意，并感谢二位师长对他的关怀。

黄克诚派保卫部长杨帆带一排战士亲自护送邹韬奋去杨芷江家。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行程一百三十多里，于下午三点多钟到了杨庄。杨帆同志对双方作了介绍后，杨芷江握着客人的手说：“以前与先生虽未谋面，却早已闻名，今日得相会，实乃三生有幸。欢迎，欢迎。”便请客人与杨部长走进大门，步入客厅。

杨芷江与客人在客厅中饮茶寒暄几句后，杨帆部长便从口袋中取出黄克诚师长给杨芷江的信件交给杨老。杨看信后，知道日寇集结重兵将对盐阜区进行第二次大“扫荡”。为了保护文化名流，特将客人送到他家休养。他高兴地对杨帆说：“杨部长，你将客人送来寒舍休养，这是黄师长对我杨芷江的信任。不管形势如何恶化，只要我杨芷江不死，我会负责客人的生命安全。请转告师长放心。”杨部长与客人同时表示感谢。

杨芷江为了安排好客人的生活，便派人去后圩将裕生盐场经理王贯三带回来，王贯三来了以后，杨芷江便告知他说是黄克诚师长派杨帆部长送来一位客人，名叫“李尚清”。因身体不好，暂住在此休养。并说：“你的职责是照顾好李先生，李先生有事问你，你知道的就告知他。他有什么要求，你能解决的，就帮助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告知我帮他解决。但有一条，只许他问你，不许你问他。不要问他是从哪里来的？干什么工作的？如有外人来此看到李先生，问他是什么人时，你就说是我家亲戚。”

“是，一定按照四太爷意见办。”

杨帆同志见客人被安妥后，便在晚饭后与警卫排战士连夜赶回师部去了。

次日上午，杨芷江去拜访邹韬奋，他俩一见如故，志气相投。在谈论国内外大事时，对日寇侵华恨之入骨，义愤填膺，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深恶痛绝。二人在谈话中还涉及到文学诗词，滔滔不绝，大有相见恨晚之慨。

一星期后，一向比较安静的沿海农村杨庄一带突然人心惶惶，传说日本鬼子要来大“扫荡”了。这时，黄师长特派人来送信给杨芷江，要他对打“埋伏”的客人多加关心，尤其是对后去的客人注意保护。杨老看信后深知责任重大，但仍充满信心地给黄师长复信，表示我在客人在，与客共存亡。请师长放心。王贯三安排来人吃饱饭后，即将信交给他带回交给黄师长。

杨芷江与王贯三在卧室中商量，敌人要来“扫荡”了，你我生命是小事，而黄师长与宋主任（乃德）送来的二十多名干部必须妥善保护，不能发生意外。商量结

果是杨庄离海边较近，敌人如果来了，我们只有下海为宜。为了有备无患，由王去雇一只海船备用。敌人如来“扫荡”，就上船下海；敌人不来，船资照给。经商定后，由王贯三派人去雇了一只姓汪的海船停靠在裕生盐场北面的海口听候使用。

当晚，杨老先生又和王贯三商量防止日寇“扫荡”以及保护好干部的问题。杨说：“贯三，事到如今，我对你实说了吧。住在我家的李先生不叫李尚清……”

“那他叫什么名字？”

“他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坐牢的‘七君子’之一的新闻出版家邹韬奋先生。”

王贯三听杨老说客人不是李尚清而是邹韬奋时，感到一惊地说：“我看此人的行止举动，就认定他不是李尚清，今天才知他是大名鼎鼎的邹韬奋先生，难怪黄师长对他如此器重与关心。”王接着告知杨老，说他1936年在泰州经商时，就在报纸上看到邹韬奋、沈钧儒、李公朴、史良等7位爱国民主人士，因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误国政策而被蒋介石逮捕入狱，真是了不起的爱国英雄呀。杨老先生说：“正因为他爱国，所以才尊重他，保护他。”

外出“跑反”

邹韬奋在杨庄休养了十多天，对身体自我感觉良好，耳病亦好多了。他认为杨庄临海，空气新鲜，环境安静；其次是杨老先生和王经理对他悉心照顾，提供方便，虽是偏僻乡村，生活安排很好，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民关系是鱼水关系，军民齐心协力抗战，最终必然是抗战必胜，日寇必垮。他想到此处，仰望长空，看到一片光明，发出内心的微笑。他思考着想写部长篇报告文学《苏北印象记》，终因耳痛一直未能下笔。

一向比较平静的杨庄，突然起了波澜，2月20日（农历正月十六日）的中饭后，有一佃户慌忙地跑来报知杨四太爷，说日本鬼子到八滩“扫荡”了。杨老先生当即派王贯三出去打听虚实，看到路上有好多男女老少背着包袱在“跑反”（逃兵荒），还有许多人推着坐有老人和小孩的独轮车在快速地前进；还有儿童怀里抱着老母鸡跟在牵着牛羊的大人后面跑反。他们边跑边向后望，看到远处的日本鬼子已到西边庄上了。这时候还听到稀稀落落的枪声。王贯三向杨芷江报警，杨老先生说：“按原计划办事。”王贯三当即帮助大胡子车载装成私塾先生，送他到后庄佃户张其国家去教书（因他刚来时就安排住在张其国家的）。集中十几个儿童坐在板棚的条桌上念《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这种教学方法，

在解放区叫“跑反教学”，蒙混敌人。

杨芷江的二夫人马文波是个精明能干的女将，是杨芷江得力的“内务部长”，家中大小人都称她为新四太太（因大夫人顾氏尚健在）。新四太太听说日本鬼子要来“扫荡”了，就将事先通知佃户送来的旧衣服，分散给有关“打埋伏”的男女干部穿着扮成农民和家庭妇女模样，交给分工负责的男女农民带着他（她）们“跑反”。宋乃德的夫人陈宜芳等几个女同志就交给几位大妈、大嫂带走。新四太太本人在家留守应付门面，全面负责安排和联络工作。

杨芷江、邹韬奋、贺绿汀三人由王贯三负责带他们外出避风，还有杨芷江家中的厨师邹三保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他是新四太太安排他做通信联络员的。一行五人朝后滩往海边走去，心想，只要上了海船就什么都不怕了。可是，忽然听见西北方向两声枪响，抬头一看，发现西北方黄河滩上有一大批穿黄军装的日本鬼子由西向东走来。王贯三对身旁三人说：“不好，鬼子已经来了，要想穿过盐场上海船是来不及了，只有向东北方向跑了，跑到我六叔王汝椿家再说。”他们跑了一会到了王家门前，见王汝椿站在门外朝四处望呢。王说：“我家靠在路口目标太大，我也准备外出逃难，你们还是向东南方去避避风吧。”王贯三想起向东南一里多路的黄河边上有户姓张的头头舍子不起眼，又认识，先去避避风再说。王贯三把自己的想法告知杨四太爷，征求他的意见，杨说：“贯三，平时在家你听我的，现外出逃难，周围情况你比我熟悉，一切听从你的。你说奔哪就奔哪，跟你走。”在王贯三带领下，他们就向东南方向走去，约莫走了半个小时就到了张家顶头舍子了。王贯三便跨进屋内，见张老爹夫妇坐在小凳上围着泥火盆在烤火呢，王便向二位老人说明来意。张老爹说：“提起杨四太爷，在这方圆几十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个好人哪。跑鬼子是千载难逢的事情，就是我家顶舍子太小了，又脏又黑，有些委屈杨四太爷和他家亲戚了。如在平时，我张老头子用八人大轿请他们来也不会来呀。外面风大寒冷，快，快请他们进屋来暖和暖和。”张老爹边说边站起身来推开门搭子说：“请杨四太爷和各位快进小屋来避避风。”

杨芷江和客人在王贯三搀扶下，低头走进小舍子。他们不顾烧小锅呛的烟糊味，也不嫌脏就在小凳子上坐下。张老爹连忙把泥火盆挪到他们身边让他们烤火，张奶奶摸锅要烧茶。

忠诚老实机灵的张老爹，迎着寒风在小屋周围东张西望看看有什么动静，他心中最大的愿望是敌人不来就好了。他自认为自己和老伴是穷命死都没什么可怕，可是杨四太爷带着两位亲戚在家中避风呢，他们能不出问题就好了。张老爹在默默地祷告着。

天有些黑了，在门外的张老爹忽然听到西边有嘈杂

声，还听见有人叽哩咕噜地在说话，他再细看看，“不好，是鬼子兵来了。”他连忙进屋叫杨四太爷躲进灶门口，抱些草撒在他身上，叫他不要动。他又叫另外两个人躲进房间顶头的土瓮子角落，蹲下来不要动。他还对三个人说：“鬼子要是进屋来，你们不要紧张，一定要沉住气，让我来对付他们。”张老爹还关照老伴说：“鬼子如进屋来，不要怕。他们吓你，打你，宁可死，也不能瞎说。”张老奶奶说：“晓得啦。”张老爹放心地凑到老伴身边耳语了几句后，就同老伴围在泥火盆边烤火啦。

天黑了，张老爹听到屋外有人说话，又听到咯吱咯吱的皮鞋声，他用胳膊轻轻地捣了老伴一下，张奶奶心领神会地说：“我听到了。”

这时候有两个伪军走至顶头舍子门前，伸手把门搭子一拉后就伸头朝屋内望望，黑黢黢的。高个子伪军问道：“屋内有人吗？”不见有人答话，就听到老人的咳嗽声和病人的呻吟声。他拿起手电筒一照，看见个老头子和老奶奶坐在火盆旁又咳又喘的。两个伪军就跨进屋内，尚未开口就闻到刺鼻的烟糊味，把他俩也呛咳起来了。张老爹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说：“先生，你们若不嫌小舍子脏，请坐下来烘烘火，暖暖和和呀。”

高个子伪军问：“老头子，你家怎么不点灯的？”

“先生，人穷，没钱打火油呀。”

“老头子，你家没有新四军？”

“嗨，我家巴掌大的地方，那块能容个新四军呀。”张老爹边说边咳嗽。

“老头子，你家里如果窝藏新四军，那是要砍头的。”

“我晓得啦，兵荒马乱的年月，那个还敢找罪受呀。”

张老爹接着对张老奶奶说：“奶奶，你去刷锅烧点茶让两位先生喝了暖暖身子呀。”

“只要他们二位先生不嫌脏，我就来烧。先生，乌黑的，请你把手电灯亮起来，我好刷锅烧茶呀。”张老奶奶边说边摸锅盖了。

矮个子伪军听说叫他们亮手电筒让她刷锅烧茶，有些生气地说：“少废话，你家脏死了，谁要喝你家的茶！”

张老爹看势头有些不对，就顺口说：“奶奶，先生嫌脏，你就不要烧茶了”。边说边咳嗽了。张老奶奶说：“先生，我们是穷老命苦，老头子死苦死做，没得好的吃，苦出个肺病来，又没钱买药吃，老是咳咳哄哄的，对不起人哪。”

“什么！他有肺病？”两个伪军惊讶地问。

“唔哪，先生，不要害怕，人家说我这个肺病不过人呀。”张老爹说。

“他妈的，你老东西骗人，那有肺病不传染人的？排长，快走吧。”矮个子伪军边说边把高个子伪军拉至门外走了。

张老奶奶见两个伪军走了，双手合十：“阿弥陀佛，

这些杀千刀的早走早好。”这时张老爹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外前后左右张望，在暗淡的月光映照下，见一趟黄军装部队向朱庄方向去了，他欣喜地转身进屋点亮了小火油灯，把躲在灶门口的和房内的客人喊出来，替他们身上掸掸拍拍，扶着他们在小凳上坐下。他们三个人深深地松了口气，杨老先生说：“这次敌人来此，虽未出问题，但给你们二位（指邹、贺）受惊了。邹韬奋淡淡一笑说：“没问题，像这样的风险，我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已碰过多次了。今天没出问题，多亏您二位帮了大忙了。”

张老爹连忙说：“不！不！今天没出问题，都是你们祖上荫功积德保佑的，谢天谢地。”

贺绿汀接着说：“不！我们应向张老夫妇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老先生说：“这次化险为夷，都是张老夫妇戏演得好呀。你们老两口同‘和平军’的对话，我都听到了。”邹、贺二位也同时说：“我们也听到了，想不到老两口足智多谋，唱了一出《空城计》，就把敌人吓跑了。”

“你们都说到哪儿去了，中国人帮中国人是应该的。只有那些‘和平军’同狗汉奸，帮助鬼子打家里人，将来都不得好死。”张老爹说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拿起斧头将这帮坏蛋通通砍死。

邹韬奋见此情景无限感慨地说：“想不到解放区的一个乡村老农如此充满爱国热情，令人钦佩。”他心中想：这次下乡跑反，虽然受了一点惊恐，但也受到教益，使我从杨芷老一家与王贯三以及张老爹夫妇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

张老爹看着大家高兴的样子，开口说啦：“杨四太爷，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什么话，请只管讲。”

“‘和平军’虽然走了，假如再回来怎么办？我家这条路通往朱庄，还不够安全。你们最好再重找个地方躲避才好。但话又说回来，我是为你们着想，而不是撵你们走哇。这块向西有户人家叫毕顺才，与我家有亲，他是个老好人，也有新四军干部在他家打埋伏呢，他家那块比较僻静，不靠路口，比我这块安全，你们如果想去，我现在就送你们去。”

杨老先生说：“那就谢谢你了。”

“说到哪去了。俗话说：“‘摆渡摆到江边，送佛送到西天’嘛。”

杨芷江告别了张奶奶就随张老爹摸黑向西到毕顺才家去了。”

魔鬼上门

在杨芷江、邹韬奋、贺绿汀等外出避风三个多小时

后，就有身挂驳壳枪的伪军约30多人来到杨庄，为首的是一脸大麻子的徐继泰，原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1938年冬，日寇侵占淮阴、涟水等地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韩德勤为了维持苟延残喘的统治局面，建立了涟阜沐灌游击指挥部，任命徐继泰为游击总指挥。徐还兼任江苏省保字第七旅旅长、海洲行署专员等职。后在日寇高官厚禄的诱引下徐继泰投降了日寇，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成为民族败类的汉奸徐司令，配合日寇下乡大“扫荡”，与人民为敌。这次，日寇在盐阜区进行第二次大“扫荡”时，他主动把日军引到靠废黄河两岸的朱庄、张庄、六合庄一带之后，他就带领部分伪军直奔杨庄而来。

徐继泰听说杨芷江不在家，就查问起在他家打埋伏的干部。“那你家还有几位客人哪儿去了。”

新四太太知道徐话中有话，就说，“以前来过的客人都早已走了。”

徐继泰知道新四太太能言善辩，不肯说实话，于是便向新四太太交底说：“四嫂，请你不要害怕，这次到这一带来，是我主动要求来的，所来的军队都是我手下的‘和平救国军’，日本鬼子是不会来的，你放心好了。住在你家的几位大人物，大干部，叫他们出来会会，我是不会伤害他们的。”

新四太太还是搪塞地说：“徐总指挥，你不要听信外人谣传，我家哪里有什么大干部、大人物呀。”

“有！你不说，我来说两个名字给你听听。”他边说边从口袋中掏出小笔记本子，看了看说：“有个大名鼎鼎的大人物叫邹韬奋。还有大胡子学者车载，还有一个会拉西洋琴的叫什么贺绿汀的，也在你家，还有、还有……”

新四太太见徐继泰一连报出几个名字来，心里也有点紧张，但她还是故作镇静地说：“这几个人是在我家住过两天，但他们早已走了，你如不信，在我家搜查嘛。”新四太太把脸板下来，假装有点生气了。

徐继泰见新四太太生气了，连忙打招呼说：“不不！请四嫂不要误会，我们徐杨二家既是世交又是姑表至亲。四太爷又是威震一方有名望的长者，我今天特来拜访，恰巧他不在家。我刚才提到的几个人名字，目的是想会会他们交个朋友，我如果想抓他们，也不同你谈这么多废话了。我今天来到杨庄，决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你如不信，我可对天发誓。”徐继泰见新四太太不相信他的话，心情有些激动要对天发誓。

新四太太见徐继泰态度诚恳，且未带鬼子进庄，只是他与副官来此，便态度和蔼地对徐说：“徐总指挥，我是自家亲戚，赌咒发誓也没有必要了，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世道不公呀。我对你实说了吧，四太爷今天听说日本鬼子要来“扫荡”，就带着两位客人下海避风了。

“噢，下海避风了？！如上了海船下海避风可能平安无事；如未下海，也很可能带来麻烦。”徐继泰说到这里就问：“四嫂，你可知道四太爷他们现在什么地方？如知道，最好派人把他们带回来比较安全，因为杨庄这一带清乡任务是我负责的。”新四太太见徐继泰说到如此程度，觉得可信，便对徐说：“徐总指挥，我把四太爷他们找回来，你定要言而有信，不得伤害他们的一根毫毛。”

“那是自然。”

新四太太随即把先前回来报告情况的邹三保叫来，叫他去把四太爷和客人带回来。

威镇敌胆

杨芷江一行五人回到杨庄时，杨便叫邹三保把邹韬奋先生等带到宿舍去休息，而他自己就进入客厅，徐继泰见杨老回来便迎上前来热情地说：“四太爷，你回来了，回来的好，回来的好。”

“啊呀，稀客登门要我回来，怎能不回来！形势复杂呀。”

“形势复杂，没关系，这次日军到这一带来清乡，是我把他们引导到朱庄、张庄那一带去了。他们不会来杨庄的。”徐继泰讨好地说。

“是吗？那要谢谢你了。”

“谈不上谢。”

“继泰呀，听说你给日军办事有功，加官晋爵，恭喜恭喜。”杨芷江冷言冷语地给予挖苦，目的是想教训教训他。

徐继泰听到杨芷江话中带刺，气得麻脸通红，但他还是耐着性子说：“小弟和仲华一样，是‘曲线救国’。”

“曲线救国？！哈哈，多好听的名字呀。噢，请坐、请坐。”杨老先生放了一通冷枪后，又把弦子松了一松。

“四太爷，小弟直说了吧，有人告密，说你家窝藏共匪。”

“什么！窝藏共匪？”

“不不不，说你家窝藏共产党。”

“老朽当年在吴佩孚手下干事，后因军阀混战，百姓遭殃。我不愿为虎作伥，便卸职回乡，享受田园之乐。我不愿为官，但爱重义气，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格言，在处事方面，不管哪路朋友我都接待，但不一定同流合污。你徐总指挥来此我也接待，照你的话说，我也犯窝藏汉奸之罪了。”杨芷江针锋相对的犀利语言，使徐继泰无言以对。他只好见风转舵地说：“四太爷言之有理，那就把你的朋友请出来会会，特别是邹韬奋先生，我想会会他。”

杨老先生听徐继泰提到邹韬奋三个字，感到有点紧

张。为了维护邹先生的安全，他以冷静的态度矢口否认地说：“我家没有邹韬奋这个人。”

“请不要再瞒我了。我不是日本人，你老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是为保护朋友而来的，据可靠情报，邹韬奋先生是三师师长黄克诚派人用轿子抬送到你家的。”杨老先生还是一着不让地说：“我家来客甚多，有腿跑的，也有坐车的，还有坐轿的，他们都是铁骨铮铮的爱国者，而不是民族败类。”

徐继泰听到“民族败类”四个字，犹如刀刺心窝，他气愤地说：“你，你，你……”边说边用右手去摸腰间的手枪。杨老看到徐继泰的举动后若无其事地说：“我和这些朋友是同生死，共患难。为了尽到朋友的责任，我对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不过我希望你能言而有信，遵守我提出的三个条件。”

徐继泰见杨芷江软硬兼施，自知这个倔强的老头不好对付，便放下手说：“四太爷，我虽参加了和平救国军，但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今日就是为了保护你和你的朋友而来的，你如不信，我可对天发誓。”徐继泰见杨芷江对他的讲话无动于衷，又接着说：“今天是我前来的，乃是你们万幸，若是别人前来搜查，那就麻烦了。”

“不用搜查，我来了。”说此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邹韬奋先生。他在紧靠客厅的另一间卧室中，听到杨、徐二人唇枪舌剑，气氛紧张。他深怕为了自己而连累杨老先生与其他打埋伏的同志，在这关键时刻他挺身而出，迈步走进客厅，大大方方地坐在中间的空椅子上。

徐继泰闻声见人，心中一惊，抬头细看此人，头戴灰色礼帽，白净的面孔上戴着一副玳瑁边框的眼镜，身穿棉袍，足登皮鞋，年约40多岁，文质彬彬中显得器宇轩昂，目光逼人有一股锐气。他便走上前去问道：

“你是……”

杨芷江见邹韬奋突然前来，暗自吃惊。他见徐继泰上前问话时，便主动抢先说话：“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李尚清先生，这位是我的亲戚徐继泰徐总指挥。”

徐继泰对邹韬奋仔细望后说：“今日看到李先生，倒使我想起一个人。”

“谁？”

“邹韬奋，抗战开始后的1938年，我在冯玉祥将军部下工作，当时，邹先生在武汉当局召开的上万人的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我见过他，很像你。”

“噢，当时你也在场？”邹先生问他。

“是，我在场，当时我是带领部队在台下值勤的，邹先生的锦绣文才和滔滔不绝的口才，讲述抗战道理，有理有据，获得台下听众多次如雷的掌声，令人信服。”

“是吗？可你徐总指挥就没信服嘛。”邹韬奋抓住徐的话柄当场予以还击，说得他只是“这这这……”的吱

唔着。邹韬奋接着说：“徐总指挥今天把我当成邹韬奋，真是太有意思了。如果邹先生今天真在这里，你对他如何处置呢？”

“我悔恨自己未按照先生当年指的道路走，而成了罪人。邹先生若是在此，我当尽力保护他。”徐继泰似带羞愧地说。

“噢，你打算怎样保护他？”

“日军下乡‘扫荡’时，我可保证他生命安全；其次是听说他患有耳疾，我可派人到青岛去购办进口药品给他治疗，或者直接送他去青岛大医院治疗。”

“你对邹先生为何如此关心。”

“我想和他交个朋友。”

“交朋友？哈哈，”此时邹韬奋振作精神表明自己的身份说：“你徐总指挥眼力真好，告诉你，我就是你要保护的邹韬奋。”

杨芷江千方百计地掩护邹韬奋，说他是李尚清，没想到他却承认自己是邹韬奋，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说：“这个……。”这时候徐继泰也有些惶恐，稍一定神说：“原来真是邹先生驾到，失敬失敬，学生不到之处，请多原谅。”说罢，还立正行了一个军礼。

邹韬奋神情严肃地说：“现在中国受日本侵略，你为什么不抗日？反而当汉奸，助纣为虐，残害百姓，还打共产党。你的良心何在？”

徐继泰被邹韬奋训得哑口无言，无奈地说：“我徐继泰曲线救国，是经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请示蒋委员长批准的。我不是真心当汉奸，而是为了保存实力。今后当听从邹先生的教诲，决不干危害人民的勾当。”

“既然如此，希望你说话算数，要为国为民着想，不要成为千古罪人。”

“是，是！”徐继泰有气无力地在应付着，他脸庞发烧羞愧地低下了头。正当他寻思如何脱身之计，邹先生忽然耳病发作，感到疼痛，脸上冒出虚汗，杨芷江连忙扶他坐在椅子上休息。杨对徐说：“徐总指挥，邹先生劳累了，今晚就谈到此为止。希望你对邹先生的金石良言，认真思考。”

徐继泰应声：“是，是。”

此时，杨芷江看看怀表，已是深夜12点多了。他叫来汪士太吩咐他办两件事：一是叫厨师办夜餐，招待徐总指挥与弟兄们；二是安排一间厢房，让徐总指挥休息，弟兄们就安排在隔壁八太爷家住宿。汪士太说声“照办”，就出去办事了。杨芷江又搀扶着邹到宿舍休息。

次日上午，日本鬼子扫荡队伍，从六合庄、朱庄撤回废黄河西了。徐继泰也跟着撤回去了。

徐继泰走出杨家大门后，杨芷江便去邹韬奋的宿舍对邹说：“邹先生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使徐继泰无地自

容，先生的胆识，令人钦佩。”

“哪里，哪里，对待敌人就是要针锋相对，比起杨芷老是微不足道啦，你衷心拥护共产党，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为掩护朋友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使我终身难忘。我为交到你这位朋友而感到自豪。”邹先生对杨老先生舍身救人的高尚品德也深为感动。他接着说：“中国人民要解放，必须团结一致，打倒列强，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才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对！你说得对。”他俩为意气相投，目标一致而仰面哈哈大笑。

送客去沪

次日，邹先生感到耳痛厉害，虽经贾医生打针服药治疗，效果不佳。杨芷江怕敌情有变，为了他的安全与健康着想，经与宋乃德同志联系后，雇了两辆独轮六合车派他女婿杨宗源护送邹韬奋与贺绿汀去笆斗山宋乃德部下，在该地住了几天后，复又转送到盐城东面龙王庙三师师部，他在该地住了一段时间，目睹了华中军民反“扫荡”胜利情况后，十分感慨，他对黄师长说：“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之伟大成功，绝非谎言，余不亲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黄师长对邹先生的耳痛十分关心，据医生诊断是患耳癌。在征得邹本人同意后，派人送他乘海船去苏中一师转上海治疗。临行前，黄师长送给他与贺绿汀一笔路费和开支。张副师长还亲往海边送行，并赋诗相赠，诗云：

义愤填膺荡寇仇，君染沉痾志未酬，

我军掩护解重难，就医千里送行舟。

日寇从2月12日开始，集结日伪军2万余人，对盐阜区进行第二次大“扫荡”。在我军民合力抗击的50多天的反“扫荡”中，终于使敌人以失败而告终。胜利是属于人民的。

邹韬奋先生去上海后住院治疗，经确诊为耳癌，医治无效，于1944年7月24日逝世，享年49岁。中共中央接受他遗书中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重要著作编有《韬奋文集》。1944年11月在延安举行邹韬奋同志追悼大会时，毛泽东同志题词指出：“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责任编辑 舒元璋）

郎平回国 意在重振 女排雄风

●周 童



郎平和中国女排队长赖亚文

一个人的一生要面临许多次抉择,然而对于郎平来说,祖国的利益是她永远不变的选择。

杨伯镛越洋透消息

中国女排兵败圣保罗后,曹慧英心急火燎地把在京的陈招娣等几位老女排队员叫到一起,感叹伤心之余,不由激动地建议:“不如咱们辞了现在的职务,组成两支队伍,比着练、赛着练、帮着练,不信夺不回亚洲冠军,不信杀不回世界前三名……”

尽管这不过是急于求成的一番气话,可忧虑之情无法掩饰。

1994年,中国女排在广岛亚运会和圣保罗世界锦标赛的相继失利,使国内舆论大哗,“中国女排究竟怎么啦?”“中国女排到非抓不可的地步了!”等文章见诸报端。

中国女排内部也是一片混乱。教练班子的不团结,教练与队员之间矛盾已使队伍陷入失控状态,对教练的信任危机使队中5名主力队员表示要离开国家队……

有着“五连冠”辉煌的中国女排落到这种地步,全国排球界人士再也不能沉默。1994年12月28日,

在北京老山举行的“国家男女排球队工作汇报及重振排球雄风研讨会”上,来自全国重点排球省市的代表们认真分析了中国女排存在的问题后一致认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女排滑到了18年来的最低谷,再不整顿,全国排球界不答应,全国人民不答应。29日下午,女排24名代表公开表态,绝大多数赞成更换中国女排主教练,并要求新一任主教练应通过民主程序、经考评产生。

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和推荐,产生了7名候选人,郎平是其中唯一不在会的候选者。

会后,中国女排教练考评组负责人、国家体委竞训二司司长杨伯镛,通过越洋电话把这一信息通报给了正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学攻读体育管理硕士学位的郎平。

八考官一致选郎平

岁末年初之交的电话,令郎平彻夜难眠。

出国8年,祖国和中国女排依然是她心中的最爱。

1990年,当胡进请她回国帮助年轻的中国女排备战第11届世界锦标赛,争取从世界第三的位置朝前冲击时,年届30,正在意大利摩

迪那俱乐部打球的郎平,就曾放弃同丈夫去夏威夷度假,也曾放弃和克罗克特(前美国女排著名主攻手)角逐美国沙滩排球明星赛高额奖金的计划,利用假期重返中国女排,带着伤病坚持训练,用实际行动鼓励年轻的队友们为着成功去拼搏,为中国女排最终赢得世锦赛亚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94年世界女排大奖赛,中国女排接连受挫韩国队网下,实力水平开始明显滑坡后,和每一个老女排队员一样,郎平对中国女排的前途和命运更为关心。

广岛亚运会,郎平每天从美国打长途电话,向在香港工作的丈夫询问排球战况,得知中国女排败给了韩国队,丢失了保持15年的亚洲霸主的地位后,郎平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最后伤心地感叹了一句“想不到我们要回到冲出亚洲的地步……”

接踵而至的第12届世界女排锦标赛,郎平原准备自费前往巴西观战,虽然最终没能成行,但她时刻关注着赛事的进程。小组赛后,中国女排接二连三地输给韩国、德国、日本队,几乎溃不成军地跌至第8名,郎平不由感到剧烈的心疼和震惊。

当然,理性地说,世界上不可能有常胜将军,但是,有着“五连冠”辉煌的中国女排如今滑到要重新冲出亚洲、成绩几乎与世界三流队为伍的地步,不能不让人感到形势的严峻。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1995年是个至关重要的年份,亚洲锦标赛能否打翻身仗,不仅关系到能否遏制滑坡态势,更关系到世界杯的成绩与亚特兰大奥运会入场券,此时,无论谁来执掌中国女排的帅印,风险和压力都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祖国和中国女排培养出来的一名优秀运动员,在女排处在最困难的关头,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在全国排球界的呼唤声中,郎平知道自己有责任挺身而出。

1995年1月15日凌晨,郎平从美国发回文传:“是祖国和中国女排这个光荣集体培养了我,在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决定参加竞选。”

当日上午的中国女排主教练考评会上,郎平这份文传一经宣读,与会记者就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尽管随后张仁江、林渝廷、冯正海三位候选人(另3位候选人因各种原因退出了竞选)宣读的“施政纲领”都各有特点,但比较而言,大家更看好郎平。

无论硬件看、软件比,郎平的优势都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她是中国女排“四连冠”的主力队员,而且和张蓉芳共同执教了夺取“五连冠”的战役,有着一定的执教经验;同时,她又是世界排坛著名的主攻手,不仅有着极高的专业水平,而且对中国女排成功的艰辛、拼搏精神的实质、对国际赛场的残酷都有亲身的体验与感受。

其次,去美国留学7年,她从学语言到攻读体育管理硕士学位,不仅具备了及时了解国际排坛最新动向、与世界排球界人士面对面交往的外语能力,而且专业知识的素养,也使她拥有了走上教练工作岗位后

所具备的能力。

第三,退役十年,她从没脱离过运动场,而且有着成功执教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学女排、承担美国排协全美国训练中心总教练的经验。特别是1994年出任由多国世界级球星组成的“八佰伴全明星队”主教练时,不仅表现出良好的组织才能与指挥才能,而且在与中国女排进行的15场比赛和与全国12支甲级女排进行的50场比赛中,对国内女排的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

郎平的才能,早在4年前引得前美国女排主教练塞林格以十万美金的年薪相邀,傲慢的山田重雄更是信任地把亚洲第一支职业女排(八佰伴)交由她带,就连当今排坛最富盛名的教头欧亨尼奥先生,也放心地把古巴队的灵魂路易斯等人交给郎平“打理”过。那是在“八佰伴”系列赛最后的压轴戏——世界超级明星联赛队对日本女排的比赛上,欧亨尼奥坚决推举郎平出任了路易斯、玛加莉、贝尔、莉莉、凯伦、阿尔塔莫诺娃等当今排坛顶尖级球星加盟的“超级明星队”主教练,并真诚地对郎平说:“我看过你的训练,由你带队没有问题……”

此外,郎平曾在意大利摩迪那俱乐部打过球,对国外排球职业化有过亲身的体验,对现代排球运动的管理、训练、竞赛模式都不陌生,对现代排球运动技术战术的发展现状更是了如指掌。

果不出所料。经过一番综合评估,中国女排考评组的8名考官,一致同意提名郎平为中国女排新一任主教练。

慷慨解囊 朱树豪排除障碍

事已到此,岁末年初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女排人选问题似乎尘埃落定,只欠东风了。

然而,好事多磨。郎平发回的文传里提到的有待“在中国排协帮助下解决的自身困难”,成为她归来执教的最大障碍。

在郎平的原订计划中,1995年的工作已安排得满满的。首先是要在5月参加体育管理硕士学位的毕业考试,这是她1987年赴美留学定下的目标,虽然其间因为经费问题和生孩子,执教“八佰伴”中断过一段,但是,对知识的渴求,对将来人



右起:陈招娣、郎平、曹慧英、张蓉芳

生的定位，郎平从来未曾动摇过完成学业的决心。其次是参加5—8月举行的全美沙滩明星赛，这在美国是一项很有影响且奖金极为丰厚的赛事，和克罗克特配对的郎平，在上一年度的沙滩明星排行榜里，已是位居前列的“高手”，只要打一个赛季，收入就是十分可观的。此外，女儿1岁半后，忙于带队比赛的郎平就把照顾孩子的重任交给了丈夫白帆，眼瞅着女儿就满3岁了，这是孩子情感和智力启蒙的关键时期，作为母亲应该负起全部的责任。因此，郎平早就和丈夫商定，1995年全家在美国团聚。

除了个人和家庭的计划，郎平还受着合同的约束。

由于成功地执教了“八佰伴”超级明星队，郎平在美国的知名度激增，聘用合同纷至沓来，已签订了就有包括新墨西哥州女排在内的好几家俱乐部。

根据美国法律，合同签订便具有法律效应，要解除就必须交付赔偿金，那将是一笔数目不菲的钱。

还是在少年体校时，郎平就有个理想：长大了做一个她的启蒙教练那样的排球教练员。退役后，她虽和张蓉芳共同执教过在1986年世界锦标赛实现五连冠的中国女排，但是，这毕竟跟自己亲手组建、训练、管理和培养一支队伍不一样。因此，出国留学几年来，郎平从没离开过排球，而且尝试着干过从大学排球到俱乐部排球在内的各种教练工作，特别是在执教“八佰伴”期间，不仅积累了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水平运动员的训练和管理工作的经验，而且指挥过象路易斯、凯伦这些著名球星。几年来积累的经验与知识，如能运用在执教中国女排的实际中，这该是多么有意义呀！

为了祖国和中国女排的需要，郎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割舍家庭亲情，然而，合同的约束就不是个人的愿望所能改变的了。

郎平去找新墨西哥州女排老板约翰，希望能就解除合同达成某种谅解。约翰一听就不高兴了。因为排球是他这个俱乐部1995年新推出的项目，而且他把所有的策划、广告、招生、训练、比赛等工作全都交给了郎平，郎平这一“撤”，等于是“釜底抽了薪”，他当然不乐意！他说：“进行中的工作怎么办？前期投入的损失谁负担？如果你真要解约，那么按照法律，请交纳赔偿金。”在金钱和法律问题上，美国人是毫不含糊的。

怎么办，面对这自身的能力无法跨越的金钱屏障，郎平一愁莫展。中国排协无法支付这笔巨款，郎平也不愿意让国家为她花这笔钱。她说：“如果让国家花这笔钱，我宁肯不回……”

一石激起千重浪。

新闻舆论迅速报道了此事，国内一些企业界也立刻作出反应，愿意出资帮助郎平归来。但是，这些都只是杯水车薪。

进退维谷之际，一向关心和支持祖国体育事业的香港知名人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足协副主席、中国高尔夫球协会董事长朱树豪先生，得悉此事，立即致函中国排协主席袁伟民：“我有责任和义务促成郎平回国执教，为中国女排重振雄风尽绵薄之力，不管是什么困难，我来解决……”

与郎平素昧平生的朱树豪先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和无数在海外的同胞一样，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后给他们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尊严，亲眼看到了在改革的大环境下，体育对经济生活的巨大推动力。从那以后，中国女排在他的心里就占有了特殊的地位。

“女排有难，匹夫有责”，朱先生迅速指示他在美国的公司和律师与郎平的律师取得联系，经过多方协商、共同努力，妨碍郎平归来的诸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柳暗花明，郎平终于能踏上归途了。

善解妻意 白帆揽起家务事

作为老女排的一员，郎平不仅清楚地知道中国女排的世界冠军是从每一堂训练课中走出来的，而且更深地理解了拼搏精神的内涵。如何面对人生新的挑战，她眼前浮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当年袁伟民执教时的景象。

归国前，她同丈夫商量：“当年袁（指）导为了带好我们，投入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以至儿子长到6岁都不肯叫他‘爸’。这次回去面临的困难很多，工作量也非常大，假如你和孩子离我远一些，我便能没有任何牵挂地投入工作。我知道在你这个年龄也正是干事业的黄金时期，孩子交给你，你的担子更重了……”

“排球是你的生命，既然祖国需要你，女排需要你，你就要全身心地干，去干好，不辜负这份信任。家里的事有我，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女儿带好，无论中国女排需要你干多久，我都会支持你，无论你离开我们多久，你永远都是浪浪最好的母亲、是我最爱的妻子……”丈夫白帆是在郎平最需要的时候理解和支持着她。为了不让妻子分心，他谢绝了家里主动为他们带孩子的建议，和女儿浪浪留在境外，独立挑起了一份为夫为父的责任。

郎平这种“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选择也得到了她在美国的众多朋友的钦佩。在为郎平壮行的欢送舞会上，“郎平好样的！”“加油哇，郎平！”“祝你好运！”五彩的小旗、小汽球上，写满了朋友们真诚的祝福。

尽管由于郎平的退出，使准备全美沙滩明星赛的训练中途夭折，但郎平的好友、前美国女排队长金伯莉没有抱怨，她搂着郎平的肩幽

默地说：“希望你尽快把中国队带回世界冠军的位置，我还要等你回来一起夺全美沙滩明星赛的冠军呢……”

欢送舞会上，朋友们集体送给郎平一套印有奥运会图样的运动服，并告诉她：“希望你回中国执教时穿上它，就象我们在你身边一样，我们会为你和你的排球队祝福，祝你们成功……”启程之日，郎平的挚友——在新墨西哥州大学女排执教时的搭档劳尔，一直把郎平送到机场，她把一大捧鲜花送到郎平怀里说：“一个运动员能参加奥运会是最幸福的事，一个教练能率领她的队伍打入奥运会赛场更是了不起，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一定会带领中国女排登上飞往亚特兰大的飞机，到时候我还会带着鲜花来接你……”

1995年2月15日，带着朋友们的祝福与鼓励，郎平乘坐美国航空公司853航班回到北京。

执教初露锋芒 夺魁任重道远

最先让郎平感到压力的是记者。

归国之前，郎平就曾电告国家体委“希望平平静静地归来”。然而，当郎平刚步出机舱门，守候在门口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体育沙龙”的五套班子的数架摄影机就把镜头、话筒对着她，把聚光灯照向她；当如潮水般涌来的记者在首都机场海关冲破警卫人员的“围追堵截”，对她发起“狂轰滥炸”式的采访时，郎平惊讶了：“我没想到会来这么多记者……”惊讶之余是沉思。

对于郎平的决定，不少朋友为她捏把汗：“你做了这么多的牺牲，万一不成功怎么办。”郎平也清楚，中国女排现存的问题不可能因为她的归来就能迎刃而解，更不能保



郎平与父母在机场合影

证肯定能夺回世界冠军，所谓“下山容易上山难”，重新爬坡需要艰苦的努力，更需要时间。这么多年来郎平虽然没有离开过排球，但对中国女排的了解毕竟还是有限，做教练时间不长，能在多大程度上，多长时间里重振中国女排，的确很难说，或许尽了最大努力，但因为运动员素质不够，基本功太差，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她们送上领奖台；或许因为某一位置找不到合适人选前功尽弃……但不管结局怎样，只要尽了最大努力，队伍比过去有了进步，能为后任者打点基础，为中国女排重振雄风铺平道路，也就不虚此行。

风险是压力也是动力。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郎平坦率地说：“我感觉到大家对我的希望。希望大压力也大，我不是神，不可能因为我回来了，中国女排马上就能打翻身仗了，就可拿金牌了。女排的问题还很多，需要一点一点地解决，希望给我一些时间、一个机会、一个环境，让我沉下心来，放开手脚去干……”郎平的承诺是谨慎的，正因为谨慎也就更有分量。从那以后，郎平就象一个朝圣者，为了心中的目标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从带训练课到思想工作，从写

教案到研究技术战术，郎平不仅亲力亲为，而且细而又细，详而又详。全队12名姑娘，技术战术情况她了如指掌，伤病程度她也一一在心，谁差什么，谁该补什么，谁该调整体整，她心里总是明镜似的，但是，唯独忘记了自己。腰伤、胃病、眩晕轮番折磨着她，可她从没因此离开训练场半步。郎平用心爱着自己的队员，每个过生日的姑娘都得到过一份她赠送的精美的礼品；然而，当丈夫利用10天假期把一年多没见面的女儿带回北京时，郎平竟拿不出半天时间陪孩子去游乐园……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8个月后，拥有半数新人的年轻的中国女排不仅如期实现重新冲出亚洲的目标，而且以世界杯季军的身份，拿到国际排联首批进军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人场券。

郎平不是神，但她却使中国女排有了神速的进步。

时光如梭，转眼一年过去了。忙着备战奥运会的郎平，或许没有时间去回忆过去那“365里路”的艰辛与喜悦，但是她绝忘不了促使她作出人生最重大抉择的动力：重振女排雄风。

（责任编辑 舒 蓝）

双龙



挑战



好莱坞

● 东方舟

我每次观赏电影，都揣着一个问号：看演员在片中如何展示中国人的形象？

也许为了钻研这个课题，我在香港看港产功夫片，对功夫巨星李小龙、成龙几位开路先锋抱有浓烈的兴趣。

过去，香港观众在没有自产片的年代，只能从舶来片中看到中国人的形象。《溅花泪》（美国1919年制作），算是到港最早的一部影片，该片中的男主角（中国佬）是一条光棍汉，叫张好，在那里勤力苦干地经营一间古玩店，黄皮肤，瘦骨嶙峋，长眼角，低眉顺眼，唯一的嗜好是狂吸鸦片，此人从来不去接触女性，而自身却被“女性化”了，终于在洋拳师及其洋朋友的追逼之下自尽。《溅花泪》之后，辱华、排华、反华的西方影片，纷至沓来，充斥港市。海外华人世代代看这类无休无止的辱华辱祖的西片，能无动于衷？他们失望、愤懑，但是，影片的制作权、发行权完全控制在西方电影王国的手里，岂奈何他们！许多老华侨、香港同胞偶尔能看见来自祖国的“国产片”喜笑颜开。如《狄青大闹万花楼》、《飞将军》、《海外女侠》、《民族英雄》等片传到南洋华侨社区，当地华侨就争着看。自从香港建立了本埠电影制作公司，陆续把港片推向南洋，华侨社区看港片的机会多了。

从六十年代起，香港影业掀起“功夫片”的热潮。其时，香港报章上也连篇累牍地推出武侠传奇，查良镛先生以“金庸”笔名推出《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鹿鼎记》、《飞狐外传》等。这样一来，动作片、功夫片和侠义小说相互激荡，在维多利亚港湾掀起层层波浪。香港影片从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水浒传》、《封神演义》到现代侠客传奇、江湖春秋中选取题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香港、澳门、台湾及海外华人居住地区，这类影片很受欢迎。

李小龙隔洋试锋芒

在香港或海外的一些华人演员，面对如此时机，也急于踏入影坛一试身手。李小龙，是一个勇敢先行者。

李小龙，1940年1月，生于美国三藩市唐人街。他的父亲李海泉是粤剧名丑。李小龙第一次上银幕，是在其父参演的《金门女》一片中“客串”一个婴孩角色。他不满10岁，就主演了《细佬样》一片。六十年代，他在西雅图开设“中国武术馆”，当地许多华人子弟前去从师；不少洋拳师领教过他的中国功夫，被他一一击败。从此李小龙的“一时拳”、“连环脚”和整套中国功夫名震美国。其时，西方影视业也希望借他作“点缀”。美国ABC电视台筹拍《郎士列特》时，就聘请李小龙去向参演者传授他的搏击术，他本人也在此片中担任了功夫师

傅的角色。此片拍完后，李小龙意欲留在美国站住码头，他曾向美国华纳公司巧妙地“毛遂自荐”。先给那家公司的制作部主任汤·古恩讲了一个中国故事，话说晚清时代，少林寺有位僧人，因杀了一名皇族成员，被官府追缉，逃亡到美国西部，靠一身中国功夫和善与人处的美德，在美国落户。那位制作部主任对李小龙口述的故事很感兴趣，但对李小龙这个“身材太矮”、“太中国化”的演员条件百般挑剔，毫无留意。最后，这家公司撇开李小龙，将那故事改编成电影脚本，片中设计了一个中美混血儿（叫金桂祥）替代了故事中的原有人物少林僧，且由美国演员大卫·卡拉甸出演。李小龙徒劳无获，十分气恼。他负气到香港，发奋图强，决心以香港为“永久码头”，靠一身地地道道的中国功夫，演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男子汉，拍出英雄主义的东方片，去挑战白种人把持的西方片。李小龙返港几年，果有几部发愤之作，打得很响。影评界人士有所评价，认为李小龙由美国返港后，主拍的片子都“很个性化”，反映他的鲜明性格：倔强却抑郁，叛逆却浪漫。他出手不凡，也敢于死缠烂打，但在与对方交锋的高潮中，他最喜欢用慢镜头，故意使对手的临死瞬间拖长，使自己的吟啸徘徊于观众心中经久不散，使观众去分享胜利者的喜悦，同时去欣赏失败者的下场。明眼人还从李小龙主拍的多部“功夫片”中看到一个共同特点：他的片子中极力塑造国人的正面的、敢于同邪恶争斗的形象。《精武门》一片打的是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鬼子，《龙争虎斗》一片打的是美国杀手。许多华人长年在海外、在港澳饱受外国种族主义歧视，感受到殖民主义压迫，终于从李小龙演出的中国人新形象得到慰藉和鼓励，直抒胸中的抑郁和愤懑。

李小龙在华人观众口碑中，成了正气的化身，力量的凝聚；是“扬眉吐气的中国豪杰”，帮华埠同胞出了一口气！

几千万海外华人、港澳同胞终于看见了我们炎黄子孙的本来面目！

不仅如此，连在西方的黑人、东南亚劳工族也都视李小龙为敢向白人逞强抖威的偶像。李小龙主拍的《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自编、自导、自演）和《龙争虎斗》风行美国、日本、中南美洲和非洲。中外观众对他的勇猛精妙的功夫深表叹服。许多洋人由李小龙而知东方竟有如此了不得的中国功夫。老香港居民还记忆犹新：李小龙33岁病逝出丧之日是1973年7月25日，香港万人空巷争送巨星。他逝世后6年，华纳电影公司（即当年拒绝李小龙入围演功夫片的公司）还为李小龙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追念他的生平创举，放映他的两部影片，并组织去西雅图瞻仰李小龙的墓地。美国好莱坞电影城，设立了“李小龙纪念馆”，创办此馆的人士有意在此办一个研究中国武术的中心。及至1981年

夏天，好莱坞重放《死亡游戏》时（按：这是李小龙生前主拍的最后一部影片，因遽然逝世仅完成四分之三）洛杉矶市长亲临现场观赏，还给李小龙的妻子颁奖，当地影迷定6月8日为“李小龙日”永志不忘。李小龙生前所拍影片中，多次击败日本对手，而日本观众仍对这位中国强手深表佩服，近代映画社出过纪念李小龙的大型纪念册。1980年日本著名电影刊物《公映》，举办投票选国际“十大影星”，公众推选李小龙名列第三。

通观近几十年的电影发展史，可以看出：好莱坞五十年代的电影片华人几乎都是以负面形象、被扭曲了的灵魂展现在观众面前；六十年代，好莱坞一度陷于“越战泥潭”不能自拔，以往那种“辱华片”有所减少，但仍无明显转机。及到七十年代，李小龙一连推出几部中国功夫片，在好莱坞王国的国门前叫阵，这时西片的制片商、大明星们才猛然惊醒：中国龙杀过大洋来了。

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来估量李小龙力创中国功夫片的作用和意义，是十分清晰的了。

他，是中国功夫片的开路先锋。

他，是以自己的出色演技和正气在世界公众面前塑造中国人的正面形象的不灭之星。

他，是一扫乞求西方恩赐的奴才之气，敢于向好莱坞电影王国叫板的一位东方骁将。

成龙：“我要剃头学戏！”

1954年4月7日，香港。

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在影坛上大展拳脚的成龙。小名“港生”，曾用名陈元龙。

他的父亲陈志平，祖籍山东。山东是“鲁菜”（中国八大名菜系之一）发源地，也是武术（中国功夫）之乡。陈志平乘地利人和之便，学了两手。一手是烹饪，一手是武术。业余课后常常去看京戏，久看成瘾，跟艺人学念唱做打，跟着上戏台跑龙套，帮帮腔。陈志平携眷移居香港后，两种手艺都没有荒废，担任厨师维持生计，也常去梨园看戏访友。当时，一位著名的武术师——于占元在香港开设一家戏剧学校，陈志平见了这位老朋友就诉说，小儿港生太淘气，5岁进小学读书，没多久就以“敢打架”出名，真为他操心担忧。于占元转身向小港生试探：你喜欢做什么？港生一抹额头回答：“我也要剃个光头学戏。”于占元附掌大笑：“有了！”便与陈志平议定，把7岁的港生收进戏校学戏，后改名为成龙。

成龙在戏校内，自然比在小学读书要勤奋得多，主动练功夫学戏路，但抛头露脸出外演戏还轮不着他。等到从戏校正式卒業踏入演艺圈好几年，并不象某些将门虎子，一出台亮相就给人家一个惊喜。那些年月，梨园

里论资排辈也罢，论功录用也罢，只许他去当一个龙虎武师，或者是人家大角色不愿在戏中摔打伤了筋骨，拉他去当替身，垫垫底，也没有在当时香港观众中留下多少印象。

成龙本人也毫不讳言地追述过当年初出道“一事无成”的经历。他说：“我那年月是丝毫不起眼的，在别人面前晃一千次也晃不出什么好印象来。最初，不过是小角色里的小角色。在做龙虎武师的时候，也是‘先打先死’那类角色，什么危险就派去做什么，拍卖命镜头，由上面跳下来，拍多了，导演也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在做最危险的动作替身，这样才多看两眼。等到武师不够用，差一个半个的时候，导演才会想到我：陈元龙呢，在哪？叫他来补一个缺，最后试试看。我就是补最后的那种人。”

息影澳洲又重返影坛

成龙在那当“小角色”的年月里，演出是卖力卖到“不遗余力”的程度，有些危险动作是足以令替身丧命的，成龙也硬着头皮上。但他的内心深处，自然觉得有几分委屈，师兄们都已杀出一条条活路了，唯有我还在泥里滚爬。命运不给我一个出头之日？不！我才不信什么鬼神天命。大概自己不是这戏台上的料？也许要换个天地谋出路？

熬九载熬不出头，他有些心灰意冷了。决意暂离戏台，跟随父亲移居澳洲。原想到了澳洲，没有锣鼓棒棍之噪音干扰，过过闲日子，在双亲膝前侍奉晨昏。哪料到到了澳洲，身在异国，梦魂仍牵绕着维多利亚港畔的师兄们、艺友们。他倒象是在北方隆冬暂时蛰居“穴洞”里，期盼着“惊蛰”季节的到来。

香港的朋友也没有淡忘他。虽说是他曾在香港“爆了一千次”没有给观众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同行中的无名小辈却对这个勤力敬业的“小角色”颇多眷恋。

1976年，成龙在澳洲家中突然接到从香港打来的一个电话。谁？是陈百强的声音，喂，香港正在筹备拍一部《新精武门》，你快点赶回香港见老板，争取当个角色！这一个电话又勾起息影人的欲念。他知道，当年李小龙拍过一个影片《精武门》，震惊影坛。现在筹拍《新精武门》，正是追超李小龙的好机会，岂可错过！成龙立即向家人辞行，飞速返回香港，求见筹拍此片的制片公司老板。罗老板见他留下的第一印象却是“线眼睛，大鼻子，此人相貌麻麻的”。经介绍人极力保荐，这家公司才答应应用他，允他试演一下。结果老板仍觉得他身手“平平”。成龙一腔热情重踏演艺圈来，又遭到一盆冰水！只好忍着性留在圈子里，骑马找马好了！这段岁月，成龙虽然过得不开心，但上台仍一如既往地十分卖力。一晃

又是两年。到了1979年，有一位很擅长执导动作片而且善于发掘演员潜能的行家——吴思远，寻踪觅迹找见了成龙，当面着实对他夸奖了一番，当即表示诚邀他主演两部新片。成龙受宠若惊，有意应诺，但觉得自己身在罗老板旗下，怎好跳到吴家营垒去！吴思远猜出成龙的心事，当即拍胸相告：由我出面去找罗老板，借你常山赵子龙，他不会不给我情面。果然，吴思远把成龙借来了。由他担任主演《蛇形刁手》和《醉拳》。一年拍成两部新片，在香港放映，好个成龙，从此走红！吴思远潜水识蛟龙的佳话，也传遍香港演艺界。成龙再回到原公司，罗老板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香港有一位与成龙有深交的影评家，曾经就他这一段重要经历发表过追述性的评论。这位人士写道：如果不是拍了《醉拳》，成龙很可能再返澳洲，去重过陈港生的生活而不是成龙的生活。吴思远独具慧眼，找来同是习北派武术出身的袁和平及其父亲袁小田与成龙搭档。成龙在片中饰演一个调皮、狡黠的小徒弟，经严师（袁小田饰）指点成为武林好汉，做恶惩奸，大快人心。影片的角色似乎是专为成龙而设计，针对他的身手矫健、反应敏捷的特点，还安排不少类似杂技中的杂耍动作，这样果令成龙如鱼得水，格外生猛。

吃得苦中苦 才出类拔萃

香港坊里民间，常有人说：“逢场做戏，不必太认真”。这话对成龙来说，却百分之百不适用。

与他同台排演过的人，或在后台为他服务过的人，几乎无人不称赞他是最认真做戏的演员。就在他当年做“小角色里的小角色”，也是一招一式、一丝不苟。导演看不上眼，命他“重来”他就老老实实地重做。

做戏认真，与他做人诚实有关。他的师兄们还记得，当年在戏校的时候，“七小福”个个都是猴子一般的活泼，有时活泼得出了格，一旦被捉挨罚，成龙往往是站出来甘愿为师兄们“扛罪”（替罪羊）。每有小错父亲对他常施家教。在重打之前，先为儿子言明：打你的手心，你不得缩手，缩手不算数；打你你不得流泪，流了泪也不算。几板下来，他没缩手没流泪，却忍不住喊了一声痛。喊了痛也不算数，又连遭几板重打，直到他呆若木鸡为止。

生性如此淘气的泼猴儿，在少年青年期，经受父亲、师傅的双重管教之下，他真没有少受大声呵斥，没有少受皮肉之苦，却也磨砺了他的性格：自己有错自己承当，挨了打长记性，抽掉了“懒人筋”才能成真龙。成龙在孩提时养成的那种“顽而知礼”、“刚而能忍”的性格，到后来踏入演艺圈，当龙虎武师、做替身都派上了用场。谁都知道，当替身的，都是被派去最危险的关节，做最惊

险的高难度动作，命你闯刀山过火海，你就立即照做，而且要做得真，决不可让观众看出破绽，看出演员的为难面色。成龙初出戏校的年月，当了多次替身，每次都是咬紧牙强忍痛闯过“刀山火海”，他的刚毅的性格也由此进一步熔铸。

认真一时倒也容易，认真三年五载也不难，而几十年一以贯之却是难上难了。在成龙以往参拍或主演的几十部功夫片中，他出生入死的镜头屡见不鲜。但他象只皮球，越挨拍就越蹦得高。当年拍《福星高照》一片中，他从9米高处往下跳，扭伤了右脚踝。拍《A计划》片，从20米高的钟楼跳下，又险些摔伤。去南斯拉夫拍《龙兄虎弟》一片的外景时，成龙从一座古堡的墙头横飞跃向3米以外去抱一棵大树，一次不成再拍，再次不理想又拍，由于身体消耗太大，过度疲劳，在第三次重拍时，未抱住大树，从十七米高空直落地面，造成头骨开裂，耳部骨碎。成龙并未因此“缩手”，没有拿钱买替身，而是连扑连跃，续攀高峰。

《红番区》片中的成龙，竟是从100多米的楼顶起跳，横越几十米红番区大街的上空，飞插60几米高的对面高楼平台。其高度、难度、惊险度，均超过他以往多次“龙腾虎跃”纪录，而他从天桥跳入汽垫船之一刹那间，脚部又一次受了重伤。

成龙自当童星之日起，几乎是常有因排演而负伤纪录。有心人作过统计，成龙入圈以来，因拍片负伤，已有三百多次，从脑部到脚部都伤过。但他带伤继进，从不退缩。所以许多影迷都说：

“成龙一身尽是伤，成龙浑身都是胆！”同业的人士，私下里问过成龙：“你伤痕累累，为什么不找替身？”他说：“我也是血肉之躯，伤了哪有不疼的，人生能有几回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就要靠真功夫真形象给观众影迷看。否则对不起大家。”

有位香港记者问过他：“成龙先生，你功成名就，如今快乐不快乐呀？”他笑了一笑，回答说：“你知道，我得到多少，就必定失去多少。干我们这行，要舍得拿命做代价！”

许多年轻演员追着他求授真功夫。成龙千言万语之后，少不了一句话：“如果你吃不得苦上苦，就不要跟我学。否则，学也学不来。”

贵在专一

在香港演艺圈内的人士，个个都希冀成为光芒四射的巨星。但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各自结局并不是个个都象成龙今日辉煌。

成龙却有自己的主见。他认为人生苦短，尤其是青春不再。要练功夫，演功夫片，就应在年轻力壮的阶段

抓紧多练多拍。错过了人生的这阶段，体力精力均不济。所以他下定决心趁年轻尽全力去专练功夫，演好功夫片，历经三百多次创伤也不折其初衷。其间，也曾有圈内朋友好言相劝：你何必去冒险跳高楼下火海，改改戏路，去接拍文艺片、悲剧片没有危险呀！成龙笑答：文艺片我爱看，悲剧片也令我动情。如果偶尔为之，我倒乐于试试。如果从此改戏路，弃功夫片而中途改了，去演什么才子俊郎，狐鬼仙妖，我做不来，也划不来。我当年进戏圈，剃头学戏就一路杀过来，才在功夫片上站住脚。刚站住，又脚踏两只船、三只船，心三意四的，往后很难有更大的成就。是呀，人家去演文艺片，赚了钱，得了奖，出了名，我很高兴，但不眼热。我走我自己已开拓的路！

成龙大言无愧地宣称：我成龙拍片有观众有影迷，夸我的功夫片有味道有特色。是呀，我用真心真功夫真技艺在世界影坛去攻占一席之地。我怎好轻易放弃这个阵地，去另改戏路？那样，既对不住我的影迷和观众，也抢了同行的饭碗。我才不干！

在拍过功夫片的某些演员中，也曾对功夫片的发展前景表示犹豫。他们一时因某些功夫片的票房收入激增而高兴，一时又因某些新拍的功夫片的观众寥寥而灰心。面对西方影坛大量引用电脑特技，以替代真功夫的现实，他们感到威胁，赤手空拳何以抵挡高级电脑、机器人？所以有些人悄悄离去，或另改戏路，或息影从商了。

成龙目击一切，为之叹惜。但他却“夜过荒场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他不信，江湖之内没有他闯荡之地。偌大的一个中国，是中国功夫的故乡，紧靠这个大靠山，就能让我成龙大展拳脚。决心既定，不改初衷，不随波逐流。人退我进！人改戏路我更扬我之长，扩展我的戏路！

他不相信，中国式功夫片从此衰微下去。他说，中国功夫片有过它的辉煌，香港功夫片赢得海内外几千万华人的喝彩，我没理由让他们“戒瘾”。自李小龙拍《唐山大兄》踢开第一脚以来，我们中国功夫片在香港、在世界影坛上渐渐领先，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我们为何不乘胜续进而中途自断生路！必须在这个基地上坚持住，力创佳绩！谁想要看功夫片，就看我成龙的！

成龙口出“狂言”也是有其自信之依据。君不见，他的成就已为当代承认——

1978年为拍《醉拳》，驰名香港演艺界，成龙脱颖而出！

1982年在马尼拉国际影展上，被评选入“世界十大男星”之列，与史泰龙、阿兰·德隆等外国世星齐名。

1986年，被选为香港杰出青年之一，同年因拍《警察的故事》一片而被美国总统里根授奖。

1987年，成龙获台湾第二十四届金马奖卓越贡献

特别奖。

1988年，他在六十多个国家地区参与评选世界十大杰出青年活动中获选。

1990年，法国巴黎授予成龙以“文艺骑士”勋章。

1993年，登上第二十九届金马影帝的宝座。

回首自己的滚滚征尘、望着灿烂的奖章和奖杯，他怎能不更加坚定信心，继续走自己成功的路！

他向人体极限疯狂挑战

到过香港跑马场看赛马的人，都有印象：看那骑手跨在飞奔的马背上，执鞭弓腰，全神贯注，全力以赴。象一支离弦的箭，嗖嗖地射向目的地。

成龙在香港长大，深明此道：要做成一种事业，达到一定目标，非得集中全部精力去拼去杀。做骑手是这样，做龙虎武师是这样，立志要做个大名鼎鼎的中国功夫巨星，更要象一支箭，拉弓不回头，排除种种遮拦、干扰和牵挂，奔向事业的高峰去。

不少研究过成龙的人士都有共识，说他“臂力过人，精力过人，耐力过人”。一般人进入中年，体力都不如青年期了，难能经得住摔打，熬得住水淹火烤并保持在武林中的艺术青春。而成龙演到40岁，仍敢坦言：“看目前我的身体状态之佳，几乎能徒手与狮子搏斗！”历经三百多次损伤之后，仍出此“狂言”，实在令“狮兄狮弟”佩服！

笔者相信他不是言过其实的“马谡”之辈，他之所以有这样强壮的体质，充沛的精力和耐力，与他一向注意“虐待”自我有莫大关系。他每天都尽量挤出较多的时间去做“疯狂运动”，玩起来简直不要命，撻起车来快如风。这样疯狂的耗费体力，求得更大的回报，就是百炼成钢，百折不挠；精力旺盛，身体强壮。

以往熟悉李小龙的人士曾经多次夸奖他周身最灵活的是那双脚。而今日成龙给人们的印象则不只脚快，而手也快，眼也快，全身都很灵活。从体形看虎背熊腰，动作起来如活猴雄鹰。就以他喜打快拳为例，也非一日之功，在练功房里对准沙袋出拳，如雨点般猛击猛打多少春夏秋冬！看他那倒立直走，稳稳正正地连登几个台阶，面不改色。他这样“简单”功夫，也令人信服他是勤练苦练久久成功。

大家记得，成龙25岁开拍《醉拳》一片，就以其身手灵活倾倒观众。时隔14载，他有意选定同类题材，再拍《醉拳》续集，又获很大成功。当初有人为他担心：人近中年还去担那么大的“风险”，做那么多高难度动作，何必自找硬钉碰？成龙则自有主见：江湖人行船跑马三分险，何曾畏惧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此片拍成之日，他得意地告诉朋友：看我39岁了，我的身手

依然灵活吧？从拍《醉拳》到《醉拳Ⅱ》，成龙经历了14个年头的磨练，中国功夫越练越精，身手之灵活矫健不减当年。着实令人佩服！连西方的影评家里查德·里斯克也曾为之叹服。他说：“好莱坞的动作依靠的是电脑特技和视觉特效，而成龙却是向人体的极限疯狂挑战。”他不靠电脑帮助身体，“而是把动作片中高难度动作交还给演员自身来承担。”应当说这是中肯的评论。

水涨船高 从不知足

熟悉成龙的个性的人士相告：此人在从影征途中，一向认真，十分敬业，“野心”勃勃，从不知足。

据行内人士追述，成龙早在当童星的时期，在参演《大小黄天霸》（当时8岁）、《秦香莲》（当时10岁）、《顶天立地》（当时17岁）等片中他就演得很卖力。后来在《少林门》、《金瓶双艳》等片中担配角，也甘于全力扶持“红花”。导演夸小成龙很听话，讲解脚本、分解镜头、规定动作时，他都瞪着眼竖起耳听记，然后照着练。一次通不过再做，直到导演点头为止。李小龙逝世之后几年，成龙接戏更多，他演《一招半式闯江湖》、《蛇鹤八步》、《风雨双流星》等片，在香港影坛上渐有知名度。而在拍《醉拳》和《蛇形刁手》走红影片之前，他已在排演中两次折断了胸骨。

香港影视圈是商业氛围十分浓厚的名利场。而且采用“明星”制。大凡有明星担角的影片、电视片，票房价值就高。所以，大“明星”成了影艺圈内的宠儿，谁都愿用高价争用。而大明星自恃身价高，接片时能获高报酬，何乐而不为。成龙成名之后，自然成了被争夺的热星。成龙被邀拍一部片子，得片酬1千万港币，这是早年的行情。近年身价更高。一部片可获到3千万以上。1992年影视圈传成龙一年拍片六部，推算可得片酬1亿8千万港元！

制片商乐于多给酬金，成龙欣然接受。但他也不是“见钱就眼开”的那种艺人。接片之前他定要问清楚：究竟要我拍什么内容的片？要我扮的角色是不是我中意的、能发挥我功夫、技艺之长？签约不成，往往不是他嫌片酬低，而是“我不愿意演那角色”。

近年来，成龙在国际影视界的声望益隆，四面八方争相出高价拉他拍片，制片商之间不时打“夺龙仗”。而对着盛名厚利的成龙，却变得更理性更持重了。他公开声言：我不想拍我不喜欢的片！诸如他不喜欢演死人；不喜欢演“上山学艺，下山报仇”老一套故事；不喜欢用替身；……我成龙不喜欢去模仿别人，跟风头，追热浪，到头来找不见自己的影子。现在有些人喜欢“一窝蜂”，见人拍了“大红灯笼”，他们就争着拍小灯笼、白灯笼什么的，到处只见灯笼高挂，灯下不见亮色。非叫观众

看烦睇腻不可，我成龙的脾气怪怪的：你拍的，我不一定拍；你不拍的，我倒要拍。

熟知成龙怪脾气的友人，知怪不怪。因为成龙曾向他们表白过：“拍电影，可不是随便玩玩的！我这条命也许几年就完，或者明天一摔交就去了。但是要知道：我拍的电影经过20年、30年、40年以后还会有人看。我不能留下片给后人骂，所以，我现在不轻易接片，既看好接下来拍了，就认真去演，哪怕是一张桌、一堵墙上的一颗钉，所有道具布景都不可马虎。试想，到下一个世纪，如果有后生仔看我的片说：哼，这个成龙，这样马虎，拿拍片当儿戏，只贪钱不投入角色……哎哟，我可受不了！”

与成龙在摄影棚共事多年的“成家班”人、众搭档，都深知成龙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他，为了设计一个危险动作，花去一个月去筹拍。

他，挥出一拳，也认真讲究拳型、拳势，用他自己的话说，卢惠光（他的功夫搭档）可以一拳打晕我，但我打的拳比他好看。

他，知道同行中有不少人在模仿他的招式，自己如不创新就可能被追赶者挤下台。所以片片求新，不甘于走“熟门熟路”。当别人醉心于鲁莽武夫般的格斗之际，他却从民间的“奇门”武功中挖掘出三十六种“板凳功”、“扇子功”、“裙底脚功”，以替代令观众看腻了的单调的拳脚功夫，他表演得令人耳目一新，拍手称妙。

他，不但全力投入角色精心表演，每一个高难动作都不马虎过关，一次不成再做，非到自己满意时才能转换镜头。有时，为拍一个精彩镜头耗资很多，嘉禾影片公司的老板也感到心疼。成龙便极力说服老板：舍不得金钩，怎钓得着大鳌！要拍超水准的片，先得不惜血本，后才能赚大钱。嘉禾老板表示理解和支持。这样成龙更是放开手脚求创新了。全片拍摄完了，他还亲自参加剪辑，去粗存精，精中选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反对粗制滥造！我每拍一部片子，都想达到一个很高的目标，但我不轻易饶恕自己的马虎、笨拙和低能。自从在南斯拉夫拍片受伤之后，更悟得一点：人生苦短，一个闪失就完了，所以不把青春赌明天，而是牢牢把握今天，充分用好今天去拍好“这一片”，“这一个镜头”，给观众、影迷一个满意的交代。所以，这些年来，他自己参与编导、演的重点片，都付出昂贵的成本，往往超过预算：拍《A计划》一片用了3千5百万元（以港币计，下同）；拍《奇袭》一片用了9千万元；拍《飞鹰计划》一片竟用了1亿2千万元！成龙的经纪人陈自强，深知成龙的脾性：他决不肯给吝啬鬼去拼命拍精品的，所以也就由了他。成龙也知经纪人的难处，不时表白内心：我知道生意场上谁也不能当永远赔本的傻瓜，我也不希望功夫片走下坡路，一片比一片衰，成了僵尸片。我们只有用拼命精

神、用高投入才能杀出生路。双方相互的理解和默契，往往是在重头片放映之后，产生巨大反响之时，更加深了。

艰辛耕耘换来的是丰厚收获。

在香港影院放映的中西影片每年好几百部，只要有成龙主演的新片就“曝晒棚”（港人粤语，即影院满座超员的意思）。

这里不妨举1994年全港影市行情为例：由于影业界“跟风抢拍”，电影市场出现“滑坡”，而成龙拍的功夫片，却依然看好。当年最卖座的港产新片十部之首即成龙的《醉拳Ⅱ》，收入达4100万元（外埠收入未计入）。

踏入1995年之春，成龙与梅艳芳联手合演的《红番区》，在香港放映仅一个半月，就收入5000万元以上（外埠收入未计入）。

成龙捧着奖杯，挤眼，咧嘴，放怀大笑，他是何等开心！

与他同命运、共欢悦的成千上万的“成龙迷”，更是疯狂地雀跃，奔走相告，拱手相庆。

成龙究竟有多少拥趸（港人讲粤语，拥趸即崇拜偶像者）？有人说，至少有7位数字。我没法精确统计，但有6百多万居民的香港可知，广大青少年几乎没有不佩服成龙的，许多家长都望子成“成龙”。香港就有“成龙影迷会”。

邻近的亚洲国家、地区也有“成龙影迷会”。那都是自愿加盟的“死党”，无别人拉入。

在日本，正式加入“日本成龙影迷协会”的会员就有好几十万之众。他们制定了会徽、会章、章程、纲领，还办了一本专刊，刊名定为《成龙》。每年都组团渡海到香港来，专程拜谒这位影坛天皇男星成龙。很多影迷还关心着成龙的婚姻大事，但成龙守口如瓶，或一言相告：“我现在的的生活方式是日夜练身，练功，拍片，这是我的大事。至于我的感情的事，过几年再说。”近日电视广告中频频出现成龙教子学“小霸王”的画面，他得意地表白说：那是我一人串演二角呀。

成龙拥有众多的影迷，不管怎么说，是令他最开心的。甚至比捧得金马奖杯还高兴百倍！他幽默地说：“如果有哪一位女孩子乐于待嫁的话，那就请她等我把电影拍到完全达到理想之日，慢慢进入罗曼蒂克之境吧。”天哪，红颜易老，成龙难封（封镜），谁等得起他！

成龙已拥有众多影迷，抱有多多个奖杯，但他仍未心满意足。

他曾经有一段插曲：他发现，在地球的那一边，一个冷落他的角落——美国好莱坞影业王国。于是多年前

曾动了念头：何妨越洋一试，去美国码头。

他满怀壮志地飞越大洋，踏上美国的土地了。好莱坞究竟会向这位东方来客开多大的门缝呢？

重登踏彼岸 再估身价

美国，在成龙的心目中不算陌生。

记得八十年代，他被邀拍《杀手壕》一片的年代，成龙的父亲在芝加哥市唐人街开餐馆，就屡遭当地黑帮的骚扰勒索；还一度劫掳他的叔父当人质，饱尝“西洋拳”的威胁。成龙的那番异域感受当然是刻骨铭心的！说来也巧，这一次邀他拍片的美国公司，正是当年拒绝李小龙拍功夫片的公司——华纳公司。成龙带着一腔激愤拍得相当投入，相当卖力。他在银幕上如猛虎似强龙，与对手（黑帮成员）搏斗，终以中国功夫击败西洋拳，黑帮落荒而逃。他在西方影坛初试锋芒，也为当地唐人街的父老乡亲们为李小龙出了一口气。老华侨还记得华纳公司于1972年撇开李小龙而拍出的《功夫》一片中，那个由美国演员扮演的中国人——金桂祥，处处表现寄人篱下委屈求全的可怜像。而成龙此次越洋参演《杀手壕》，却抖擞精神，把黑社会号称“杀人王”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成龙堂堂正正的英雄形象，发挥得很好的演技，都博得当地观众的喝彩。华埠的父老乡亲鼓励他多拍中国功夫片，给海外华人看。

成龙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庆幸自己比李小龙幸运。此次来美国，没有在西方电影王国门前吃“闭门羹”。片子放映后，在美国观众中反映良好。

但他也发觉，好莱坞对黄皮肤演员并不那么尊重，不肯给东方人与西方人演员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和条件。成龙在美国闯荡近两年，他只拍成两部片。此前，他在香港哪一年不拍两部以上的片！

成龙，究竟在他主演的多部影片中凸现的中国人形象是什么？西方人用他们审视角度去评估，是他们的事。其实，最了解成龙的，应当是“龙的故乡”的大量观众、影迷、影评家。我不妨随手摘抄香港人士的一些评价：

有专家指出：成龙在他主演多部功夫片中出现的形象，再不是西片《功夫》里的金桂祥那样处处委曲求全了。还有专家指出：成龙是以无往而不胜的英雄形象出现。但他并不是用拳头去专门对付非黄皮肤，而是与正直的白种、黑种人联手去对付各种邪恶势力。他有民族的自尊，却无狭窄的民族报复心态。而更多的观众则认为，成龙演出的是“正义的、豪爽的、见义勇为的”中国人形象。

香港影评界还兴致盎然地研究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在影坛上的“成龙现象”，说香港影坛刮起了阵阵“成龙旋风”。

《北京青年报》的专文评论成龙时，热情洋溢地宣称：成龙从十六岁起，用他的拳头打天下，打红了华人圈，打进了东南亚，打开了欧美市场。他的片子绝大多数被读讲为：“以真功夫承载抑恶扬善。”他的观众主流是青少年，因而他的片子自觉地担起一份责任——杜绝暴力、杜绝黄色、白色、黑色（烟、赌等）。

此文作者在结尾时写道，祈盼成龙继李小龙之后，两拳舒张，托起和平鸽，迎向“九七”。

成龙在祖国首都听到如此热烈的回响和期盼，他自然很高兴。他告诉来访的北京记者：我从头到脚整个人都是中国人。我还会保持中国思想、中国形象。我希望中国快快发达，政府说话算数。我们中国人大家都要争口气，赢得国际对我们的尊重和信任。

他还表示，希望有机会与内地同行合作，采用“协拍”方式拍出更有特色的功夫片来。中国的电影界很有实力。中国电影市场很大。值得在这汪洋大海里搅一搅。

应当说，成龙在“龙的故乡”找到了知音，他的回答也很坦诚很真挚：

他在北京透露一个新闻：“我已在上海买了房子了。”

欢迎你，龙归故里！

“看功夫片要看成龙的”！

成龙从影二十余载，从童星而替身，由配角而担任主角、台柱，由参演而自编自导自演，可谓走过一段辉煌的成功之路。

其中，几经扑跌，但如皮球，越拍越蹦高。

他赴美败兴而归后，强龙再次崛起于维多利亚港湾——更令人刮目相看。他向全球推出的新片《红番区》，可谓盛年力作！

《红番区》在全球两千多家影院同期上映，引起的轰动效应，几乎是有目共睹的了。北京、上海、广州十几个大城市都出现票房创收的新纪录、最高纪录。影片的高质量与大明星效应相辅相成。成龙的功夫，成龙与梅艳芳默契合作，其敬业精神及巨星风范，均令人称赞。

“看功夫片，就要看成龙的！”已成众多影迷、影评的共识。这也正是成龙多年追逐的一个目标。

他希望：有那么一个前景：人们看枪战片，就看史泰龙的；要看特技片就看史蒂文的；看功夫片么，就看我成龙的！

《红番区》公映之期，从太平洋彼岸传来新闻：纽约正举办“成龙电影回顾展”。美国传媒界影视界引起轰

动。还来不及亲睹《红番区》片的一些传媒人士，也争呼“龙来了”。

《纽约时报》、《纽约人》、《纽约杂志》、《时代周刊》、《综艺周刊》都纷纷评论成龙其人、其功夫演技和影片的特色。破天荒第一遭称他为“亚洲动作片大师”，还称“中国功夫片巨星”，连史泰龙、阿诺·史蒂文辛格、基诺列维都应当在他面前“俯首称臣”。

《纽约时报》将成龙与李小龙作了一番比较之后评说，成龙的魅力不仅在惊险特技方面，他给美国观众的吸引力还包括他：“好看的脸，结实的身體，表演喜剧的天才，杰出的音乐天分和导演手法等等”。而《时代周刊》在称赞成龙的魅力时，又习惯地拿着西方审美标尺在西方人们偶象中忙不迭地去找近似者，找来找去，找不出“完人”，用拼凑笔法表述：来自东方的成龙的魅力“有一点克林伊斯维特，加上一些舞王金凯和，再加上一些笑星杰克顿，再加上很多的幽默片大师如卓别林、基顿、罗伊德的特点和魅力”。

东方读者见到如此这般的评估，大概很费解吧？好端端一个东方人，经西方神来之笔七拼八凑后，还成其为成龙么？

当成龙得悉太平洋彼岸有如此热闹的评价时，他笑了，立刻收起笑容说：“嗨，如果美国人喜欢看我的电影，OK，这算是额外的惊奇。如果美国人不喜欢看，我也不在乎。因为在龙的故乡，在亚洲我已拥有七亿的观众。”

但聪明的成龙，告诉记者：“当然我要的不只是亚洲市场。世界各大洲进得去的地方我都要挤过去。”他掌握确实的反馈：当今世界，爱看成龙影片的有亚洲人、美国人之外，还有德国人、英国人、非洲人、澳洲人。“他们看不懂我演的文艺片，指名要看我的功夫片。对，我靠的是我的中国功夫片、我的动作语言艺术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巧得很，从纽约方面传过话来了。《纽约时报》有文章表示，美国人看成龙的电影，不需要英文字幕，也可以看得懂，成龙“有一种不需要翻译的大明星气质”。

既然，成龙的影片，不需要字幕，不需要翻译，就可以闯进好莱坞的国土，可以是突破地域、语言、种族、习俗种种阻碍而畅行天下，他何乐而不为！

刚刚进入四十岁的成龙，正在筹划进军国际影坛的大举措，成龙，我们相信你，企盼你，今后有更大的成就，在屏幕上展现炎黄子孙的新姿！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国民党元老陈诚

●左双文

陈诚，字辞修，生于1898年，浙江青田人，1922年6月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5月黄埔军校建立，陈诚被派为上校特别官佐，因勤勉廉洁，得到蒋介石赏识，后在东征和北伐诸役中，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到1928年就被提升为中将警卫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陈受命参加淞沪会战，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司令长官蒋介石自兼），1938年1月出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与副部长周恩来等合作共事。旋又任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负保卫武汉之全责，参加武汉会战。抗战胜利后，被晋升为一级上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蒋曾对人说过：“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

1948年底，蒋派从东北惨败而返的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为其最后退守台湾作准备。陈主持台湾军政一年多，采取各种措施，整顿军事、政治、经济，如注重恢复农业，扶植民营资本，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等，使台湾局势趋于稳定。1950年3月，陈出任“行政院长”，1954年3月，陈出任“副总统”，1957年10月出任国民党“副总裁”，成为台湾名副其实的第二号人物。

陈主政期间，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在财政方面，强调以“开源”与“节流”为根本，整顿税收，管制外汇，确立预决算制度等。其中对于稳定局势、发展台湾农业及有关产业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通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等步骤，较好地解决了台湾的土地问题。

对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陈诚一直是较为热心的。30年代初在江西，陈就提出过“限田”方案，拟由政府规定地主土地的限额，超出限额者由政府向地主赎买，然后以贷款方式卖给农民，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他要求江西省政府率先作局部试验，被当时的省主席熊式辉断然拒绝。1940年，陈诚出任湖北省主席兼战区司令长官，又亲自制订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并于1941年在其辖区内搞“二五减租”，扶植自耕农，逐步向“耕者有其田”过渡，但因职务调动和战局变化，这次努力又告夭折。

1949年他接任台湾省主席后，马上排除各种阻力，

实施土改方案。1949年3月，陈诚在台湾省行政会议上宣布，“三七五减租”即将施行，民意机关是否代表民意，县市长是否系革命的县市长，皆以其对三七五减租的态度为一大测验。他警告大地主：“仅顾及本身利益而剥削农民，将来会自食其果”。1952年11月，陈诚主持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送交“立法院”审议，遭到“立法院”内保守势力抵制，陈诚即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致函“立法院”，宣称“行政院”提案中的7点原则绝不容改变，“此案势在必行，任何阻碍与困难均在所不计”。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立法院”终于通过了该条例，并规定自1953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台湾土地改革得以实现。他所著的《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阿拉伯等国文字，成为一些国家实行土地改革的参考资料。

两岸分裂，统一未成，所有爱国同胞均深感忧虑。从50年代中期起，中共力争和平统一的构想日趋明确；提出愿意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欢迎包括蒋介石、陈诚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去台人员回来。

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见有关人士时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秘密来。”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做了具体的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并指示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

中共中央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这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为达到长期控制台湾的目的，加紧了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这项政策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也遭到蒋、陈等人的反对，双方在这点上是一致的。有鉴于此，中共继续通过不同渠道，采取各种办法做争取

蒋、陈的工作，如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台湾当权派深具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多次致信蒋氏父子和陈诚，转达中共对台的方针和政策；请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请统战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

这些工作对台湾方面产生了影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有了相当的发展，据有关人士透露，台湾当局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曾表示：他们不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扰乱公共安宁和破坏地方秩序的事”。并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去谈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蒋氏父子和陈诚之间的关系，实现他们搞“两个中国”的目的。中共方面决定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周恩来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蒋的团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作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陈诚还表示，他们也要向历史做交代。

鉴于陈诚思想的发展，1963年初，中共方面请张治中、傅作义又致信陈诚做争取工作，信中对比台湾与美之关系和台湾与大陆之关系，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并作了更具体的说明。概括起来就是1960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即已明确，毛泽东提出并由周恩来归纳的“一纲四目”。“一纲”，用张治中等的话说，就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

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表示过去送去的信件虽然是一些朋友个人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这个时期，中共通过不同渠道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他们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1963年7月，陈诚因病提出辞职。中共方面获悉此一信息后，周恩来于9日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分析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年底，周恩来又在广东会见准备去台的有关人士，希望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回归祖国固然好，既然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这种至诚谋国的态度，对于去台之初还曾高喊反共反攻的陈诚是有影响的，陈作为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在台柄政十五年，始终与蒋一道，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为外人所惑，是值得肯定的。在反共这一点上，他的态度也不是毫无变化；1965年初，陈诚病危，3月2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了陈诚病危的公告，3月3日，陈已不能进食，他屏退医生、护士之后，召长子陈履安至身前，口授遗言三条：

1. 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2. 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3. 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66字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向蒋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国民党中一些人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内容，陈诚夫人谭祥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

陈诚是一个有着复杂经历、在中国现代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人物，对于他的全面评价，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也非笔者这篇短文能够承担，在此只想指出的一点就是：陈在台湾的所作所为，对于台湾今日的安定、繁荣是有贡献的，特别是坚持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立场，反对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也算其晚年对历史一种负责的交代，值得称赞。

（责任编辑 舒 蓝）

海外华人学者陈源的一段是与非

●吴海发

1970年春，英国爱丁堡，一位气息奄奄的老人躺在床上，握着他夫人的手，很吃力地说：“我能回无锡太湖边去吗？我想回去。”说罢，老人安然地告别人世，永远地走了。这位老人，就是二十年代跟鲁迅争论的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先生，夫人就是女作家凌叔华。

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文学教授。1896年5月10日出生于无锡市中心崇安寺陈宅。他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祖父行医，喜爱陈源。陈源自小受到诗书的熏陶，幼年随父母在上海读书于文明小学，三年级又转入南洋公学附属小学读书，成绩优秀，对语文与英语似有特异的禀赋，始终名列前茅。十五岁赴英国留学，先在爱丁堡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不久又转学于伦敦大学，专攻文学与政治学科。1922年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由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得到此信息，特地致函表示祝贺，并聘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授。陈源对蔡先生的声望早有所知，对蔡先生的奖掖深为感激。盛情难却，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课堂上他风度翩翩，侃侃而谈，讲课是受到学生欢迎的。1924年12月，他与王世杰、唐有壬、周鲠生、杨端六、陈翰笙、皮宗石、胡适、杨振声等人创办《现代评论》杂志（周刊），系同人杂志，有点象教授俱乐部。杂志创刊于北京，1927年7月移至上海出版，至1928年12月停刊。它主要刊登政论文章，同时也发表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陈源任杂志的文艺部主任。文学家郭沫若、沈从文、剧作家丁西林、地质学家李四光、历史学家顾颉刚等人虽非同人，也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许多作品。女作家凌叔华在大学生时代写作小说《酒后》，就是经陈源编辑发表于《现代评论》。这篇小说大胆暴露社会的丑恶，博得广大读者注目，名震一时，从此跃上文坛。凌与陈由《酒后》相识，产生好感，终于结为伉俪。当时有位作者，名不见经传，化名李瑞，投稿《现代评论》，声明文稿一旦发表应该付给20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一个大学学生的伙食及生活费每月仅需2元）。稿件经手人陈源很为难，按规定《现代评论》主要撰稿人刊出文稿，不仅不发稿费，还要作者交办刊费用。陈源考虑稿件很有质量，决定录用发表，且破例发给20元稿费。这在当时传为佳话。这个

李瑞就是《毛泽东选集》提到的王实味。陈源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许多散文，文笔酣畅，犀利活泼。梁实秋把陈源与周作人、鲁迅、胡适、徐志摩并列，称为“散文五大家”，虽然不无溢美，但也反映他的散文创作水平是高的。

但是，于无声处起惊雷。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起学潮，1926年发生“三·一八”惨案，《现代评论》貌似超然物外，实则偏袒教育总长章士钊和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转弯抹角指责女师大学生执政府前请愿，攻击支持学生运动的进步教师，说什么“暗中鼓动，挑动风潮”，这就暴露了《现代评论》的不公正态度。陈源在《现代评论》发表了许多“闲话”与《现代评论》亦步亦趋，表现了他的落伍。鲁迅先生抨击他的“阴险论调”也就咎由自取了。但是，我们综观陈源的言论，也可发现了他对一些敏感问题的鲜明立场与正确态度。

首先，陈源的“闲话”对于1925年的“五卅”惨案表示了同情与支持。他说：“上海现在已经差不多达到总罢工的程度了。他处人民目前的大急务，自然就是设法援助及接济上海罢工的工人。我们极赞成全国能够在同一日罢工、罢市、罢课一天，这样叫他们（外国的同情者）知道我们全国人民是怎样的沉痛和决心。”

其次，陈源的“闲话”对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先生表示了由衷的钦佩，1925年女师大学潮的起因之一，就是校长杨荫榆在大会上对孙中山有不敬的言辞，引起学生的愤怒。陈源说：“革命党得了志，他们的面目全变了，始终保持着本来的面目，没有染着一些官僚习气的，只有寥寥的几个人，尤其是孙中山先生。”

最后，陈源的“闲话”对“五四”运动后的第一个十年的文学业绩，作了客观的正确的分析。他赞扬了鲁迅和郁达夫的小说创作，特别对鲁迅的《阿Q正传》作了热情的肯定。他说：“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民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孔乙己》、《风波》、《故乡》里面的乡下人，口吻举止，惟妙惟肖。我们记忆中的乡下人，许多就是那样的，虽然没有本领写下来。到了《阿Q正传》就大不相同了。阿Q不仅是一个典型，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他是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生动，有情有趣的人，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这

些言论发表在鲁迅抨击他错误言论之后两年,仍然对鲁迅先生不取偏激的态度,立论持平公正,把阿Q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等艺术形象平列,见地是很深刻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鲁迅小说创作成就巨大,有目共睹,“不废江河万古流”,即使对鲁迅怀有陈见也不能不服膺;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陈源对鲁迅先生的批评或许已经有所领悟吧。

1927年陈源与凌叔华结婚,曾到日本作短期旅游。归国后在北京史家胡同54号安了新居,新婚燕尔,意气风发,两人创作甚夥。陈源还翻译了《梅立克小说集》出版。1929年5月,比翼双双告别故都,告别史家胡同,飞抵武汉大学,在这里陈源担任教授有14年之久,后来还兼任了文学院院长。他为办好武汉大学革故鼎新,锐意进取。他不搞论资排辈,延聘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到校执教。这里值得一说的是,他聘请沈从文先生和叶圣陶先生任教的轶话。二十年代后期,沈从文已经名闻文坛,但他是自学出身,没有大学文凭,没有博士头衔。陈源经手在《现代评论》发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知道读者对沈从文作品的厚爱。当时有一种怪论,小说写得好不能算学问,不能登大学讲坛讲课。陈源聘请沈从文来武大执教,讲现代文学史。陈源还鼓励他学英语,并说:“学好了,介绍你去英国读书。”沈从文脑袋中欠缺英语细胞,连26个字母也记不住,念不准,只好作罢。不过,沈从文教书却十分认真。陈源对学生说:“沈先生来武大教书,是武大的光荣。”再说聘请叶圣陶。抗战期间,叶圣陶避难四川,一度失业,生活陷于困窘。陈源得此消息,立即伸出援助的友谊之手。1938年8月26日陈源从乐山(武大这时已迁至四川乐山)专程赶到重庆过访叶圣陶,见他身体瘦弱,颧骨高起,一家大小,挤于一屋,生活十分清苦。陈源聘任他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讲现代文学及写作。陈源还告诉他乐山地区物价便宜,生活有保障。涸辙之鲋,相濡以沫,叶圣陶对陈源的友情始终是感激的。这在叶圣陶的书信及日记上有记载。

陈源在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有5年,他聘请一些锐意改革的人到校执教,也推动了武大的教学改革,打破了涟漪不起的死寂局面,他改革课程内容,古今并重,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他把现代新文学列入课程,他把写作现代语体文作为文科各系的必修基础课。他改革考试制度,取消期中考试,重点培养写作论文的能力。他推行学分制。师生的教与学都出现生动活泼气象。

陈源对进步的文学界人士嘘寒问暖,雪中送炭。丁玲和胡也频是著名左翼作家,陈源对他们及时相助。1931年2月7日,胡也频与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

等五位青年作家在上海龙华遇害。丁玲遭此劫难,几乎被击倒不起,陈源满怀同情。这年,丁玲携带年幼的儿子返回湖南老家避难,丁玲路过武汉大学,陈源夫妇热情接待,留宿,风刀霜剑,孤儿寡母,艰难竭蹶,陈源送给丁玲一笔钱,以济一时之急。陈源夫妇与丁玲摄影留念。

抗战后期的1943年,陈源为动员海外侨胞投入抗日洪流,为争取国际友人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毅然辞去武汉大学教职,奔赴英伦,凌叔华同行。陈源担任中英文化协会秘书处负责人,他在海外为动员并组织力量反击法西斯做出了贡献。1946年,陈源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在巴黎)中国常驻代表。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期间,他与地质学家李四光过从甚密,李四光夫人与陈源在上海小学时代同学,又同一班级,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的父母为他们说过亲是要好的朋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李四光在英国朴茨茅斯,周恩来总理电邀李四光归国。国民党政府密令驻英大使馆,设法扣留李四光,送回台湾。陈源闻讯,立即秘密通知李四光,让他早日离英,途经瑞士安然返回祖国。李在新中国担任地质部长职务。以后李四光、周鲠生访问美国,曾以老朋友的情谊,动员陈源归国。1966年,陈源70岁了,辞去教科文组织工作,多次说要回国。但是,国内正是“文化大革命”,终于拘泥没有成行。

尽管陈源身负国民党政府重任,但他不是国民党员,在政治思想上他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

退休后,他侨居伦敦与爱丁堡,看书,写作,留下不少文稿。

陈源去世前,怀念太湖,不是没有原因的。太湖边梅园西,有陈家的一座墓园,埋葬着他的祖父母、父母,还有他的胞妹陈汲(气象学家竺可桢夫人),他想在此安息,伴着太湖涛声长眠。近年定居爱丁堡的陈源女儿陈小滢正在设法将父亲的骨灰运回大陆,实现陈源回归故乡的心愿。

陈源作品,早年的多在《现代评论》、《新月》等杂志上发表。主要著作有《西滢闲话》,新月书店1928年6月初版,1929年5月再版,1931年2月第三版。还有一本《西滢后话》。译作主要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梅立克小说集》等多种。

陈源一生忙碌奔波,既有作为,又有著译,堪称勤奋。人生沉浮,难免失言。古人云:“不以一眚掩大德。”陈源留在历史上的学者形象颇为亲切,颇为鲜明,颇有文采。

(责任编辑 黄 梅)

“中国女婿”—— 李敦白

●李健民

热闹的纪念会

1986年2月11日的晚上，在北京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友谊宾馆二楼，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气氛——这是美国人李敦白和他的中国夫人王玉琳举办的庆祝李敦白来华40年和他们结婚30年纪念的招待会。

叱咤风云的老将军、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和国家电子部、商业部、农林部、外交部、外专局等部门负责人都前来祝贺。齐白石的得意门生大画家姜白石画了一幅双鸟鸣竹图题《双寿》作为贺礼。作家丁玲正大病临床，她和丈夫陈明联名写了贺信：“热烈祝贺敦白先生来华40周年，祝贺你们结婚30周年。近来丁玲因病住院治疗，陈明日夜在院守护，不能前往恭贺，特致歉意，还请原谅。谨奉薄礼一件，请哂纳。祝愿你们全家生活愉快，幸福！”荣毅仁先生送来了一个特大花篮，五彩缤纷的鲜花使整个大厅顿生光辉。王玉琳心情格外兴奋，特地穿上了一件枣红色的上衣，显得分外俊俏。为了这个纪念会，她还特意从箱底翻出那双珍藏的、30年前与李敦白结婚时穿的高跟鞋。这双高跟鞋，“文革”时，差点被当作“四旧”砸烂。她穿起来，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地试着步子，走几步，又扭头看一看。这双不平凡的高跟鞋，象征着她与敦白并肩携手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人生道路。

李敦白在致词中深有感触地说：“因为偶然的机会，使我的命运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人民将他们的优秀女儿王玉琳‘赠送’给了我。我将毕生献给中国人民的美好事业……”他的话很简短，博得大家热烈的掌



声，人们纷纷向他们夫妇举杯祝贺。

风雨征程

1921年，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都斯顿的一个海港城市，父亲当过新闻记者和律师，后来成了当地的参议会主席，并代理过市长的职务。他的爷爷曾当过五届议员。这个家庭在当地可谓有一定名望。

李敦白17岁时，就参加了工会和学生运动，为争取黑人的解放而斗争。日本在珍珠港扔下的炸弹，惊醒了美国这个巨人，李敦白应征入伍。军队极需大量的东方语的翻译人员，李敦白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的中国》绝不逊色于十三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的震撼。李敦白希望将来能象斯诺第一个迈向红都延安那样，到中国的抗日根据地去当一名记者。好事多磨，李敦白学了一年中文后，却被分配到了印度，一年中几乎没有什么事干。1945年，“偶然”的机遇来了，他被调到了中国昆明，但不是记者而是通讯兵，天天爬电线杆子。到了中国国土上，对根据地的向往更日甚一日，有了一个学习中文的实际环境，他的热情更昂扬。他决心不用翻译自己做到自由地与中国人交谈，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工作和战斗。他练中文很勤奋，吃饭前、睡觉前都要练，一有空就练。他在卡片上写上中国字，每天都翻，一天规定认准20个字。当我笔者1980年1月第一次见到李敦白时，他一谈到识中国字就兴致勃勃，他说他还练“四声”，当即就抑扬顿挫地读“好”字、“升”字的四声，一边念一边大笑

起来，他说：“那时学会一个中国字就很高兴。”由于他下了苦功，所以至今他的普通话讲得标准极了，没有一般外国人说中国话时那种奇怪的调门。

李敦白以渴望和好奇的心情冷静而又细致地观察中国的社会现状。刚到昆明4天，他就目睹了蒋介石嫡系与非嫡系两个军，用机枪和小炮火拼的闹剧，结果是蒋介石利用杜聿明的五军把云南军阀龙云打败了。李敦白亲眼看到五军对付逃亡士兵以及老百姓的各种刑具：木枷呀，老虎凳之类，这类刑具据说中世纪才有，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才有类似刑具的描述，这在李敦白脑子里打下了极深刻的烙印。

另一方面的印象，给李敦白留下光明的投影：昆明有卖《新华日报》的，李敦白常常买来仔仔细细地阅读，并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后来通过报童引见，他认识了重庆《新华日报》的一个代表。以后，他来到上海。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支持国民党反动派，而军方又知道李敦白是同情中国革命力量的，因此在他当兵期间，美军方面一直监视并且不允许他升级。1946年1月在上海退伍时，同事们全都升官或当上了士官，而他的军阶只是列兵。退役后，李敦白在上海的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当视察官，这期间他会见了宋庆龄和廖梦醒。后到湖南视察灾情，认识了被鲁迅先生赞许的画家司徒乔。在调查灾情过程中，他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美国入实事求是的品格，不为国民党的阿谀奉承所迷惑，对部分美国官员支持和参与国民党贪官污吏倒卖黄金，囤积居奇，倒卖粮食的事情进行了揭露。湖南之行后，李敦白在武汉认识了王震同志和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同志，并且到新四军解放区去调查救济工作；他从宣化店到上海写了一个报告，表扬新四军救灾工作的认真廉洁，经过家家调查，发榜公布救济的办法，很民主也很公正。所有的粮食真正救济了灾民。同时，就在宣化店，李敦白认识了周恩来同志。从此，他一直和周恩来保持着联系，后来周恩来到了南京。有一次，李敦白把要回美国探亲的想法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要他去南京向周恩来告别。可是周恩来鼓励他去延安，李敦白就放弃了回美国探亲的念头，决心去延安。

李敦白走到八达岭国民党守卫的封锁线时，守卫的士兵不让通过。当时有一个中国女学生也想过关，她知道国民党士兵怕洋人，怕美国人，就出主意叫李敦白假发脾气。李敦白觉得不妨试试，于是他就故意大发雷霆。那个士兵果然怕了，急忙找营长，营长也唯恐得罪，赶忙放行，这个女学生趁机和李敦白一同过了关卡。

在一个礼拜天，李敦白会见了聂荣臻司令员。聂司令员风趣地对李敦白说：“我要把你‘扣’下来，不让你走，我们想搞一座‘桥’。我想全国解放后，我们还是要同美国人友好的，我们想搞一个英语广播，需要一个人

改改外文稿子。”就这样，他被“扣”下来了。在聂荣臻这儿工作期间，他结识了邓拓同志及他的夫人丁一岚。他告诉笔者，丁大姐是一个很善良的同志，那时她经常选一些中文读物给李敦白看，教他国音字母，真诚帮助他提高中文水平。李敦白满怀激情地说：“我至今想起来都非常感谢她。”李敦白家中，至今仍悬挂着邓拓同志亲题的条幅：“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后来，李敦白又和冯文彬、孟用潜等一起同行去延安。途中，他们在兴县贺龙将军司令部呆了几天，最后一段路是与习仲勋一起走的。前后共行走了45天。年轻的习仲勋是一个极为开朗的人，他对陕北熟悉极了。他讲了许多刘志丹的故事给李敦白听；沿途，习仲勋可以叫出许多老百姓的名字来，还认识他们的儿女们，经常和他们拉家常。这样深入群众，和人民亲如一家，毫无隔阂，给李敦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6年10月25日，是李敦白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们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走到了延安。当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和其他中央首长接见了李敦白，并和他亲切地谈了话。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欢迎美国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李敦白给毛泽东、朱德作英文翻译，介绍了不少外国友好人士到延安来。

中美友谊之“桥”

聂荣臻司令员让李敦白做架“桥”的工作，决定了李敦白一生的命运。1982年6月，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李敦白与王玉琳离开了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开始从事带美国人来中国旅游的工作。李敦白精通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化。尤其对中国现代革命史，他亲身参与了最辉煌的阶段，他从事旅游工作，那是最不负众望的。李敦白选了这一行业，便于沟通与美国人以及各国的朋友的心理与情感。他们组织来十几批旅游者，多系年老资深文化人，称为“高级旅行团”。他负责带团，又是导游讲解员。开创了在中国进行“文化旅游”的先河。他根据对于中国历史、哲学、文化的渊博知识，讲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受到特别的欢迎，每个旅游者都感谢他，他认为这是使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最好方式。对我国刚刚兴起的旅游事业，李敦白给予热情的关注与无私的支持，对于旅游者给予热忱和无微不至的照料。一次，在广州白云机场，由于飞机延飞，数十名团员被困于机场候机处，数小时无饮料、无饭食，李敦白疲于奔走，进行联络，找有关方面解决困难。他还专程跑到《羊城晚报》找到笔者，对机场的服务工作提出严肃批评，《羊城晚报》登载了他的批评意见，促使白云机场迅速改进了工作。

此外,他还对中国旅游事业中未尽人意的的问题做了详谈,态度是那样坦率和那样诚恳,赤子之心,溢于言表。他的意见涉及的面相当广泛和具体,涉及的地域也非常广阔。有表现工作效率差的,有表现服务设施欠完备的,有表现服务态度恶劣和漫不经心的,有表现缺乏信用和时间观念薄弱的,当然也有社会各类丑恶的现象。这种种情况由当年《羊城晚报》总编辑吴有恒同志亲自批准由笔者写成内参,后来,这份内参材料送到了中央和各省市主管旅游的部门。《人民日报》还进行了内参摘编。待到1986年2月,笔者再见到李敦白时,他高兴地告诉我,故地重游所到之地,过去的令人烦恼的种种情况不复出现了。无疑,李敦白直陈所见,对推动中国的旅游事业的发展,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一个深广的心灵”

世界上有的国家设有不管部,据说工作管辖范围无一定之界限,而又相当广泛。李敦白回到美国后,也有类似的情形。举凡对中美友好的事,他都做。没有人给他定界限,他也没有界限。他与妻子搞了一段旅游,借以结识和熟悉了各方面不少的人,疏通和建立了不少渠道和关系。1983年10月,他已经到了美国最大的一家电脑公司——天地电脑公司任职了。该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八百多家分公司,光美国就有六百多家。李敦白和王玉琳负责该公司在中国的一切事务。他们坚持引进设备和技术管理,都乐于为中国做贡献,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他们频繁地飞行于中美之间,传送着实现着各种各样的信息,创造着实实在在的人生价值。

1985年5月以来,在北京、上海有了三个电脑学校,这三所电脑天地学校都是李敦白以公司名义无偿赠送电脑设备建立起来的。其中北京康华电脑天地学校是专为残疾人谋取生活手段而建立的,显得很有特色。这所学校成立时,邓朴方专程摇着轮椅参加了开学典礼,对李敦白为残疾人谋取生活自立并有贡献于社会的义举深表钦佩与感谢。李敦白则平静地表示:“我应该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

最近,李敦白正在与美国一家石油公司联系,引进先进技术,以克服中国一些石油稠度大,含蜡高的弱点。此外,他发现美国有一项技术是将木材浸入沥青,过后用作枕木。美方希望外国来做这项工作,美方愿无偿为该国兴建一个深水港,以利货运之进出。李敦白认为中国石油和人力的潜力都十分巨大,又是发展中国家,很适于此项工作,而且对中国也极划算,他抓住机会不放,与中国有关部门联系,力争成为现实。

李敦白又听说美国有一种猪油果(该果大若柚子,

果肉若凝聚猪油一般)很好,含油品质高,是一种极好的木本油料作物。他就及时在中国物色适当地点,作引进试种的打算。

李敦白是一个热心人,国内很多部门的人都希望他协助引进,他从来都不拒绝,总是认真办理。他有一个真正的中国革命者那种平易近人的优秀品质,同时他又具有美国人那种务实和讲究效率的作风。我有个在水电部工作的朋友,负责宜昌三峡工程移民安置,方针是开发扶贫,引导致富,请李敦白给予协助。李敦白极为认真和仔细地听他介绍情况,立即表示可以请美国援助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机构协助投资,并立即起身与美国杜邦公司在华机构电话询问,又仅用几分钟的时间接通了美国的电话,落实这件事情,这使我和朋友感触良深。当笔者向李敦白提出,中国的乡镇企业正在迅猛兴起,如何向高一方向引导?如何引进外资?请他关注。李敦白感到极大的兴趣,并表示,美国有一个中小企业中心,可以与之沟通联系,并立即让妻子王玉琳记录下来,重视这个工作。

1986年6月,李敦白又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他通过关系和自己的名望,延请到美国一个著名的管理专家到北京、上海等地免费为中国管理人员进行高级管理的讲学。李敦白坚持和强调,不但要引进适合于中国国情的设备、技术等,更重要的是还要注意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管理技能和程序,这是实现中国“四化”所绝对必需的。

黑格尔曾讲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深广的心灵总是把兴趣的领域推广到无限事物上去……”我想,没有比这句话更适合于李敦白的了。

美国“间谍”的中国心

李敦白在中国生活42年,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必然成功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但他的生活道路却充满了坎坷。

他在中国42年中,竟有16年是在牢狱中度过的。第一次是在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1949年1月22日到1955年4月初。前后共有六年零三个月。

事情要从苏联说起。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就从解放战争来说吧。1948年,中国的解放战争发展迅猛,政治、军事形势都很好。斯大林派人来到中央所在地的西柏坡,了解中国的情况。我军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而斯大林则要求我们“停止内战”,以长江划界,搞“南北朝”局面。中国共产党没有答应,斯大林不高兴。早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一直忧心忡忡,担心中国内战打

乱雅尔塔协议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当时在延安的美国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提出由李敦白协助她写《毛泽东传》。后因胡宗南进犯延安，此事拖了下来。1947年1月，斯特朗到莫斯科，随即决定回中国，全力以赴写《毛泽东传》。就在她行程的前一晚，苏联外交官问她，假如有一天苏联与中共和毛泽东决裂，你站在谁一边？斯毫不含糊地表示，当然同中国站在一边。这一来得罪了苏联，斯大林很善于罗织罪名，置人于死地。硬说斯特朗是臭名昭著的美国特务，把她抓了起来，并诬称李敦白也是美国特务，是斯特朗特务网在中国的一个“网络”，叫中国把他抓起来。就这样，李敦白在他与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被无情地投入牢狱。但李敦白坚信自己是无辜的，他并不为此而沮丧。1955年，他被无罪释放。他原来的中国妻子，在他入狱后离婚而去。次年他与王玉琳结为伉俪。李敦白出狱时，周总理给了他很多的安慰，时常与他来往。他曾郑重地向总理提出要求，加入中国籍，周总理委婉地告诉他，中国六亿人口，多一个中国人显不出来，但你保留美国籍，将来便有利于中美友好交往。这样，李敦白一直保留了美国籍。他一直牢记着周总理的嘱咐，决心以自己毕生的行动证明，他将不断地致力于中美友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1968年2月至1978年10月，是李敦白第二次坐牢的时间，这次是康生和江青陷害，给他戴上“美国间谍”的帽子。他被投进冤狱，与世隔绝的生活是痛苦的。但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李敦白还是坚信，光明的中国不会重新沦为黑暗，他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弄清。他在自己苦难的心中，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初衷没有改变。他珍惜这几十年来历经考验的深沉的情感。在小小的牢房里，他每天都用清水将地板擦得干干净净，纤尘不染。看守不解地问他：“李敦白，你为什么天天将地板擦得这么干净？”李敦白骄傲地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块土地，现在由我管理，我就要管好它！不能让它玷污！”

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入狱中，李敦白极为悲痛，他把总理遗像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墙上，从衣服上撕下一块黑布缠绕在臂上，悄悄地淌着泪水，默默地悼念这位伟人。往事历历，他回忆起周总理在宣化店和他初会的时候是那样关心他这个美国朋友的安全；他回忆起总理在北京专门请他一家看戏，他的两个女儿还小，在慈祥的周总理的两条腿上爬上滑下地逗乐，他出于礼貌，制止孩子们这样做，但总理却亲切地说：“不怕，不怕，我顶喜爱孩子们这样。”他又回忆起自己身陷囹圄，又是总理仗义执言，抵制江青一伙的诬陷……他不能想象，象总理这样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就永远离开我们呢？李敦白为中国感到极度的悲哀，为中国感到极度的忧虑。

在李敦白坐牢期间，四个儿女都还在上学。他们处处遭白眼，受冷落。最小的儿子晓明，才七八岁，出外常受同龄儿童的欺侮，他们打他，丢砖头砸他，骂他是小杂种，孩子的心灵受到摧残。妈妈也进了干校劳动，长时间地背砖头，腰脊受到劳损，孩子无人照料，甚至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玉琳让晓明一个人去石家庄找姥姥度日。临上火车前，她在儿子胸前挂了一个纸牌儿，上写：“请各位叔叔阿姨们照顾这个小孩，他到石家庄找他的姥姥，拜托了。”就这样，晓明一个人告别了北京找到姥姥。祸不单行，外祖父外祖母坚信女婿是个好人，但无端的流言蜚语和罪名太大了，外祖父担惊受怕，这种压力使他喘不过气来，他病倒了，含冤离开了人世。晓明就只好与慈祥的姥姥相依为命，苦苦度日。在北京的女儿们都面临失学的危机。玉琳无可奈何，只得给总理写信，写了好多封信，但只有一封落到总理手中，总理立即亲自给北京西城区教育局去了信，才使孩子们继续在校读书，动荡年代的学校，可这也聊胜于无啊！李敦白的案子遥遥无期，有一些好心的人劝玉琳和李敦白离婚。但他们相濡以沫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使玉琳深感到李敦白的为人和高尚的品格，她婉言谢绝了，而是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含辛茹苦地陪着儿女们等待着父亲的归来。“四人帮”垮台了，李敦白的案子有了转机。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郑重的党，李敦白终于在1978年10月18日被宣布无罪释放，他的冤屈得到昭雪。党和政府补发了他全部工资，重新分配他热爱的工作，对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让他休息一年。分别10年的妻子儿女们又团聚了，李敦白全家充满了无限的幸福和喜悦。10年不见了，孩子们都长大了，李敦白拥抱着他的妻子和一个个儿女，喜泪纵横，大家特意到照相馆，高高兴兴地照了一张全家福，新的生活开始了。在监狱中，李敦白哪一日不渴望自由，哪一夜不梦想工作？如今他终于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工作，他怎么能够等待，他不同意休息，他立刻开始了工作。

李敦白从1945年来到中国，到1979年已有三十四年没回过他的祖国——美国了。这时，他携带亲爱的中国妻子王玉琳双双飞到太平洋的彼岸，他们第一次到美国探亲，这在合众国引起了轰动，报刊电视广播纷纷向国民介绍这个美国儿子。其中《人物》杂志有这样一条大标题颇耐人寻味：《李敦白当了中国的囚犯后，仍旧是中国的真诚朋友和信徒》。美国最大的一家报纸《纽约时报》1979年3月22日一篇报道的标题也很意味深长：《美国的儿子回家来讲他在中国的姻亲》，文章的导语也很别致：“李在34年以后第一次回家休息，他昨天说，我觉得我就是美国人民的一个儿子，中国人民的一个女婿。我这次回来，给家里人谈谈我姻亲的事。”

李敦白夫妇在美国受到相当普遍的欢迎,这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李敦白会见了自己在美国的唯一亲人姐姐。姐姐年纪大了,劝李敦白在美国定居。他和玉琳谢绝了姐姐的好意,仍回到中国来。几年过去了,有人认为李敦白年纪大了,劝他离休,安度晚年,但李敦白也拒绝了。他认为自己精力充沛,身体健康,他要为中国人民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他想到周总理的殷切的期望,他回忆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他决心开拓新的历程。他决心下定了,回美国,但不在那里定居,而是飞来飞去,为中国人民继续努力工作,为中美两个国家的伟大友谊继续架“桥”。

李敦白一家很和睦很民主。他和儿女们极为亲密。他说:“在我们家,谁有道理就听谁的。我们谁也无权利限制谁。有事大家商议。”一家人除晓明仍在美国读电影摄影专业外,都有各自的工作。他们经常奔波在外,在北京难得见面相聚,虽然那儿有他们的家,一见面显得格外亲热,短暂聚会,又各飞西东。李敦白和玉琳相亲相爱,互助互敬,互勉互励,有如新婚燕尔,谁人见了这情形都会禁不住投以赞叹羡慕的眼光。当笔者问到李敦白“你何以总是那样乐观?”他说:“来中国是非常幸福的事,能在中国工作,是我一生的荣誉!我从不后悔来中国!”他又说:“一个人总是想着自己会被人如何理解,如何猜测,如何算计,那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无穷的烦恼之中。反之,自己总是想到工作和事业,对得起良心,天伦之乐自会更亲切更美满。”这可是应了中国孔圣人的一句名言:“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了!

有一件事使我至今难以忘怀。那是1982年的6月12日的上午,李敦白约请我到广州白云宾馆冰室小坐。欢谈之下,他忽然若有所思,严肃地问我:“在美国有的留学生比如说他老子在国内是一个什么官员,那末,他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将国内与美国某客商签订的一个什么合同废弃,转让给另一个给他钱的商人,这留学生将这笔钱存在国外,这种行为是对的吗?”李敦白在听了我的否定回答后,手在桌上猛地一拍,“对!这是在吸中国农民的血!”那满腔愤慨和憎恨的眼神,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历历如在目前。这,就是李敦白!

从“引得”总裁到“女儿公司”的男雇员

李敦白告诉我,他已从美国天地电脑公司独立出来,成立了一个新的“美中引得公司”。李敦白任总裁,玉琳任业务主任。这公司完全致力于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和中国建立平等、互利、可靠的商业关系。

这个公司独立经营了两年左右,事业又有发展了。



李敦白夫妇与本文作者

他的公司已经与美国著名的“女儿公司”(公司人员均为女性)——卡姆斯基联合公司合并了。李敦白仍是负责向中国引进的咨询公司的一员。这件事情在美引起注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还特别祝贺李敦白成为卡姆斯基女士雇用的第一个男士。李敦白对公司的前景是乐观的。3月份,他成功地地为石家庄市引进一整套制造高级牛仔褲厂的设备,利用当地的棉花纺成布,利用美国的设备和技术,从很大程度上满足中国人穿牛仔褲以及牛仔布的需求量。7月份,他还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刚和玉琳去了一趟海南岛,同梁湘省长和许世杰省委书记谈得很融洽,在海南的发展前景是很好的。我也为之高兴!他已经彻底地成为一个引进的专家,商业的内行了。

李敦白的发展使我更体会到“识时务者为俊杰”、“时事造英雄”这些古典格言所包含的意义。他在发展,他在变化,是随中国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变化,但有一条红线贯穿着,这就是:中美友好。这使我想起了两件佚事来。那还是1980年初春,在北京他的家中,我见到邓小平的女公子邓林为他们夫妇画的一幅彩墨国画,邓林将画展现在李敦白面前,那是两株生机勃勃的腊梅,一株是红梅,一株是白梅,枝繁花茂交相掩映,她题明是送给李敦白和王玉琳的,我仿佛看到了李王正挽手昂立,笑迎春风,中美的友谊不就象邓林画的红白腊梅吗?经历过严冬的考验,正在盛开怒放。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宋霭龄给孙中山 当秘书 的日子

●名 芳

宋霭龄在美国度过了6年的留学生涯，1910年初回到上海。她参加了同盟会，担任父亲查理——同盟会司库的秘书，协助父亲同海外的孙中山联系。在她幼年的时候，孙中山就是她家的常客。经过这两年的工作，她对孙中山的主义和为人已经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911年12月25日，沪军都督陈其美为迎接孙中山由海外归来作了精心安排，他专派了一艘“建威”号军舰到吴淞口迎接，宋霭龄和父亲查理一早就来到码头，翘首以待。

当孙中山一眼瞧见留一溜黑密胡子的查理时，他早已忘记了要保持领袖风度的劝告，呼叫了一声“查理”就奔过去，两人热烈地拥抱到了一起。

孙中山向随行的人扼要介绍道：“查理，我的老朋友，同盟会的理财人。”宋霭龄一直羞怯地站在一旁，她低声地叫了一声“孙叔叔……”孙中山惊讶地望着这位一身西服，上身还别着一朵漂亮的红宝石胸花的年轻姑娘，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她。

查理急急地向孙中山介绍说：“这就是我的大女儿霭龄……”

孙中山热情地向霭龄伸出手：“这么大了，没想到，没想到，在我的印象里，你还是那个扎羊角辫、穿灯笼裤的小姑娘呢！”

建威号载着孙中山一行向码头驶去。途中，孙中山忽然向查理说：“这一回来，必然事务繁冗，能否为我推荐一位能干的秘书，尤其要精通英文。”

查理略一思索：“现在就有一位”，用手一指霭龄，“她已经给我作了两年秘书了，我相信她能干好。”

虽然孙中山刚刚和霭龄见面，但已经从这两年她协助查理同自己联系中了解到她确是思维敏捷，办事认

真。他满意地一挥手：“那，那就挖你的墙脚啦！”霭龄听到他们谈话，马上站到孙中山的面前：“先生，我现在听您吩咐！”

孙中山想了一下：“上岸以后，国内同志给我汇报的情况，你先认真记录下来。”

查理插一句：“先生的谈话也要认真记录。”

码头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军乐齐奏，气球飘飞。孙中山在陈其美致欢迎辞后发表了讲话，他高度赞扬了10月10日武汉军民首义的勋和大无畏革命精神，高度评价了上海光复的重要意义，接着话锋一转，对革命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他坚决反对与清廷议和，主张巩固光复地区，组织军队，以革命武力统一中国。孙中山最后语调铿锵：“愿我将士少希望于和谈之可成，急整军旅，北扫鞑虏，以慰国民之热望！”

一批新闻记者拥上来，有的选取各种角度，对孙中山拍照，一时间，镁光闪闪，咔嚓声响成一片。有的向孙中山提出各种问题，问题提得急迫、尖刻，让孙中山应接不暇。忽然一名英国记者挤上前来，大声问道：“孙先生，您一直在海外筹款，国内同志已光复了半壁河山，您才回来，想必带回一笔巨款作为补偿吧？请问能不能讲一下，您究竟带回来多少钱？”

陈其美感到这样的问题会让孙中山难堪，他开始指示卫兵挡开记者保护孙中山离开，没想到孙中山对这个问题倒很有兴趣，因为国内不少同志肯定也有这种想法。他微微一笑，说声“OK，我来回答你”。接着拿起了台上的话筒，向着全场大声说：

“刚才英国记者问我这次从海外带回来多少钱，我可以公开地告诉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我这次回来是一文不名。带回来的只有彻底的革命精神！”

霭龄为孙中山坦荡巧妙的回答所激动，禁不住挥手喊了一句：“革命精神万岁！”顿时，会场上响起了连天的口号声……

欢迎仪式结束后，孙中山回到了住处，霭龄就分外忙碌起来。同盟会的重要人物黄兴、汪精卫、李平书、陈其美，一个个来向孙中山汇报情况，霭龄静静地坐在一边，飞快地作着记录。稍有间歇，她就去翻阅各地发来的电报，分门别类归拢好，然后摘录要点，把重要的事情整理清楚，送交孙中山过目，再按他的指示草拟出回电，交人发出。除了向孙中山汇报情况和听取他的指示，霭龄对其他人大都一言不发，即使党内的要干部，也只是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仅仅过了几个钟头，孙中山刚回国时那种百事挠心、忙乱无序的心情就有了好转，感到事情虽然繁杂，但经霭龄协调，已经可以提纲挈领，抓其大要了。晚上休息之前，查理来安排警卫事宜，孙中山向着查理由衷地赞扬霭龄：“您推荐的秘书我非常满意，可以说是美国式的高效率！”

1911年12月29日，全国17省代表集会南京，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接近全票当选。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以后，霭龄的工作更加繁忙。电报、函件、请示、报告，象雪片一样，纷纷扬扬落到她桌上，半天就堆起个小山来。虽然又添了秘书，但是她是最受孙中山信任的，也是自以为责任最重大的，最重要、最机密的事情总是自己处理。她记性好，遇事果断，再多的事情，她也处理得有条不紊。渐渐地摸着了规律，她露出了一种敢作敢当的劲头，一些向总统请示的函件，如果她认为申述不够明确，就毫不留情地退回去。尤其是一些旧官僚当总长的部门，她常常在文电上挑一些毛病，弄得那些人颇为头疼。渐渐地有些人开始怵她了。她心中的确是为总统着想，想减轻他的一些负担，当然心底里有时也是有意搞点恶作剧，故意出一出与总统意见不一的人的洋相。

霭龄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12年2月13日，就是7虚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签署退位诏书的第二天，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继任总统。

袁世凯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极为恼火，他鼓动手下的48位军事将领联名通电，表示要对南京政府大动武力，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既不要孙中山作总统，也不要溥仪作皇帝，就是要自己总揽全国大权。他把大总统看作一块肥肉，必欲自己吞之而后快。孙中山则恰恰相反，他把总统职位看作替人民办事的仆役，得之不喜，弃之不忧。

早在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奔赴伦敦向英国政府请求支持革命的时候，就有一封国内拍往英国的电报。这封电报没有发报人的地址姓名，也没有收报人详

细地址，收报栏里只有“伦敦孙文”。英国邮电局无法投递，就把电报转给了中国驻英使馆，使馆也不知道孙中山在哪里，又把电报交给了他的一位英国朋友。这位朋友就是当年孙中山被清政府诱捕后，积极营救他脱险的康德黎。孙中山从康德黎手中接过电报后，含着微笑在眼前晃了一下就揣进了衣兜。康德黎不懂中文，对电报内容不甚放心，第二天憋不住还是问了孙中山：“电报中有什么秘密事情吗？”孙中山淡淡地说：“国内要我回去担任总统。”说这话的时候，竟没有任何激动和愉悦之情，别说官本位观念极重的一般人，就是这位英国朋友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应该大大高兴才是。看孙中山无意再谈此事，康德黎不得不再次发问：“请问你打算就职吗？”孙中山说：“如果没有更适当的人选，则由我承担也未尝不可……”

动身回国之前，孙中山给上海《民立报》发回一封电报，电文说：“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自当推定黎君（元洪），闻黎有拥袁（世凯）之说，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这封电报也可看出孙中山对总统职位的态度。

袁世凯则是一开始就瞄准了时机，打算利用这场革命实现他的独裁野心。当初革命党推选孙中山任总统的时候，袁世凯使人在同盟会内部散布：“论功应推黄兴，论才应推宋教仁，论德应推汪精卫。”企图使革命党内部形不成统一意见。这一着不灵，又以处于他掌握之中的清朝为筹码，与南京方面交涉：清朝退位，孙中山让位；孙中山不让位，则清朝不退位。革命力量的软弱和一些天真，加上孙中山对总统职位清淡，袁世凯终于如愿了。

但是真正的革命党人却不愿意大权旁落，使革命成果让人轻易取走。霭龄反对孙中山辞职，但是她说服不了孙中山，也阻止不了袁世凯的夺权阴谋，憋了满肚子哀怨和火气。

霭龄提醒孙中山防范袁世凯。孙中山大度地笑笑说：“不怕他，我们已经制定了《临时约法》，一可以以国会的多数限制他滥用总统权力；二来我们已经公布南京为民国首都，他必须到南京就职，离开了他的老巢，到了南京这个革命大本营，他想胡作非为也没有基础了。”

2月14日，参议院接受了孙中山的辞呈。但是要等新总统亲到南京就职，孙中山及各国务员乃行解职。

霭龄的担心又一次被验证，袁世凯玩弄花招，唆使曹錕在北京发动所谓“兵变”，抢劫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并冲击南京代表在北京的下榻处。蔡元培等专使只好逃到美国友人住宅避难。袁世凯还策动各地都督、巡抚通电反对袁世凯南下就职。南京方面相信了袁世凯说的他

如果到南京就职,北京就会大乱起来。因而作出妥协,同意袁世凯荒唐的“电报宣誓”,在北京履任总统。

霭龄度过了无精打采的一段时光。3月30日,孙中山与袁世凯最后敲定了内阁成员名单,唐绍仪为总理,9名总长中,同盟会员占了4席,分别是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4月1日,孙中山在参议院举行解职礼。他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待实现民生主义。”他念念不忘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宏图,表示十年之内不过问政治,一心完成铁路建设计划,使中国在经济上富强起来。

孙中山卸下总统重担,顿觉一身轻松。他与黄兴约定,自己搞铁路,黄兴去搞大西北的开发,共同把民生主义推向一个实际实施的新阶段。

4月14日,孙中山从南京出发,准备南下广东,开始考察铁路建设。霭龄犹豫不定自己是继续在孙中山身边工作还是回到父亲那里,她想和查理仔细谈谈这个问题,孙中山也想见见查理,他们乘坐的“联鲸”号军舰悄悄停在了江南制造局码头。

查理事先接到通知,已在码头等候。船靠岸后,他登上了军舰。两个老朋友一见面,就对铁路问题谈上了瘾,查理非常支持孙中山的弃政修路方针,他说,美国的富强,就是从兴修铁路开始的,铁路一通,沉睡地下的资源很快被开发,国民经济就迈开了大步,他完全赞成孙中山的计划,并已着手在资金上想办法。孙中山更是兴致勃勃,两个人越谈越上劲,两个小时过去了,都还意犹未尽。霭龄在一旁根本插不上话,也没有机会同父亲谈自己的事。天色已晚,孙中山欣然接受邀请,住进了查理家中。



宋霭龄(中) 宋庆龄(右) 宋美龄(左)

吃过晚饭,孙中山又站在了1894年的那幅全国地图前,他兴奋地对查理全家说:“从第一次勾出全国的铁路线,我就为它激动不已。可是那时候不首先进行革命,铁路根本无法修建。现在好了。共和革命已经完成,我可以专心致志地来实现它了!”

孙中山边说边在地图上用红笔划着:铁路建设的第一步是勾通全国三大干线。第一条,从广东南海起,经广西、上贵州、进云南、出四川、入西藏、最后北上新疆天山;第二条,从上海出发,过江苏、安徽、河南,经陕西、甘肃,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到达伊犁;第三条,起于秦皇岛,穿越山海关进入辽宁,再向西折入内蒙,北穿外蒙古,到达乌拉海。他说,这些铁路完全修起来,每年仅运输收入就可以达到十万万,很快就可使中国进入世界最强国之列……

查理一家听得情绪激动,为孙中山的宏伟蓝图所鼓舞,他们为孙中山描绘的光明前景所陶醉,忘情地鼓起掌来。尤其是霭龄听到铁路能发挥这么大作用的时候,眼睛里闪出了多少天来少见的光芒,她已经对这项工作大有好感了。

刚刚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来的宋子文,这时正在上海都督府当一名不领薪饷的文书,他对那份工作没有兴趣,这时赶紧缠住孙中山,坚决要求跟随他一起从事铁路建设。

孙中山对查理说:“你的两个孩子我不能都带走,你的身边也需要人,姐弟俩谁去谁不去由你决定。”

查理说:“子文不要争了,还是你大姐去。”宋子文来了个美国式的耸肩:“在我们家呀,重女轻男!”

孙中山被逗乐了:“中国呀,几千年来都是重男轻女,只有杨贵妃时代有过重女轻男的说法,不过那大概也只存在于诗人的浪漫笔下。你倒说说,你们家是怎么重女轻男?”

子文手插裤兜,望着天花板不出声。

查理对子文说:“修铁路现在最需要的是钱!二十万里铁路共需要六十亿元。没有钱连一寸铁路也修不起来。我们来个分工,孙先生和你大姐负责铁路规划和设计施工,我们两个负责筹措资金,这个不重要吗?我倒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家,最好是作国家银行行长,干什么也离不开财政金融的支持呀!”

霭龄赶紧说:“对呀,一切之中钱是最重要的!”

孙中山在上海停留了4天,换上江南制造局帮办牛尚周预备的客轮,开赴广东。

霭龄一扫孙中山辞职初期的沮丧情绪,对孙中山的伟大品格和不凡举动已经有了充分的理解,尤其对孙中山兴修铁路的雄心和这一计划的重要意义越来越感到由衷赞赏。她把查理父亲准备的一大批有关铁路建设的

资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好，适时送给孙中山参阅。

船到广州，他们受到广东都督胡汉民的盛情接待。军乐队吹吹打打，还有天真烂漫的儿童献花，当晚又举行了盛大宴会。霭龄感到很惬意，孙中山却有些不以为然，他对胡汉民说：“兄弟现在不是总统视察，而是个在野人士考察铁路，搞这阵仗干啥嘛！”胡汉民笑笑说：“革命成功了，我们也该开开心，您现在也不在朝中，没有人能说什么。他袁世凯别看当了总统，他来了我还不一定伺候呢！”

离开广州，孙中山按照自己划定的铁路线进行实地考察，他们遇水行船，旱路乘车。凡有铁路的地方，孙中山到南京就任总统时的专用花车早在等候。各地的官员和百姓都对孙中山表现出无比的热情，欢迎、宴请、安排游览、赠送礼品，有时老百姓还自发地夹道迎送，为的是看一眼这位把皇帝佬儿赶下台的人物究竟是几个头几只手。这多少有些妨碍工作，孙中山一再要求官员们简化接待，以便腾出时间多做些实际考察。对赠送的礼品，价值贵重的他一概不收，宴请除非是党内相熟的同志小范围的小饮浅酌，其他统统谢绝。

这年的7月22日，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8月，他来到北京，袁世凯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节接待了孙中山。袁世凯对孙中山竭力恭维奉承，几乎是言听计从。袁世凯腆着大肚子在孙中山面前低三下四的卑顺，使霭龄转变了对他的一贯印象。她对孙中山说：“我原来一直以为袁世凯是个猴精猴精的奸诈鬼，没想到是这样一位厚道慈祥的大头翁。”孙中山问何以见得，霭龄说：“人太奸诈了老用心思琢磨别人，就不可能长胖，必定是尖嘴猴腮；只有心眼厚道的人才能心宽体胖，腆出大肚子来。这样的人即使想使坏，也必定不难斗！”孙中山听得大笑，故意说：“听口气你还是个相面专家。我比袁世凯瘦得多，你看看是不是不如他心眼好啊？”霭龄说不出理，就撒娇地扑向孙中山，用手去捂他的嘴。孙中山只得连连后退。

孙中山也对袁世凯失去了警惕，接受了他“全国铁路督办”的委任。孙中山诚恳地对袁世凯说：“今后我们二人分工合作，十年之内，你练精兵百万，我筑铁路二十万里，共同使中国走向富强。”

霭龄随孙中山继续考察，他们一起拜访了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向他请教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然后又参观了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京张铁路。

10月，孙中山在上海开办了中国铁路总公司，自任公司总理。霭龄又成了总理秘书。

1913年2月，查理也随孙中山东渡日本考察铁路并筹措资金。一年多来他第一次和女儿朝夕相处，看到霭龄在铁路方面的知识大有长进，她已不再只是给孙中山准备资料，在和日本铁路专家谈话时，她往往能抓住

实质，提出最需要了解的情况，还不时插话，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正日本专家的建议。查理很为此感到满意。

“霭龄，看到你这一年多来的进步，我非常高兴。现在你都快成半个铁路专家了。”

“是吗？谢谢爸爸的夸奖！”

“爱这项事业吧？”

“爸爸，我愿意为孙先生的铁路宏图献出我的一切！”

霭龄和父亲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国内传来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消息：国民党在国会选举大获全胜，取得多数席位，就在踌躇满志的宋教仁从上海出发，准备到北京组织内阁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时候，袁世凯派出刺客于3月20日在上海车站向宋教仁连发两枪，一代革命精英在经历了整整两天的巨大痛苦之后，含恨辞世。

孙中山经历了铭心刻骨的悲怆。但是他还不相信谋杀宋教仁是袁世凯下的手，袁世凯在他面前的卑顺表演还历历在目，他把这件事交给“法律”去解决，自己仍潜心于铁路建设。但直到几年后他彻底放下这项工作，仍象在革命中的遭遇一样，没有一个外国资本家真心实意为他朝思暮想的铁路提供资金。唯一同他签订了合同的是一家英国公司，而这家公司自始至终履行的也没有超出过勘测阶段。

当袁世凯动手一个一个解除国民党占据的各省都督职务时，孙中山终于醒悟了。他重新披挂上阵，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3年7月，由江西都督李烈钧首先宣布该省独立，接着黄兴在江苏、陈炯明在广东、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等，都宣布独立。他们发布了讨袁檄文，组成讨袁军，与袁世凯展开了对抗。早已部署好大军的袁世凯乘机进攻，匆忙起事、内部涣散的讨袁军不到两个月就土崩瓦解。孙中山只好再度流亡，跑到了日本。

革命后跟孙中山公开在一起活动的宋查理，再也无法充当秘密党了，巨大的危险降临到全家头上。

查理全家在日本神户上岸。为离东京的孙中山近一些，后移居横滨，租了海滨山上的一幢楼房。从这里可以俯瞰东京湾，是外侨中上流人士居住的地区。孙中山摒弃了“十年不过问政治”的宣言，查理恢复了昔日和孙中山的密谋，他们共商反袁大计，制定新的建党纲领。孙中山的寓所成了当然的流亡者总部，每日来聚会的革命者络绎不绝。但这时霭龄因为身体不适，未能到孙中山身边工作。

庆龄参加了流亡者总部的工作，她思路清楚，眼光敏锐，剖析事理直中鹄心，不为表面现象所迷。她没有个人企图，一心一意做好流亡者的组织工作。她文静、谦

和，善与人处，很快博得众口一致的称赞。

孙中山亲手写了一张条子，对霭龄的身体健康表示慰问，并请她康复以后，能尽快回到自己那里工作，他需要她协调处理那些繁杂的具体事务。

两天以后，霭龄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孙中山面前。孙中山热情同她握手，表示在她离开的日子里，许多事情都显得乱糟糟的，希望她能帮助他尽快恢复以往有条不紊的工作秩序。

霭龄满怀信心，在孙中山办公室一角安下了她的小桌子。并以她的干练很快把孙中山从文牍纸堆中解放了出来，使他有时间和精力专门考虑比较重要的事情。

孙中山顿显轻松。

转眼到了1914年春天。

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祥熙也到了日本。查理见到他之后，认为他是一位有实干精神的青年，把他带到家里共进晚餐。霭龄和孔祥熙在美国留学时曾有过一面之交，这时霭龄已经24岁，该考虑婚姻问题了。两人谈得很投机，很快订下了婚约。

几天后，霭龄正式向孙中山提出了辞职。孙中山舍不得失去这样一位好助手，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他语调沉缓，高度评价了霭龄几年来的工作，赞扬了她的工作精神、办事能力和负责态度，并对霭龄作了诚恳挽留。孙中山说，如果准备结婚，以后可以多留一些时间处理家务，每天只要能来两三个小时帮他处理一下最重要的事务，都将非常感激。为孙中山的至诚感染，霭龄几乎要答应留下了。但她忍住了，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决心彻底离开。她向孙中山推荐了妹妹庆龄来接替秘书工作。她介绍说，庆龄非常崇拜先生，热情高，意志坚定，是一位凡事务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她在各个方面都比自己更强，肯定能干得更好。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

霭龄离开的时候，孙中山亲自送出门外。握手道别后，又一直目送她的车子远去。霭龄在孙中山身边工作的日子，成为她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责任编辑 远 弟)

广告

糖尿病从本治起

——介绍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糖尿病科

被评为甲级特色专科门诊的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在党委一班人的正确领导下，在做好防病治病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对疑难病的治疗。以主治医师周向荣大夫为骨干的糖尿病攻关小组，经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潜心研究，大胆创新，努力从中医药宝库中吸取精华，利用中药治本之优势，经过临床的反复实践，成功地研制出具有生津止渴、益气养阴、清热泻火、健脾实胃、益肾缩

尿疗程短、疗效迅速，愈后不易复发之功效的治疗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的纯中药“消渴”系列药物。为从根本上治疗糖尿病闯出了一条新路。

花香蝶自来，良医门前病人多。患糖尿病五年之久，血糖、尿糖居高不下，并发四肢麻木、视物不清、精神萎靡、体瘦如柴的重症患者，经服三疗程药物便可得到康复。众多患者感动得连声称奇！几年来由于恪守信誉，疗效优良使边远来诊不便的患

者，通过信件联系，邮寄药物，也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治疗效果。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糖尿病科的全体医务工作者以信誉第一、患者至上，无时无刻地谨候着广大患者咨询、就诊，愿给每一位糖尿病患者带来一个永恒的春天！

联系地址：郑州市汝河西路12号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糖尿病科

邮编：450006

电话：(0371) 8984530

来诊：到郑州从二七广场乘9路车到陇海西路站下车向西沿文化宫路往南走200米左拐即到。

台湾归来祭陵人

●高建中

每年清明，是中华民族传统祭祀的日子。辛未年（1991年）的清明节，在祭祖的人潮中，有一群人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主要由台湾退役将领组成的“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以下简称“黄埔会”）恭谒黄帝陵、中山陵访问团，他们40年来第一次出现在苍黄的轩辕黄帝陵和巍然的中山陵。特别是该团一行在京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接见，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目。

他们的归来，是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一件不可小看的事情。

祭祀，假如真的像《后汉书》中所云，“祀者，所以昭考事祖，通神明也”的话，长眠在地下的黄帝和中山先生以及众多的先祖列宗，是否也会从中感到一丝的安慰呢？晚9时许，飞机在西安机场徐徐降落。等候已久的人们赶忙迎上前去，于是，就有了久别重逢的拥抱，就有了亲热关切的寒暄，就有了急待沟通的询问。记者刚刚握住了一双苍劲的手，尚没有看清他的面孔，耳边就响起了洪亮而又自豪的声音：“我们是为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打冲锋来了。”

台湾的这个“黄埔会”年初成立，三个月就组团来访。这个团由荣誉会长邓文仪（一期）、会长刘璠、执行会长张琦（十期）率领，全团共计31人，有黄埔军校一期至三十九期的众多同学，也有几位先生的太太。平均年龄已经65岁了。

5日凌晨3时他们便起床了。3时40分，不顾年迈体弱、一路劳顿，

又登车启程直奔他们渴望已久的第一目的地——黄帝陵。

心香一炷祭黄陵

黄帝陵坐落在陕北高原黄陵县桥山之巔，距西安204公里。8时许，访问团抵达黄帝陵，这里已聚集了15000余名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访问团成员向桥山顶拾级而上，攀登一二里路，至黄帝陵前竟然无一人落伍。当大会主持人宣布参加祭陵团体，提到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时，一位老大娘竟然说：“台湾来人就好了，不再打仗就好了。”黄埔同学孟宪舆先生（三十期）听到这话，怦然心动，他也感慨地说：“这是民心啊！民心在盼安定，盼团结，盼统一。两岸应该尽快促成统一，强国富民才是啊！”

走下山来，访问团兴致勃勃地瞻仰了轩辕庙。

1937年4月5日，为了实现民族的团结抗日，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当年的祭文已刻在石碑上，它将永远昭示后人：团结和统一，是民族团结和强盛之本！邓文仪先生激动地对笔者说：“50多年以前，在国共第二次的合作抗战中，我曾经来这里祭黄陵。今日重朝圣地，希望祖国尽快实现统一，海内外的同胞们都应该为此目的竭诚努力！”周乐军先生（十五期）的心情更是激动，半个世纪之前，他曾经带领一个排在黄帝陵驻守过。今天再度来到黄帝陵，

真可谓：“古柏今犹绿，战士白发增”。

75岁的陈舜钦（六期），祭了黄帝陵后说：“我们海峡两岸真是一家人。一是血统，两岸都是炎黄子孙；二是史统，两岸有着共同的历史——五千年的文明史；三是道统，我们的民族有着良好的传统道德，作为中国人，我们有自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对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很重要。”

访问团中不乏文人墨客，归途在铜川县宾馆小憩，作家周石麟先生（政校一期）赋诗云：“桥山巍巍郁葱笼，拾级攀登拜始宗；一脉支流盈四海，枝繁叶茂本同根。”张琦先生的太太麦永芬从黄帝陵包来的一包黄土，一路珍藏，她说：“我要把这包土带回台湾，供起来，让我的家人和子女都牢牢记住，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这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

4月6日晚上，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副省长徐山林会见并宴请了“黄埔会”一行。张勃兴说：“我会见过许多海外的客人，但是，每当我见到来自台湾的客人时，就感到格外的亲切，我们是骨肉同胞，语言、文化、习惯都是一样的嘛！”他欢迎大家经常回来看看，为祖国大西北的开发与建设做出贡献。

邓文仪在讲话中激动地说：“过



海内外黄埔同学共祭黄帝陵

去,我经常听说大陆是如何的贫困,如何落后,回来看一看,才知道大陆的建设很有成绩,大陆上的人很努力、很能干。”他特别提到,“我们这次组团来大陆寻根祭陵,将为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播下种子,我相信,这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

刘璠先生在当年抗日战争中,曾两度在西安举办过抗日军官培训班,他介绍了自己和西安的关系,对陕西的水利建设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西安,以悠久、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闻名于世。对于这些“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黄埔军校同学来说,格外具有吸引力。访问团在西安期间,还游览了秦兵马俑、骊山、碑林、大雁塔等诸多的名胜古迹。这些名胜古迹,深深触发着他们的感叹和深沉的回忆。

对于“黄埔会”的来访,陕西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周益三(四期)、副会长胡摩根及全体人员给予了热情的欢迎和接待。他们特意设陕西风味的“饺子宴”和访问团欢聚。席间,陕西黄埔军校同学会和“黄埔会”交换了礼物,气氛很是热烈。访问团的陕西籍作家张云家先生(十五期)格外兴奋。他即席讲话说:“今天大家吃饺子,我们陕西人有个

规矩,作寿吃饺子,结婚吃饺子,发财吃饺子,聚会吃饺子……今天这个聚会吃饺子很有意义,希望同学们拿出信心,把两岸的同学联系起来,解决好中国的和平统一问题,建设一个和平、幸福、康乐的强大的中国。”

“赞成祖国统一 就是爱国,搞 ‘台独’就是卖国!”

4月8日,访问团一行飞抵北京。

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侯镜如、副会长覃异之、赵子立和先期到达北京的杨荫东以及在京的理事们一大清早,就赶往机场热情地迎接客人。

当晚,黄埔军校同学会设宴招待访问团全体成员,侯镜如会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特别指出:“海峡两岸的黄埔同学共同面临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使命,赞成祖国统一的就是爱国,搞‘台独’和搞‘一中一台’就是卖国,有着爱国、革命的传统传统的黄埔军校同学,应该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爱国统一的旗帜,同两岸的炎黄子孙一道,为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

为欢迎“黄埔会”的到来,黄埔

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李默庵先生(一期)特意从上海赶回了北京。他在讲话中说:“这次‘黄埔会’组织的恭谒黄帝陵、中山陵访问团回大陆来,有着重大的意义。天下黄埔是一家,我到大家感到非常亲切。当年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我们国共两党的黄埔同学的两次合作,扫清了革命道路上的许多障碍。国家要富强,民族要统一,需要我们黄埔同学有始有终,携手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

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理事、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武汉女生队)参加了宴会。他转达了聂帅(原黄埔军校教官)对访问团全体成员的问候,聂帅殷切地希望两岸的黄埔同学能够携手共进,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奋斗。

在热烈的掌声中,邓文仪先生发表了讲话。一年前,他曾以私人的身份来大陆进行了访问。正是他的那一次的访问,对于他回到台湾以后,联合在台的黄埔前期学生袁朴、刘咏尧、刘璠、张炎元、王中柱、张琦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今,他又和黄埔同学的主要人物相逢在北京,十分感慨,他为自己的晚年能够为祖国和平统一再尽一份力量而感到欣慰。

“黄埔会”的先生们在京逗留的短暂时间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瞻仰了毛泽东纪念堂,游览了故宫、雍和宫、亚运村,恭谒了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的纪念堂。

在毛泽东纪念堂,有关管理部门给“黄埔会”以特别的照顾,不限时间地安排他们进行参观。这些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站在毛泽东是遗体前,个个都庄重肃穆地默哀着。他们说,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最杰出的伟人之一,也是世界最杰出的伟人之一,我们对他充满着敬慕。走到后门时,众人在毛泽东的巨幅诗作

手迹面前久久驻足凝视。汪亚夫先生(十七期)竟然默默地背诵了起来。他说:“我非常喜欢毛泽东的诗篇,他的诗,我几乎都能背诵。你看这首,‘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写得多么有气魄!把我们是中华民族写得多么伟大,多么正气凛然!”

客人们兴致盎然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

长城,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历史见证,也是当年国共两党将士浴血抗击日寇的疆土。

81岁的潘光先生(八期)一口气爬上了长城的顶端。他极目眺望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激动地一遍遍擦着泪水。1946年,他作为“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人员,曾经在北平住过一段时间,那时,他也曾登过长城。如今再一次地登上长城,格外感慨。他对记者说:“1946年国共之间的那一次停战协议,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作为一名中华民族的子孙,多少年来一直在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和变化。我虽然住在台湾,但是每时每刻无不在怀念着大陆的亲人。我衷心地盼望着祖国和平统一的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长城,这座中华民族的无字丰碑,触发人们的思考是全方位的,是多层次的。对于军人和曾经是军人的人来说,她更多地启发着使命感和责任感。访问团的马正荣先生(十九期)、黄莫华先生(二十二期)以及黄琰先生(十六期)等人凑到一起,激动地唱起了《长城谣》,心情随歌声飘荡,久久难以平息。

“江泽民总书记 待我们很亲切!”

4月10日,是访问团一行最为兴奋和激动的日子。这天11点钟,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了他们。会见在十分轻松和亲切的气氛中进行。江总书记的谈吐、仪表和风度给访问团全体人员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事后,侯镜如的一席话,说出了参加会见的全体黄埔同学的共同感受,侯老说:“原来我想,江总书记11点会见,11点半钟也就结束了。没想到延续到了12点半钟。这不仅是一种很高的礼遇,而且是殷切的期望。江总书记诚心诚意地希望我们两岸的黄埔同学团结起来,共同为祖国和平统一做出贡献。这是我们应该时刻牢记的。江总书记的会见,说明访问团的这次访问是成功的,是胜利的。我要特别地祝贺大家。”

访问团的人员又是怎样描述江总书记接见的场景呢?汪亚夫先生激动地对记者说:

“江泽民先生待我们非常亲切,非常和气。从始至终,我们没有一点儿的压抑感。他首先让我们一一地做了自我介绍,我报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打趣地说,我叫‘亚夫’,但并不是‘东亚病夫’的意思。江泽民先生马上说,看上去你的身体很好嘛!中国人民再也不是‘东亚病夫’了。这次亚运会,我们国家得的金牌

是最多的嘛!我们要提高全民族的身体健康素质。”

“江泽民先生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在讲话中引用了许多有名的诗句。比如,谈话一开始,他就引用唐诗中的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话一出口,就把我们的思乡盼归之情抓住了。”

“江泽民先生讲了20多分钟的话,说古论今,评说中外,知识很渊博。当他了解到我们是刚刚从西安来到北京时,马上又引用诗句说,‘欲知天下兴亡事,请君一看长安城’。”

“会见中间,张云家同学问,大陆主张统一,为什么不许诺放弃使用武力?江泽民先生说,我非常诚恳地告诉大家,我们所说的武力,绝对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讲的,而是针对某些国际势力讲的。统一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我们不允许外国人进行干涉。有些国际势力,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对于他们的破坏和捣乱,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

会见结束后,访问团全体成员都纷纷议论与江总书记会晤的感受。刘璠先生说,江泽民先生的风范,他那种温文儒雅的亲和力,不仅令我个人钦佩,我们全体团员也是



本文作者与访问团成员在一起

一致地赞美。江泽民先生一再希望我们两岸黄埔同学要精诚团结，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正是我们“黄埔会”成立的宗旨和目标。是两岸人民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一致的希望和心愿。

在4月11日晚举行的既是欢聚又是话别的座谈会上，刘璠先生说：“中国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骨肉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和传统文化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财富，每一个中国人都负有义务去维护它，去发扬它，使它更加坚强伟大，灿烂光华。”他呼吁，海峡两岸的黄埔同学要从自己做起，架起两岸感情的桥梁，共同迈向祖国统一的大道。

访问团的周乐军、张云家等和大陆的同学李运昌、高存信等分别讲了话，表达了支持统一，反对“台独”和“独台”的共同心声。

“祭了中山陵， 我们感到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

恭谒中山陵，是访问团的最后一个重要日程。4月12日，访问团在杨荫东副会长的陪同下，抵达南京。第二天上午，访问团便来到了中山陵。

中山陵位于南京紫金山南坡绿峰之巅，巍峨峻挺，气势恢宏。访问团成员沿着宽敞陡斜的墓道拾级而上，首先，来到了孙中山的墓室，沿遗体像环行一周，一一鞠躬致敬。

在陵堂前，邓文仪、刘璠先生向孙中山先生的塑像敬献了花篮。黄珪先生朗读了祭文。祭文热情地赞扬了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真切地表达了这样的一种心情：“两岸开放，黄埔连心，率团叩祭，泪满胸襟。天道冥冥，大地沉沉，国期统一，众

望归根……”

祭祀已毕，访问团几位成员说：“祭了中山陵，我们感到肩上促进祖国统一的担子更重了！”随后，他们便鱼贯离去。笔者注意到，访问团的温怀磷先生却留了下来，他将自己撰写的一篇祭文烧于陵堂之前。在黄帝陵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做的。他还特意向笔者朗读了他祭黄帝陵的祭文：“海峡岳峙，云水汤汤。血浓于水，民族情长。卅载漫漫，牵念难忘。推诚输信，信为和协之良方。止干戈，岂忍骨肉之相戕？”听来情真意切，令人感叹。

南京，原是国民党政府总统府所在地。访问团参观了总统府旧址。在他们当中，有好几位先生是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夕，甚至是前几小时离开这里的。勿庸讳言，今日他们回到这里，从他们已经习惯了的历史方位抚今追昔，各自自有独特的感受。然而，“往事俱已矣，来者可追”。记者曾经向几位先生问起了他们当年撤离时的具体情景，他们简单地做了介绍，一位先生随后便说：“都已经过去了，还提它做什么呢？向前看吧！”

“向前看”，是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在召唤着有志之士为此奋斗不息。

月是故乡明， 人是故乡亲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访问团的成员多数在40年以来，还没有回到故乡，祭过中山陵之后，他们要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扫墓祭祖，探亲访友。早在北京游览长城的时候，访问团周石麟先生于“万千游客中，闻一姝作湘语，问之果长沙人”，遂“与合影留念”，并即兴赋诗云：“京

张路上水流车，尽道长城气势佳；闻得乡音忙问讯，依家可是住长沙？”

周先生的这种苦苦的恋乡之情，也正是访问团成员们的共同心态。有的比他苦恋还要强烈……

还未曾到分手之际，访问团一位75岁的老人便急不可耐了。他禁不住流露说：“这次，我又要去杭州见我的‘小解放’了。”

“祝贺您，小‘解放’是您什么人？”记者问。

“是我的小儿子啊！1949年出生的，大家都叫他小‘解放’！”老人眉飞色舞地解释说。

“这样说来，他和您的太太没有去台湾？”记者问。

“是的，我离开大陆的时候，他的母亲正在医院生他。我没有来得及向他们告别就走了。他们母子在大陆40多年，没有我的照顾，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说到这里，老人的眼睛湿润了。

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前来迎接客人的小韩告诉记者，这位老人去台后也一直没有成家，前一年，老人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夫妻相见，抱头痛哭。如此两情忠贞，相守初衷，竟然达40年之久，天地有知，也当动情吧！

悲哉！喜哉！有情人终于团聚了。然而，海峡两岸的众多的骨肉之情，结发之情，又什么时候才能都得到团圆呢？

分别的时刻来到了。4月14日，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为访问团一行举行告别宴会。“多情自古伤离别”，宾主举杯，均感分外沉重，情不自禁地哽咽着话别，几位太太首先落下泪来。刘璠团长淌着热泪说：“这个大门已打开，我相信，今后我们的往来一定很多。希望大家携手同心，达到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目的！”

（责任编辑 洛松 元璋）



不做闺秀做战士的 陈学昭

●陈伯良

1991年10月10日，著名女作家陈学昭在杭州逝世，至今将近五周年了。

早在80年代初期，丁玲在《五代同堂，振兴中华》一文中，就把陈学昭列为“五四”前后至大革命期间（1919—1927年）出现的以鲁迅为代表的新一代作家之一。又在《致学昭同志》一文中说：“你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只是你的一个普通读者。你那时大约只有十七八岁，而你的文章却写得那样清丽。你受西欧文学的影响较多，你懂法文，又在法国居住很久，你可以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有学问、有修养的闺秀作家，过上优裕的生活。但你一开始就具有较新的、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所以在我们抗战的艰苦年代，你勇敢地跑到延安来了，并且一直坚持到底……”在这前后，《当代文艺思

潮》（1982年第3期）张维安写的一篇评论中，也把陈学昭和丁玲、萧红、庐隐、冯沅君、冯铿、谢冰心、杨绛等人，称为我国“现代文学和当代妇女文学的桥梁。她们的文学造诣和成就，不愧为当代女作家的先驱者和第一代。”这些评价都是毫不过分的。

确实，陈学昭对我国文学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她的一生，平凡又不平凡。

说平凡，是因为她出身于普通平民百姓家庭，无论在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一直严以律己，勤奋俭朴，正直无私，始终以人民群众的一员自居；她虽没有创建什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勋业，但一生勤奋笔耕，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著作。

然而，她也有不平凡的地方：

她没有进大学文学系，怎样走

上以写作为生的道路？而且在一无官费补助，二无家庭经济支援的情况下，居然能远渡重洋，去法国留学？

她在归国之前，已经得了文学博士学位，也出过好几部书，“功成名就”，却为何甘愿离开已经生活了七年的巴黎，又甘愿舍弃巴黎大学东方语言学院这样理想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到祖国，而且奔赴条件最艰苦的革命根据地延安？

她的一生，历经坎坷曲折，充满着辛酸与不幸：六岁丧父；少年时，母亲瘫痪；步入社会后反动派的追踪敌视、造谣攻击；革命队伍里某些人的诬陷迫害；一次次政治运动的严重冲击；个人婚姻问题上的不幸；晚年多种慢性疾病的同时折磨……但她始终没有被这一切磨难压倒，没有迷失方向和丧失信心，而是经受住了考验，沿着党所指引的道路走过来了。

所有这些，也就是她的高贵品德所在和值得人们尊敬怀念之处。

陈学昭是浙江海宁人。她的祖先是河南潢川逃荒迁到海宁的，与海宁著名的“一门三阁老，五部六尚书”的江南陈家巨族毫无关系。她父亲陈典常，号廉清，是清同治八年的秀才，毕生从事教育，晚年担任海宁州小学堂的学监。四个哥哥中有三个都在当地中学教过课，是典型的“书香门庭”，清苦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她原名陈淑章，童年时，兄长们遵照父亲遗命，让她读了一段时间私塾后，九岁时在当地插班读高小。

“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使她第一次受到民族民主革命的新思潮的教育。海宁是卖国贼陆宗舆的家乡。当时声势浩大的万人国民大会，一浪接一浪的通电声援、游行示威，要求开除卖国贼陆宗舆的县籍，并勒碑遗臭……小小年纪的陈学昭也跟着同学们上街游行，张贴传单，反对卖国条约，抵制日货，反对军阀混战。

在积极向人们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同时，也深刻地教育了她自己。

高小毕业后，她虚报两岁，考入南通女子师范，因为二哥的好友、音乐家刘质平就在那里，各方面好有个照顾。但读完女师需要5年，她和家里人都觉得时间太长，难以负担。于是，一年后她又只身闯到上海，进爱国女学，插班读文科二年级。因为那里只要两年就可毕业。

陈学昭从小爱好文史，家里父兄们留下的丰富藏书，足够她课余阅览。从《史记》、《昭明文选》、《资治通鉴》到《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她都看遍了。长期的勤奋读书，广收博览，不仅打开了她的眼界，也奠定了她早年扎实的语言文学基础。十七岁那年，也就是进爱国女学的第二年，她偶然看到《时报》上登着《征文启事》，题目是《我所希望的新妇女》，便以“学昭”为笔名，写了一篇稿件寄去，意外地被录取为第二名，登在1924年《时报》的元旦增刊上。接着，又经一位女同学的介绍，参加了进步文学团体“浅草社”。从此，便激发了她创作热情，陆续写了不少散文、杂感、评论和诗，发表在《时报》、《京报副刊》、《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新女性》、《语丝》、《文学杂志》、《东方杂志》等报刊上。

因为投稿，也由于爱国女同学张琴秋的介绍，她有幸结识了戈公振、沈泽民、孔德沚、茅盾、瞿秋白、杨之华、章锡琛、周建人和鲁迅等革命前辈和文坛长者，得到他们热情的关怀和教益。他们的爱国进步思想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对刚刚步入社会的陈学昭来说，起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爱国女学毕业后，她先后在安徽省立四中、绍兴女师和北京适存中学、黎明中学教过书，一边从事写作。在北京时，还去北京大学听过李大钊的演讲和鲁迅讲授的《中国小

说史略》。当时正是北洋军阀垂死挣扎的动荡时代，没有多久，她只能辞职回到南方。

那时，她看到有的朋友出国，也想出去长长见识，但眼前连生活都这么艰难，要出国谈何容易！杨之华大姐告诉她，可以去莫斯科学习，只要领个出国护照就行。陈学昭赶拍了两张照片请杨之华代办手续。正巧当天在商务印书馆碰到郑振铎，就高兴地告诉他：“我要到苏联去了！”郑振铎却反问她：“你是学文学的，又不是学政治。学政治到苏联好。”她一想这话不错，当即改变了主意，要回了照片。这样又过了些日子。

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政治形势更加险恶，她的处境也更不安定了，逼得她下定了出走的决心。正好这时她刚拿到《寸草心》和《烟霞伴侣》两本散文集的稿费，就凭着这点资本，毅然登上了去法国的邮船。

在异国他乡，她过着艰苦的穷留学生的生活。在补习法语的同时，进巴黎大学听课，每天只吃两餐，除了面包、开水，别无他物。她因为曾揭露有些官费留学生拿着国家给的钱，整天打麻将、学跳舞，甚至逛妓院，为此触怒了这些人，他们对她造谣攻击，散发传单，扬言要打她，又把她说成是共产党员，连法国有些学校都拒绝她入学。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经济上十分困难。

这时，一向把陈学昭当作小妹妹看待的戈公振正好来到法国，知道了这情况，就主动推荐她担任天津《大公报》的驻欧特派记者，定期给报纸写些通讯报道和散文，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以后，还担任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特约撰稿人。就这样，她边写作边学习，在法国生活了七年多时间。其间，还多次利用余假时间，跑遍塞纳河畔的旧书店，为鲁迅先生搜集一些有版画插图的书藉寄去。她在国内出

版了散文集《如梦》，《忆巴黎》，小说《南风的梦》、杂文集《败絮集》等十多部书籍。到1934年，她终于在法国克莱蒙大学毕业，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1935年，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兴起。她决定离开法国回到祖国怀抱。临行前，有些师长再三劝他留在法国，帮助东方语言学院院长格拉奈教授工作，但是，祖国母亲的召唤，使她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于1935年2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她一到上海，鲁迅先生就告诉她：“现在形势很复杂，你慢慢地就能体会到了！”她在上海、无锡、南昌等地过了一段很不安定的生活。她听人谈起过红军北上抗日的长征，谈到革命根据地延安，那里还有她在爱国女学时的同学好友张琴秋。她也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萌发了到延安去的思想。她千方百计地找熟人，和驻武汉、重庆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联系，最后得到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意。1938年6月从重庆出发，历经旅途艰险，终于在8月6日到达她向往已久的延安。

在延安，她先后参观访问了文化界救亡协会、抗敌后援会、鲁艺、抗大、抗大女生大队、边区妇联，以及边区民政厅、财政厅等单位；还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朱德同志在和陈学昭谈话后，拿了一本小册子要她题字，陈学昭就写了“抗日民族英雄朱总司令万岁！”她用朴素的语言，充分表达了对中国革命和革命领导人崇敬之心。

在延安，她在深入观察、体验生活的同时，参加了一系列的纪念大会、群众大会、报告会和文艺晚会。这里的一切都使她受到鼓舞，感到朝气蓬勃，充满了希望。她白天四处奔走，晚上就把自己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写成一篇篇通讯，寄给重庆黄炎培、孙起孟主办的《国讯》

周刊连续刊载。她用诚挚的心意，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中国人民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延安。由于这些通讯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造谣，只连载了几期就被勒令查禁。幸亏在她的一个朋友处还保存一份底稿，直到1940年才辗转得以在香港出版，这就是那本著名的《延安访问记》（日译本作《陕北访问记》）。

她在延安参观访问和体验生活，一去就是一年多。回到重庆，形势已愈来愈严峻，特务又到处追踪。在这抗战最紧要的时刻，她怀着刚刚丧失爱子之痛，说服丈夫，于1940年夏天再度奔赴延安，并决心从此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宏伟的革命事业。她当时兴奋地说：“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寻找慈母的保护与扶持，投入了边区的胸怀。”

参加革命后，她先后担任过《解放日报》四版编辑和中央党校四部的文化教员，参加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她曾经想写“五四”时代的中国女性怎样走向革命的艰难历程，但写了几次看看不满意，自己把稿纸撕毁了。周恩来知道了这情况，就鼓励她：“写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经历也可以嘛！”一句话使她坚定了信心。从此，无论是在天寒地冻的农村、用被褥摺成的“桌椅”上；或是在延安撤退时行军的间隙中，她都克服种种困难不停地写作，终于写成了那本著名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上集）。以后，又两度奉命长途跋涉，穿过敌垒，奔赴东北解放军。不分日夜的急行军，使她患了严重的血崩，但她在这段时间里还是完成了小说集《新柜中缘》和散文集《漫走解放区》。在东北，她还担任《东北日报》四版主编，并编过一个刊物。

1949年浙江解放后，陈学昭南下回到故乡。担任浙江大学党支部书记兼中文系教授。之后，又相继去家乡海宁农村参加土改，去杭州龙井茶区深入体验生活，先后创作了



1987年陈学昭在工作室

中篇小说《土地》和长篇小说《春茶》，出版了诗集《纪念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她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等社会职务，并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作了不少宝贵的贡献。

正当她在奋发写作的盛年，在祖国大地卷起了一场“反右”的风暴。

1957年春天，陈学昭奉命“鸣”“放”。她在全国作协一位领导的盛情邀请下，在一次鸣放会上，即席讲了几句，其中谈到省委领导“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她也曾写过一篇五百多字的短文《大放声中一小鸣》，文中说有的地方干部要捆绑下乡演出的艺人是不对的，“呼吁把文艺工作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去，给文艺工作者以应有的对待，让文艺园地里百花齐放！”却不料这一句话和一篇短文换来了一顶“大右派”的帽子。一个忠心耿耿追随党二十多年、正直的老党员就这样不容分说地被推出了党的大门。而且还凭空诬陷她是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出身”、“老反革命”、“高岗、饶漱石集团的人”……

从此，她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

也断绝了生活来源。因为她一直不拿国家工资，只靠写作得来的稿费生活。这时，连刚出版的小说《春茶》也在市上绝迹了，而处分书上却宣布，今后“生活靠写作自给”，真不知如何自圆其说。

她的高血压症“升级”，全身发肿，而公费医疗被取消了，粮食定量改为20斤。房东怕她付不出房租，要把房子收回。这时她家中只剩她和女儿两人，女儿被调到农村，而陈学昭自己，则被分配到绍兴，在一个文化馆里搞些杂差，不久又到离城三十里的乡下养猪。1960年，陈学昭回到杭州养病。次年除夕，被通知摘了“右派”帽子，在杭州大学图书馆劳动。但“摘帽右派”的日子也不好过，“文革”一来，她又成了一些打手们批斗的对象。

1966年《十六条》发布前后，一天中午，所谓的几个“造反派”，突然闯进陈学昭房间在她的臂上绑上“右派分子”的布条，押着她在学校内外游行“示众”，屋内橱等全部被贴上封条。有的人拿起利剪要剪她的头发、夺她戴的手表。一个“造反派”头头当场勒令陈学昭把厨房兼作吃饭间内的东西立即搬去，霸占

了这间屋子，还拎起她烧饭用的煤球炉扔到马路上，当场摔个粉碎。并在房门外贴了大字报，强迫她每晚十时半后清扫公共厕所。紧接着是一次次的“抄家”，把她三间房子里的书全部抄去；有的“造反派”故意将她的心爱的一些外文名著、珍贵版本当面烧给她看，甚至连放在抽屉里的一点日用现款也被“没收”了。

从这开始，每天早上四点半，她要去大院子里拔草，白天要去打扫街道，或被唤去“学习”批斗，直到晚上十点半后，还要去打扫公共厕所。每个晚上至多也只能睡四个钟头。

这时，陈学昭已年过花甲，患着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但对她的批斗并未停止，甚至遭到起哄打骂。把她手里的拐杖夺走，迫使她猛然跪倒在地，待到批斗完毕，一下竟站不起来了。有一次，还强迫她站到放在一张狭桌子上的条凳上去，她连桌子也爬不上去，何况还要站到条凳上，下面有的人就起哄咒骂，后脑被“红卫兵”从背后丢来的石块打起一个肿块。有时走在路上，也有人向她丢石块，还一次再次反扭她的左臂脱臼，连生活也十分艰难。但她从来没有对党失去信心。有一次，一个“造反派”头头为了要陈学昭讲出周恩来总理的一些情况，大声怒吼，猛拍桌子，几次用拳头猛击她的脑袋，逼迫她：“你不讲就不给回去”，但她的回答总是那句话：“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不能造谣诬陷。”

在十年浩劫中，她不止一次地看到自己熟悉的友人、正直忠贞的共产党员被诬陷迫害致死，但她对党没有失去信心，她坚信，这样的日

子终究会过去的。周围也有不少好人在暗地里照顾她、帮助她。正如她自己也曾多次鼓励别人的：“要活下去，要活下去！”她想起白居易在《放言》五首中的那几句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就这样，她带着多病之躯，终于坚持下来，迎来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日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得陈学昭得到彻底平反昭雪，继续在文学园地里努力耕耘。

这时，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由于早年不幸的婚姻（年轻时和一个同时留法学医的人结了婚，去延安不久，两人就离婚了），她身边只有一个长期和她一道共患难的女儿。几十年的劳累加上无辜的受罪，心绞痛、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肠炎、坐骨神经痛……各种老年慢性病都集中在她身上，但她仍以惊人的顽强和毅力，分秒必争地作着最后的冲刺。因为病，她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只能按照医生规定，每餐吃极少一点配置的普通食物，更谈不上娱乐享受。她感到自己有生之年生活的第一要事就是不停地伏案写作。她多次表示：“学习着是美丽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在这种信念支持下，从1978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她先后创作和整理出版了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续集），文学回忆录《天涯归客》、《浮沉杂忆》、《如水流年》，散文集《难忘的年月》、《心声散曲》、《心声寄语》和《野花与蔓草》、《蔓草拾零》、《海天寸心》，翻译了法国童话集《噍啲及其他故事》与《戴高乐回忆录》（与人合译），再版了《工作着是美丽的》和《春茶》，还有散见各种报刊、

有待结集的文章。这对一个七十多岁的多病的老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工作负荷，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在八十年代后期，她的行动已经困难了，但还是由她女儿亚男陪着，抱病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学习和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经常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老战友、海内外的来访者和许多文学报刊的组稿人员，亲自处理大量来信。到后来连在室内走动也步履不稳了。有一次为了去拾一张飘落在地上的稿纸，竟跌倒在地上，久久爬不起来。正如她辞世前最后一篇短文《可贵的痕迹》中所说的，对她来说，这种种困难“已经成了习惯，已无所谓难过、痛苦”而坦然处之。她临终前最后的一句话，也即唯一的憾恨是“还有许多事情，都来不及做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念念不忘地惦记着要再赶译一些东西，和进一步充实《浮沉杂忆》这些未完成的心愿。

陈学昭逝世近五周年了，但她对革命的忠诚，坚定不移的热爱祖国思想，和身处逆境始终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留下的二百多万字的著作，是对我国现代文学事业的一项可贵的贡献。值得人们高兴的是，包括她毕生主要著作在内的《陈学昭文集》已经整理完毕，即将和广大读者见面。让我们从她的著作中再一次重温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和追寻她毕生所经历的坎坷曲折的道路吧！

（作者系陈学昭之侄、离休干部，现为海宁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责任编辑 林 跃）



新派武侠小说 一代宗师 金庸

○陈忠祥

金庸，原名查良镛，因写武侠小说，他将自己名字的最后字一拆为二，用“金庸”作笔名。

海外一位文学评论家说：“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金庸堪称是中国当代拥有读者较多的一位小说家。

一、“喔喔啼”始龙山

1924年2月，金庸出生于浙江省海宁袁花镇新伟村赫山房。赫山房共有面积4400平方米，四周高围墙。查氏赫山房藏书甚多，在浙北一带颇有名气。金庸一生下来，刚学会走路，就在书堆里打滚。当年金庸的祖父文清公因“丹阳教案”辞官回家，闲着读书做诗自娱。同时，他着手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900卷之多。这些雕版整整放了两间房子。金庸四五岁时，时常与兄长在这些雕版中捉迷藏，摆家家。日子一久，在兄长们的指点下，金庸竟也认识了一些字，拿着雕版也能稚声稚气朗读几首诗词了。

六七岁时，金庸在巷里读十七学堂（初小），天下雨时由他后母顾秀英背着去。去学校读书，对于金庸来说，是最开心的事了。晴天，则由顾秀英领着他们上学，中饭也由她给送去。

在巷里读完了四年级，金庸就转到龙山学堂读书了。其时，金庸的伯父是龙山小学的校长，后来当了医学教授。金庸虽然出身于大户人家，但他不娇，小时候从不乱花零用钱，中饭还是由顾秀英送到龙山。

在龙山学堂读书时，金庸的学习成绩样样名列前茅。无论是语文、算术，还是其他功课。相比起来，金

庸最喜欢的是语文，做文章。小时候，金庸的创造力就很强，在龙山学堂时，他提议在学校里办一个壁报，题目叫“喔喔啼”，由他任主编，一共出了10多期，吸引了众多的学生。看过一期期内容丰富的壁报，老师们也无不称赞，一位老师大为感叹：今日稚凤喔喔啼，明朝前程不可限量。

课余时间，金庸最喜欢看书。他曾这样回忆道：“家中藏书很多，我幼时虽看不懂，但找书却方便，而且不单有古书，也有新书，因为我伯父、父亲、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生。我自小与书为伍，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家里房产亦丰，生活不愁，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下来多是下棋看书……”

小学时代，金庸几乎翻遍了父辈的藏书，就连大人看的报纸也不放过。其中使金庸得益最多的是邹韬奋所著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以及他主编的《生活周报》，这些书籍报刊，使少年金庸耳目一新，接受增长了许多现代知识。

不过，在众多的书籍报刊中，金庸最感兴趣的是武侠小说。一天，金庸在家庭藏书中无意中看到了一本顾明道著的武侠小说《荒江女侠》。一下子，书中方玉琴、岳剑这对“琴剑二侠”的故事牢牢地抓住了他的心。接连几天，课余时间，金庸都捧着《荒江女侠》，看得如醉似痴，废寝忘食。等到把书看完，金庸连连赞叹道：“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从此以后，金庸迷上了武侠小说。凡是找得到的，他都搜罗来看。小学时代，金庸看过数十本武侠小说，如《江湖奇侠传》、《红玫瑰》、《三侠五义》、《水浒传》、《小五义》、《彭公案》、《近代侠义英雄传》等。少年金庸爱看武侠小说，因为武侠小说除暴安良，伸张正义，故事

性强，好看。当时，他做梦也没想过自己要写武侠小说。

1937年夏天，金庸从袁花龙山学堂毕业了。家乡母校的启蒙教育使他终生难忘。1992年12月回大陆拜访母校，金庸毕恭毕敬地写下了：“重游母校深感当年教诲恩德”肺腑之言。

二、牛刀小试浙南

小学毕业后，金庸考入了浙江省立嘉兴中学。从袁花来到嘉兴，一切都使金庸感到新鲜。特别是学校图书馆中浩瀚的图书，象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他。课余，一有空他就埋头于图书馆的书堆中，吸收着新的知识养分。

一晃，金庸已经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了。那些天，金庸整天忙于复习功课，准备报考高中。一日，金庸与两位同学在教室里做完练习作业，闲聊起来。谈着，谈着，金庸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对两位同学说：

“初中考高中，那么多同学埋头复习功课，太辛苦了，要是有一本指导考试的书就好了。考高中的辅导书我们没有资力编，但是我们有小学考初中的经验。何不编一本指导小学生考初中的书呢？这样好让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复习功课少走一点弯路，找到一条门径。”

“好，编一本教小学生如何复习功课的书，这个主意好！”两位同学被金庸新奇的想法所鼓舞，表示支持。

说干就干。他们三人当即分了工，书由金庸主编，每人编写一部分。于是他们三人分头行动，各自埋头编写起来。很快，书编出来了，内容是指导小学生如何在升学考试中应答问题，争取好成绩。

书稿编定后，金庸给她起了一个书名，叫做《给投考初中者》。接着，15岁的金庸又自行印刷发行。

牛刀小试，锋芒无比。《给投考初中者》出版后，在浙南一炮打响，十分畅销，同时它还深受福建、江西等省小学生的欢迎。

《给投考初中者》是金庸生平出版的第一本书，作为出版家的经营天赋于此也初见端倪。它亦使金庸得到了一笔丰厚的利润。

金庸进入浙江省立嘉兴中学，一年后抗战爆发。尔后，他与数百名同学一起跟随校长张印通流亡到余杭、临安、于潜、丽水等地。到丽水后，学校改为中国战地青年服务团浙江分团，团长由省长黄绍竑兼任。金庸等二百余名学生编入三大队九中队，这段时间金庸和他的同学们吃粗粮，穿草鞋，受军训，流动颠簸，生活十分艰苦。金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读完了初中，正是这艰苦的环境，困难的生活磨练了他，练就了他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性格。

后来，金庸考入了浙江省联合高中。在班上，金庸的成绩出类拔萃，无论是数理化，还是国文、英语，每学期成绩都是第一名。

其时，浙江省联合高中在学校图书馆的走廊上办有一个壁报，可供同学们发表文章。对于壁报，金庸情有独钟，早在小学时就主编过“喔喔啼”壁报。因此他时常在壁报上登载文章，他的文学创作才能这时候就显露出来了。

一天，金庸给壁报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引起了同学们争相观看。他在文中描述了一位名叫阿丽丝小姐从西方到东方世界游玩，一日到一家学校校园，忽见一条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恶狠狠地教训学生说：“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我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无孔不入，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时而到操场，时而到饭堂，学生们见了逃避三舍……

同学们无不拍手称快，大家都知道金庸笔下的眼镜蛇就是学校的训育主任。因为他平时戴眼镜，讲话时常夹着“如果”口头语，所有同学们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如果”。这位“如果”主任不近情理，动不动就板着脸孔训人，学生十分讨厌他，但敢怒不敢言。今天金庸写文章讥讽他，当然大快人心。同学们十分钦佩金庸敢于反抗强权的精神和写作的才华。

结果，《阿丽丝漫游记》大大地惹怒了这位训育主任，他大动肝火，逼迫校方几天后宣布开除了金庸。

三、外交官梦破灭

抗战后期，金庸考取了国民党当时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金庸为什么要考这所大学呢？因为金庸的理想抱负是将来要当一名外交官。外交官这个职务在金庸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祖父查文清的经历和品行，在金庸的心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外国人欺侮中国人的屈辱深深地刺痛了他。祖父时期，外国人仅仅在中国开设教堂欺压老百姓，而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他立志日后当一个外交官，为维护祖国的尊严而工作。

能够如愿以偿地就读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金庸心花怒放，给他带来了无限美好的憧憬：毕业后被派往国外，进而成为外交使节……所以一踏进大学校门，金庸就决心学好知识，日后为祖国效劳。由于他学习认真刻苦，再加上天资聪明，一年级读完，学习总成绩是全校第一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尽管在学校金庸坚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原则，不参加学生中

任何派系斗争。但毕竟金庸是一个有血有肉、正直、富有同情心的年轻人。

一天,学校中的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与其他学生发生冲突,他们大打出手,十分野蛮地将几名学生揪到学校操场的舞台上毒打,说他们是共产党。这时,在一旁观看的金庸实在看不下去了,也许是小时武侠小说看得多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他的心中生了根,他忘记了自己的原则,十分愤怒地向校方投诉了此事,责问学校为什么不严加管教这些职业学生的恶劣行为,接着又与训育长展开激烈的争辩,义正辞严,弄得训育长下不了台。

谁料到,金庸这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却断送了自己的“外交官之路”——校方勒令金庸退学。

抗战胜利,金庸回到家乡。不久,就到杭州《东南日报》当外勤记者。然而,此时的金庸,人虽然在报社当记者,心里还在做着“外交官之梦”。不到一年时间,金庸便辞去了《东南日报》的工作,经堂兄上海市法院院长查良鉴的介绍,插入上海东吴法学院进修“国际法”,试图重圆被现实无情中断了的“外交官之梦”。

但残酷的社会现实还是出示了红灯。1946年国民党政局混乱,上海的大学纷纷转移,学业难于保障,金庸的“外交官之梦”又一次成为泡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金庸心中又萌生了当外交官的念头。经中国国际法权威人士、东京战犯法庭首席大法官梅汝璈之邀,1950年,金庸离开香港,兴匆匆来到北京,决定到外交部任梅汝璈助手。见过梅汝璈后,金庸便去外交部拜访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长乔冠华。

乔冠华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任社长,是金庸意气相投的熟人。两人见过面,乔冠华对金庸愿意到外交部工作表示欢迎,然而他直率地告诉金庸:“眼下,外交部确实需要人才,但是象你这样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会被吸纳。”

乔冠华的话,犹如一盆冷水,彻底地浇灭了金庸的“外交官之梦”。金庸很快地回到了香港。

要是当年金庸北上进外交部工作成功,也许中国多了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但中国也就少了一位誉满中外的文学大师。这是题外话。

四、金庸“书剑恩仇”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招聘3名电讯翻译。报考者要有大学毕业文凭,而金庸没有文凭,只好借他大哥查良鏊的北京章太炎文学院的毕业证书充数。结果在300名考生中获得第一名,从而被录取。

1948年春天,金庸被《大公报》派到《大公报》香港版做国际电讯翻译。此后,金庸曾赴北京外交部求职未果,仍回香港《大公报》,后去《新晚报》编副刊。在《新晚报》,金庸结交了另一位后来亦成为新派武侠小说家的梁羽生。那时,他俩有着共同的爱好:一是下棋,二是爱看武侠小说。

1953年,《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受澳门投掷比武观众轰动的启发,他感觉到,失落了历史感心态极不平衡的港人,需要武侠小说来刺激消闲,以满足人们的“好斗”心理。因此,在比武的第二天,《新晚报》便刊出要刊登武侠小说的预告。再次日,《新晚报》果然发表了《龙虎斗京华》连载。作者是金庸的同事梁羽生,开新派武侠小说风气之先。

1955年,《香港商报》急需武侠小说连载,罗孚向他们推荐了金庸。金庸没有怯阵,一是自信自己的国文功底和写作经验,二是梁羽生的一鸣惊人坚定了他的信心。

信心归信心,但真正铺开了稿纸要动笔的时候,金庸心中又没有底了,究竟写点啥?小说中该有哪些人物呢?思来想去,金庸突然想起了家乡关于乾隆是陈阁老儿子的传说。相传在康熙年间,因皇子雍正的妻子和大学士陈元龙的妻子在同一天生了孩子,前者生了一个女儿,后者生的是儿子。雍正为了皇室有后,便设了偷龙换凤之计,用自家的女儿调换了陈家的儿子。

民间传说,真假难辨。但它却使金庸茅塞顿开,信笔在稿纸上写下了“书剑恩仇录”五个字。于是,便一路潇潇洒洒地写了下去。

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设计了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乾隆,一个是陈家洛。乾隆是当朝皇帝,而陈家洛则是替天行道,与朝廷为敌的红花会的总舵主,巧就巧在他们偏偏是同胞手足。

同胞手足却是冤家对头,矛盾交错,亲情民恨,演绎了一段精彩的历史故事,表现了一个复杂的感情世界,展示了一方博大的武侠天地,令读者爱不释手。一时间,《香港商报》因《书剑恩仇录》而变得“洛阳纸贵”。

《书剑恩仇录》规模庞大,想象丰富,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明,再加上民族大义、哲理情思,充分显示了金庸深厚的文学功底。

从写《书剑恩仇录》开始,金庸写武侠小说一天也没有停过。第二部是《碧血剑》,第三部是《雪山飞狐》,第四部是《射雕英雄传》。

至1972年,连载完《鹿鼎记》,金庸宣布封笔。18年时间写了15部武侠小说。有趣的是,金庸把除《越女剑》外的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做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五、林欢“有女怀春”

金庸的真名叫查良镛，大家都知道。但是说“林欢”也是查良镛的笔名，知晓的人恐怕不会很多了。

“林欢”确实确实是金庸的另一个笔名，论资格，他还是金庸的“老大”。

50年代初，金庸特别喜欢看电影，几乎是每天一部。看完电影后，常以林欢笔名为《新晚报》的“下午茶座”写影评。

文章颇吸引读者。

在写影评的同时，金庸还尝试着写电影剧本。《兰花花》、《绝代佳人》，就是那个时期的作品，其中《绝代佳人》由“长城”电影公司拍成电影，李萍倩导演，夏梦主演。初涉影坛，即获成功，《绝代佳人》被评为中国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金庸亦获得了一枚编剧金质奖章。

不知是厌倦了报社的工作，还是兴趣的转移。1957年，金庸离开了《大公报》社，进入长城电影公司当编导。尽管那段时间，金庸的主要精力放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上，《雪山飞狐》就是这时的作品，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还是挤时间写了五六部电影剧本，如《不要离开我》、《山峦》、《小鸽的姑娘》、《午夜琴声》、《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等。

编导编导，就是既要编剧本，又要导电影。1958年，金庸与程步高联合导演了《有女怀春》，女主角是陈思思，男主角是傅奇，1959年又和胡小峰合导了由夏梦、李端主演的《王老虎抢亲》。

林欢“有女怀春”。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因为种种原因，金庸离开了长城电影公司。短暂的从影经历，未能使金庸在电影界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林欢”的电影还是给中国的观众留下了一定的影响。比如《王老虎抢亲》在国内就深受观众的喜爱。1981年，金庸带着女儿回大陆访问，上海电视台突然播放了电影《王老虎抢亲》，金庸很吃惊。他做梦也未想到，时间都过去了二十多年，上海电视台还会播映《王老虎抢亲》，她还会有观众。

六、八万元办《明报》

1959年5月20日，是金庸一生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天，他出资8万港元，同学沈宝新出2万港元，两人共同投资10万港元，合伙创办了一份四开小报《明报》。

《明报》的创刊，奠定了金庸的事业方向。这一年，金庸39岁。在《明报》的“发刊词”中，金庸表明了自

己办报的立场：维护“公平与善良”。

办报伊始，社址选在港岛中环。编辑部人员只有四个：总编辑金庸，发行沈宝新，编辑何达、潘粤生。

万事开头难。新生的《明报》要在报刊如林的香港立足生存，实在不容易。论新闻，《明报》不可能象已有的几份日报那样快捷；论招徕读者，《明报》不愿象有些报纸那样以色情勾引。

面对自己的不足，金庸决计用自己的武侠小说和社评来吸引读者。从《明报》创刊的那日起，就开始连载金庸的《神雕侠侣》。

那时的金庸真象是一个“拼命三郎”。《神雕侠侣》每日一篇2000字是必写的，二三天一篇社评也是必写的。还有许许多多报纸的杂务必须他亲自过问。在最困难的时候，报社只剩下了他和沈宝新两个人。金庸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然后从港岛中环乘船渡海，回到尖沙咀家。

有不少报界同行预言，出不了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倒闭。然而，金庸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毅力，凭着自己手中的这支如椽巨笔，依靠“事实不能歪曲，意见大可自由”的办报原则，硬是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使《明报》发展成为香港畅销的三大报纸之一。

1965年底，金庸在《明报》的基础上，又创办了《明报月刊》。这份刊物，从经济上来说并没有给带来利润，但在金庸看来，办《明报月刊》，就是构筑一堵墙，用以“保藏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珍爱的东西”，意义深长，即使亏本也值得办。其时大陆“文革”开始，民族文化正遭到大肆破坏，因此杂志一出版，就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和重视。

在《明报月刊》以后，金庸又相继创办了《明报周刊》和《明报晚报》，接着又开办了书籍出版部。至此，金庸已成为香港二报二刊的报业巨子和出版业大亨了。主持这样一个大企业，金庸仍坚持自己每天亲自看大样，写社评，常常和职员一起熬夜到深夜。他写社评，按照自己提出的“事实不能歪曲，意见大可自由”独特的思想原则，有许多观点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如支持马寅初的“人口论”，反对“大跃进”，反对“文革”，称赞支持邓小平……

独树一帜的《明报》，给了金庸独树一帜的收益。1991年，香港《资本》杂志评出198位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拥有12亿资产的金庸名列第64位。以文致富，金庸乃中国历史第一人。

但是，就在《明报》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金庸却于1989年5月在庆祝《明报》创刊30周年的茶会上宣布，自己不再担任《明报》社长职务。1991年3月，金庸又把《明报》推向市场，挂牌上市。

消息传出，十多个财团上门要求购买《明报》。经过一个个郑重研究，金庸竟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出价较低的

智才公司，选择了30多岁的于品海接掌《明报》大业。

对此人们不理解。金庸说，第一，我不想卖给外国公司；第二，我不希望收购《明报》的机构纯粹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奉献精神与责任感。于品海先生有经营管理才能，同时对新闻事业具有热诚，是难得的理想人才。尽管他出的价较低，但我乐意他当《明报》新的掌门人。

金庸于权力和名利十分淡泊。这次转让股权，实际上并没有套现多少钱，但控制权却出让了。对此，金庸很开通：“不能只看一两年的短期利益。对《明报》有利，也就是对我自己有利。《明报》有了可靠的接班人就是最大的利，我个人再要更多的钱做什么？”

七、十余次回大陆

金庸自1948年受《大公报》调派去香港至今，大约十余次回大陆。但前三次都是行色匆匆：第一次，1950年北上求职；第二次，1953年去杭州、上海；第三次，1962年，到过广州、佛山、新会、深圳等地。

此后，由于政治体制的关系，金庸一直没有机会了却回大陆（家乡）走走看看的夙愿。八十年代初，中国有关部门向金庸发出了回大陆访问的邀请。金庸内心十分激动。

1981年7月16日，金庸携妻带子踏上了回大陆访问的征程。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金庸。握着金庸的手，邓小平满面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

金庸一脸诚挚：“感谢你们的邀请。对你我一直很仰慕，今天得以相见，深感荣幸。”

“查先生，我也知名已久。”邓小平说。

见面礼后，邓小平与金庸家人一起合了影。随即，两人便谈起了政治。一个是著名政治家，一个是著名社评家，虽然是初次见面，但由于两个神交已久，尽管政见不尽相同，但许多方面观点十分相似。一个多小时的交谈始终很热烈，时不时地还碰撞出点滴“火花”。

会见即将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十分风趣地对金庸说，你现在坐的这把椅子是当年日本大平首相坐过的。金庸听后内心颇激动，站起来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受到祖国如此隆重的接待，实在担当不起。”

1984年10月16日，金庸再次应邀赴京访问。10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他，并亲切地与金庸交谈了一个半小时。

1985年7月1日，金庸又一次来到北京，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身份参加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7月4日，金庸在全体会议上作了《一国两制与自由人权》长篇发言，博得了委员们热烈的掌声。雷洁琼更是拉着金庸的手，连声称赞道：“你的发言好极了！”

1992年12月，金庸终于回到了阔别40年的故乡。3日中午，金庸在海宁宾馆会客室门口迎候文坛耆宿、当年省立嘉兴中学的老师章克标。见到93高龄的章老，金庸深深地一个鞠躬，并亲热地与他握手。

“章先生，分别50多年了，今天才来看您……”金庸一边说着一边搀着章老就座。接着两人便聊起了旧事，金庸回忆说：“先生当年在嘉中教我们一年级数学。记得某日夜里自修，一位同学故意问老师English（英格里西）一词的读音，而老师您却风趣地回答：‘阴格里西’，引起哄堂大笑。”

回忆，使金庸回到了青年学生时代。他思想活跃，谈兴颇浓。章克标先生与金庸一起沉湎在往事之中，心情非常愉快。

中饭后，金庸在海宁市委书记沈雪康、代市长钱满程的陪同下，踏着硖石西山的石级拾级而上，来到诗人徐志摩的墓前，与妻子一起向诗人默哀，然后献花，鞠躬。他对海宁领导说，徐志摩是他的表亲，中国近代著名的诗人，早就想来凭吊，但一直没有机会，今天终于了却了心愿。

谒过徐志摩墓，金庸又驱车赶到母校——当年的袁花龙山学堂，今日的袁花镇中心学校。在那里，为学校题了词，同时向学校捐了款。

199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了金庸。江泽民对金庸说：“你的小说在内地有很多读者，许多领导人也很爱看。我没有仔细读过，但翻阅过，知道你的小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

1994年4月3日，金庸出席了由他捐资300万元港币兴建的嘉兴市金庸图书馆落成典礼。在落成典礼上，金庸被嘉兴市人民政府授予“荣誉市民”，并被聘请为嘉兴市人民政府高级顾问。参观金庸图书馆后，金庸挥毫题词：“感我桑梓，锡以嘉名，愿尽菲薄，助振斯文。”

此后，金庸在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的陪同下，又一次回到了家乡海宁，参观了设施一流的海宁市高级中学。面对一代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耳闻万马奔腾的钱江大潮，金庸感慨万千，欣然命笔，为海宁高级中学题词：“行见人才如潮自此涌出”。

（责任编辑 王 章）



开明书店与文化人的情结

●王汉华

1934年，我刚14岁就进了开明书店。那时我小学才毕业，就到书店当临时工，在我的父亲王伯祥先生指导下，为影印《二十五史》剪书。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夏丏尊先生的女儿夏满子，叶圣陶先生的女儿叶至美，宋云彬先生的女儿宋蕴庄，我的姐姐王清华。这项工作结束后，我和姐姐又留下来，当了初校《二十五史补编》的校对。“八·一三”战事发生，我暂时离开了开明。1940年我进了开明昆明分店，后来经上海辗转到了北京，直到解放后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我被分配到中图。这一段期间，我先后在开明工作了14年。

开明是一个卖书的书店，但又不仅仅是一个书店，编辑、出版是它的重要工作。文化氛围浓厚，善于团结大批文化人，是开明书店办店的一大特色，所以很多文化人都把开明书店看成是自己的家。在抗战时期，开明要办一份《国文月刊》，当

时的总管理处设在桂林，而文化人却集中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于是，便责成昆明分店的人去与他们商谈联络。他们中有余冠英、朱自清、罗常培、浦江清、冯友兰、沈从文等著名教授。每次请他们来开会、约稿，他们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国文月刊》办得很有特色，很有水平。

当时的开明书店在昆明的闹市开了一间双开间的店面。楼上有两间小屋，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宿舍。上楼要走很陡直的楼梯，这些教授们每次来书店送稿、取书，都要从郊区赶来，并爬上这楼梯，在我们书店休息，他们与我们的感情很深，亲如一家，这种情谊一直保持了很久很久。

西南联大数学教授刘薰宇先生是开明中学数学课本和开明青年丛书《马先生谈算学》的作者人，抗战时期他从贵阳到昆明来执教，当时家属没有随行而来，他一个人不好在昆明租房子，开明书店的创办人

之一章雪珊先生那时也在昆明，就邀他来分店男宿舍借住，晚上还在书店搭伙。当时开明出售的书籍主要是在上海孤岛印的，运往内地的书要通过香港转到昆明，再由昆明分包转运到大后方的各个分店。寄往香港的邮包每包的重量规定是4磅，而发往内地的重量限定是2公斤。为了节约邮资，邮包到昆明后要增加重量重新包装。因此我们每天都要加夜班，刘先生身为教授，亦来参加我们的这项包装工作。我们看他白天讲了一天课很累，劝他去休息，他说开明的事就是我家的事，是我应该做的，我不会打包，但我可以拆包。有时打包过深夜，书店就请大家到隔壁小店吃一碗豆花米线，刘先生很高兴和我们一起去，他还带一瓶香花酒请大家喝，说这样可以消除疲劳。

巴金先生曾两度来昆明，第一次是从上海路过昆明到重庆，第二次是因他受不了重庆的轰炸与炎热，从重庆来昆明暂住。他想让我们帮他在昆明找一间房子，可以安心写作。那时，开明有一处库房，虽然偏僻但很幽静，我们为他开了一间库房，放置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他就很满意地住了下来，就在这间他称为“玻璃房子”的小屋子里，他完成了长篇小说《火》的第一部。巴金先生的未婚妻陈蕴珍在西南联大读书，常来看他。那时昆明也时常要逃警报，有时碰到陈就一起逃警报。昆明城里没有防空洞，要逃往城外，越走越远越安全，所以警报一响，我们就马上通知他撤离，他把稿子装在一个藤箱里，由开明的一个年轻人帮他拎着。他觉得不好意思，就有时帮我们拎起账簿包，有时帮我们抱起孩子，这种在战争年代留下的患难之交，是终身难忘的。后来他在香港出版的书中回忆了这段经历。

沈从文先生因两个孩子尚小，为躲警报，把家安在了郊区呈贡，有

时假日带着孩子进城买东西，总要到开明来歇脚，然后坐火车回家。抗战时期物价飞涨，有时买了东西就连回程的火车票钱也不够了，只好在开明书店借上三两块钱。几十年后，到了北京，沈先生给我写了一条很长的条幅，专门记述了当年的这段经历。

故宫博物院青铜器专家唐兰先生，抗战时期也在西南联大教书，也为躲空袭在郊区租了一间农民的小屋独住，他每次进城就到开明书店来喝茶休息，我们逃警报就躲到他的小屋里去，你来我往，不分彼此。

冯友兰先生抗战胜利后要回北京，苦于筹不足路费，只好出售衣物。他来与我们商量，想在开明书店的门口设一个地摊，我们欣然同意，并从店里给他搬出了一张桌子和一块床板。冯师母亲自看摊叫卖，开明人也轮流出来为她帮忙，冯先生一家为此十分感激，也给中国的文坛留下了一段令人心酸的回忆。

朱自清先生也是开明书店的常客，他经常步行进城讲课，有一年冬天，昆明下起了大雪，朱先生买不起



开明书店创建70周年纪念会，右三为作者

大衣，就穿了一件马车夫穿的毡毛披肩和斗笠，当他走进开明书店的店堂时，大家都认不出他了，称他是“雪中老渔翁”。抗战时期一代老知识分子就是过着这样清贫的生活，我们也就是与这样一代令人敬佩的知识分子朝夕相处，并形成了极其融洽的编者、作者和读者的关系。

今天，回想起开明书店的这段历史，让人感慨万千。我们多么需要继续发扬开明书店的这种文化精神，保持开明人与著作人共同来创造文化的亲密无间的这种人际关系。这一点或许就是开明书店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 舒元璋)

第三届“炎黄杯”敬老围棋邀请赛落下帷幕 清史专家戴逸教授捧走冠军杯

第三届“炎黄杯”敬老围棋邀请赛，经过3天角逐，于3月6日落下帷幕，清史专家戴逸教授获得冠军，原《新体育》杂志总编辑郝克强获亚军。

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表达对老前辈的敬意和慰问的“炎黄杯”敬老围棋邀请赛，始于1994年，每年元宵节前后举行，至今已历时三届。这一活动，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倡议、主办，炎黄春秋杂志社、天津老干部俱乐部、北京老同志围棋会承办。应邀参赛的多是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的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今年参赛的48名棋手中，最长者已达88岁高龄，最小的也有

68岁。

一直关心这一活动的老将军李德生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者颁奖。

本届组委会主任由中国围棋协会顾问唐克担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冯征和北京老同志围棋会会长陈宇任副主任。

本次邀请赛得到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赞助。提供支持的还有湖北省随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老年报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华龄出版社、北京炎黄食品开发中心和深圳瑞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郝助仁)

黄梅案乾隆帝为何出尔反尔

●傅 贵

乾隆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对贪官污吏打击很严厉的一位皇帝了。他在位60年中，屡兴大狱，诛杀、流放贪官不计其数。就是这么一位疾贪如仇的皇帝，在处理贪官平阳知县黄梅的问题上，反反复复，差一点铸成大错，足令人引以为戒。

一、拔出萝卜带出泥

乾隆四十七年，王禀望、陈辉祖贪黷之案相继败露，乾隆估计到浙江通省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之弊，下谕浙江全面清查核实仓库亏缺，查出各府县仓库钱粮共亏空130余万两。

为了扭转浙江省亏空局面，乾隆帝提出“不欲复兴大狱，惟令设法勒限弥补”的办法，这实际上是割肉补疮，反而为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大开了方便之门。黄梅正是利用这个可乘之机，在平阳大肆侵吞资财，使亏空数额越来越大。黄梅于乾隆四十三年走马上任到乾隆五十一年，有案可稽的亏空数已超过10万两。黄梅肆无忌惮地将仓库的钱粮挪为己有，另一方面以弥补亏空为名，巧立名目，搜刮民财。农民种田已交赋税，黄梅打着弥补亏空的招牌，另行按田亩派捐，每亩50文。同时，再按户征收钱粮。为防止荒年歉收而设立的常平义仓，供灾年平糶散赈之用，黄梅却只收银两，不买粮食。

这样的一只“硕鼠”，“莅位八年，所侵谷部定谷价与勒捐之钱，计赃不下20余万。”（《清高宗实录》第1261卷）这样一个为非作歹的贪官，百姓却不敢告发。平阳县在浙江省最南端，距省府杭州1000多里。天高皇帝远，黄梅更是胆大妄为。

黄梅的劣迹是一位学政偶然发现的。学政窦光鼎在浙江耳闻平阳知县黄梅“母死不欲发丧，特令演剧”之事大为恼火，认为一朝廷命官如此有伤风化，并对此人进行调查，初步调查，发现他“亏空钱粮已逾10万”。窦光鼎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两次上奏乾隆帝。疏劾“嘉兴、海盐、平阳诸县亏数皆逾10万”，“平阳县黄梅假弥亏苛敛，且于母死日演剧”（《清史稿·窦光鼎》）。窦光鼎万没料到，举报黄梅的问题差点将性命送掉。

窦光鼎的这一举报得罪地方官吏与几位钦差大臣。浙江省这几年连年亏空，乾隆帝多次催办，历时4年弥补了100万，仍有30万亏空。乾隆帝大为恼火。浙江省是富省，亏空100多万，至今未弥补完成，而山东经济状况比浙江差得多，亏空200万，仅用2年时间便完成了弥补任务。恰在这时，窦光鼎举报黄梅亏空。乾隆帝看了窦光鼎的奏折，大加赞赏“据实参奏”，并派他会同钦差大臣彻底清查州县亏空。乾隆还对查办此案的三位钦差大臣进行严厉批评，认为他们办事不力，有“欲就案完事”，“有将就了事之意”，勒令他们必须参照窦光鼎所奏各款，逐一详查，不得“回护瞻徇”，否则将“惟三人是问”（《清高宗实录》1252卷）。浙江省亏空一事本来就可敷衍了事，经窦光鼎这么一折腾，捅了漏子，地方官吏徇私舞弊，三位钦差大臣办案敷衍有袒护之嫌，这样地方官吏与钦差大臣对窦光鼎皆十分痛恨，无形中加大了清查黄梅亏空案的难度。

二、漏网之鱼

按说乾隆帝已将窦光鼎褒奖，并委派他会同几位钦差大臣去浙江查办黄梅等亏空案，很快便会查个水落石出，谁知就在窦光鼎信心十足准备走马上任之际，乾隆帝却突然变卦，命他按期完成乡试，不必参与盘查仓库，委派大学士阿桂前往浙江，会同曹文植、姜晟、伊龄阿查办此案。

窦光鼎的举报开罪钦差大臣，阿桂与曹文植等人很快达成默契，开始向窦光鼎发难。阿桂与曹文植不去深入府县查办此案，却当面质问窦光鼎：“你所奏的平阳等县挪移亏空皆逾10万系何人告知？”窦光鼎说：“一时记不起姓名了。”阿桂又问：“你说的黄梅借谷勒派，表演戏等，有何证据？”窦光鼎哑然。而阿桂与曹文植等人对窦光鼎的质问并非是为了掌握更具体的线索，而是别有用心，窦光鼎的如实回答反倒被他们抓住把柄，借机报复窦光鼎。阿桂、曹文植等人将窦光鼎的回答详细向乾隆帝作了汇报。

乾隆帝接到阿桂的奏折不辨委由，不予深究，反倒

觉得窦光鼎是个靠不住的人，黄梅一案连个举报人的姓名皆未弄清楚，“怎么能信口诬人？”于是在一份奏章中批示：此案若不是特派阿桂前往查办，“则窦光鼎与曹文植等人争执板引，即经年之久，办理亦不能完结。”（《清高宗实录》1255卷）乾隆帝对自己派阿桂前去调查甚感满意，他认为窦光鼎与曹文植可能存在个人恩怨，若不是他快刀斩乱麻，这事将旷日持久地无端争论下去。浙江亏空案应尽快结案。乾隆帝对阿桂、曹文植六月十三日的奏章下谕了结此案，浙江省亏空一案大局已定。所有仓库弥补亏空未完之银为25万余两，与福崧初报之数相比，有少无多。这不啻给窦光鼎当头一棒。黄梅却因阿桂、曹文植等人与窦光鼎等人朝廷内部纷争侥幸过关，成了漏网之鱼。

三、明争暗斗

黄梅一案开始似乎受到特别的关注，乾隆帝亲自过问，下谕督查，很快又不了了之，反复无常。乾隆帝已下谕浙江亏空案了结，黄梅一案便无人追究。窦光鼎出于对乾隆帝的一片忠诚，结果乾隆帝并不相信他，无意中得罪的几位钦差大臣对窦光鼎耿耿于怀，并没有因乾隆帝下谕了结浙江亏空案而善罢甘休。几位钦差大臣皆是闻名遐迩的办案能手，这次窦光鼎的奏折令他们出了丑。而这位窦光鼎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乾隆帝也觉得他“迂拙”，却过问起不是他份内的事。几位钦差大臣决计给他点颜色看看。

阿桂、曹文植为整倒窦光鼎精心策划，奏了窦光鼎一本：窦光鼎所说平阳等县挪移亏空等事，经严密查访，并无其事；窦所劾奏的平阳知县黄梅母丧演戏，也无。乾隆帝看了阿桂、曹文植的弹劾，却不象浙江亏空案一样草率了事，反倒认真起来，认为窦光鼎有诬人名声之嫌，严厉斥责窦光鼎劾奏黄梅是“诬人名节”、“实属荒唐”，要窦光鼎：“据实明白回奏。”

窦光鼎万没有想到自己一片忠心，却招来了横祸，乾隆帝非但不信任他，反而站在阿桂与曹文植一边向他发难。窦光鼎满腹怨言，但又不能抗旨，只得如实禀报：黄梅母丧演戏是全县生童所言，平阳，几乎人人知晓，平阳县的钱粮亏空，实际始于黄梅。其久据美缺，纵令其子以各种名义苛敛勒派，通省共知，阿桂等人在处理亏空官员时，没有将黄梅从重办理；钦差大臣派人赴平阳审查时，完全被地方官所蒙欺。为了弄清事实，将“亲赴平阳，查核确实，再行回奏。”

乾隆帝若是真想将黄梅等问题弄清楚理应让窦光鼎去平阳核实，取来证据。乾隆帝非但没有准奏，却将窦光鼎交部议处听候发落。窦光鼎觉得自己被逼上绝

路，与其坐等待毙，不如拼个鱼死网破。窦光鼎不顾乾隆帝反对，星夜兼程赶往浙江平阳，决心将黄梅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以洗自己清白之冤。窦光鼎到了平阳引起浙江新巡抚伊龄阿一阵恐慌，因为一旦窦光鼎将平阳黄梅的案子查实，便等于证明自己工作不力将遭革职查办处分。因而，对窦光鼎派人跟踪，监视他一举一动，另外网罗窦光鼎的罪名向乾隆帝禀报，用乾隆帝来恫吓与惩治窦光鼎。伊龄阿劾“窦光鼎在孔庙大殿招集生员、学监，询黄梅劣迹，咆哮恐吓，勒写亲供。”又劾他在平阳城隍庙“多备刑具，传集书役，追查黄梅贪赃等事”（《赃贿鉴类述》邓安生编著74页）。乾隆帝览奏大怒，斥责窦光鼎“竟系病疯，是以举动颠狂如此”，下谕“将窦光鼎拿交刑部治罪。”（《清高宗实录》1261卷）窦光鼎万没想到自己一片忠心却招来横祸，被押往京城治罪，肃贪者成了罪犯，贪官却逍遥法外。

四、孤注一掷

就在黄梅一伙贪官侥幸过关之时，乾隆帝又收到窦光鼎派使臣送来的上奏及物证。证据确凿，乾隆帝看罢不得不重新下诏：必须彻底查清黄梅贪污一案，释放窦光鼎，回浙江协同办案。

原来窦光鼎知道黄梅案非同小可，钦差大臣一再证实没有问题，唯独自己固执己见触犯了皇帝，若查不出证据来，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为查清黄梅贪污一案，窦光鼎动了一番脑筋。为什么百姓对黄梅恨得咬牙切齿，对他贪污一事传得沸沸扬扬，可钦差大臣派人来查此事，却无人敢告发。“钦差曹文植为了应付差事，曾经派了一个叫海成的司员到平阳查案，在县堂放告三天，没有一人前来告状，海成只有空手回省交差”（周怀宇主编《贪官传》429页）。窦光鼎这次十分谨慎，首先派几位生员到平阳县私访，明查暗访，动员平阳百姓起来揭发黄梅，不能使好人蒙冤，坏人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这一招黄梅没有料到。虽然黄梅父子在平阳一手遮天，百姓不敢上公堂言，但背下向窦光鼎派去的生员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就在伊龄阿向乾隆奏窦光鼎，乾隆决定将窦光鼎交刑部查办之际，窦光鼎派的生员“王以衍、王以铨二人，以门生身份来看他。进至府中，脱下所穿棉袄，以称报答教师识拔之恩。窦光鼎拆开棉袄一看，只见内藏黄梅按亩勒捐时的田契、印票、收据等，总计二千余张”（《赃贿鉴类述》邓安生编著74页）。窦光鼎派人以日行500里的速度，火速将黄梅贪污证据送奏乾隆。乾隆见证据确凿才重新审理黄梅一案。据查，黄梅“莅位八年，所侵谷部定谷价与勒捐之钱，计赃不下20余万。”（《清高宗实录》第1261卷）

纪念长征胜利六十周年

●晓 初

屈指长征六十秋，工农十亿劲犹遒。
草地雪山历万苦，吴起落脚展眉头。
井冈起步豆萁燃，遵义改弦好运筹。
东征西战军心振，直捣酋窟兴九州。

黄梅一案发人深省，为何一件知县的贪污案，查起来却如此艰难，乾隆皇帝出尔反尔，使一件并不复杂的案件一波三折？这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反腐败是历朝棘手的问题，很多皇帝都想解决这个顽症，但皆感力不从心。往往是开始决心大，处理果断，越往后越难，阻力越大，虎头蛇尾，草率收场。

二、法不罚众，敷衍了事。黄梅一案便是如此。开始时乾隆帝对窦光鼎的举报觉得是对朝廷的忠贞，委派他彻底查清。但中途变卦，易人。这反映乾隆帝态度不坚决。主要是因为徇私舞弊，钱粮之亏，已成全国通病。虽然乾隆帝处死了一批贪官，例如浙江巡抚王稟望，此案牵连60多人，处以死刑的有22人。陕甘总督勒尔谨、闽浙总督陈辉祖、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其他如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浙江巡抚福崧，都因贪污处死”（左步青主编《清代皇帝传略》199页），而贪污之风仍未好转。“浙江十一府七十余州县，大部分因官吏中饱私囊而出现钱粮亏空”（周怀宇主编《贪官传》415页）。因而，乾隆帝不想彻底整治只求过得去便可。在浙江亏空问题上，他自然更愿意接受曹文植等人原奏的只有33万两亏空的说法，而不愿采纳窦光鼎彻底盘查的主张。这是乾隆帝出尔反尔的主要因素。

三、官官相护，阻力重重。黄梅一案窦光鼎一披露，开罪了三位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植、刑部侍郎姜晟、工部右侍郎伊龄阿。三位钦差大臣为了维护自己的面

子，必须维持自己作出的结论，否定窦光鼎的说法。因而，当乾隆委派阿桂与曹文植再去核实时，阿桂与曹文植不断向窦光鼎发难，要窦光鼎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就是诬陷，并向乾隆帝禀报：窦光鼎无凭无据，纯属诬陷。浙江新巡抚伊龄阿处处从中作梗，因一旦黄梅一案属实，也就意味着自己失职，因而除监视窦光鼎之外，还向乾隆帝禀报，窦光鼎在平阳搞严刑逼供，以此搅乱视听，用皇权来压窦光鼎。官官层层呵护，黄梅多了几层保护伞。

四、黄梅父子狼狈为奸，在地方形成一个恶势力，为非作歹，百姓敢怒不敢言。这也是黄梅一案久悬未决的一个原因。

窦光鼎疾恶如仇，穷追不舍。后人评价窦光鼎“迂拙”。正是因为窦光鼎“迂拙”，敢于开罪钦差大臣，在皇帝下令不准他插手此事，并以交刑部治罪威吓他，他仍然敢于顶撞皇帝，拼个鱼死网破，才将黄梅的罪证查获并再次启奏皇上。证据确凿，是惩治贪污犯还是整治查办人？迫于无奈，乾隆帝不得不再次下令查办黄梅，释放窦光鼎。这才使黄梅终落法网，窦光鼎免遭不白之冤。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今天反腐败的斗争应从中吸取教训。查办人应学窦光鼎刚直不阿的品格，天皇老子阻拦也要查办，一追到底，使那些漏网之鱼难逃法网。

（责任编辑：赵友慈）

历史上的刘墉

● 王俊义

随着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播出,近日京城内外,街谈巷议,许多人的话题都是刘罗锅——刘墉。

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电视剧,理应遵循艺术规律,运用艺术手段,进行艺术加工,允许虚构、夸张,甚至移花接木,而不拘泥于史实。正因为如此,片头上才醒目标明:“民间故事”,“不是历史”。这就更加引起求知欲强烈的观众提出疑问:历史上有无刘墉其人?电视剧中的刘墉与历史上的刘墉有何不同?笔者作为一名清史研究工作者,不揣浅陋,拟简要谈谈历史上的刘墉。

仕宦之家 父子宰相

历史上确有刘墉其人。这在清代史籍诸如《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先正事略》及当代人编写的《清代名人传略》中,都有刘墉的传记。一些清代的笔记丛刊中更有大量刘墉轶事的记载。从这些历史材料中可知,不仅刘墉本人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著名的官吏,而且其祖父、父亲、侄子等,也都曾是清代的官吏和重臣。

刘墉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卒于嘉庆九年(1805年),字崇如,号穆庵,又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其祖父刘荣,(1656年——1717年),乃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曾由知县累迁至四川按察使,颇有声望,是当时著名的廉吏之一。其父刘统勋(1700年——1773年)为雍正二年进士,于乾隆朝官内阁学士、陕甘总督,还先后任吏部、礼部、兵部尚书,直至东阁大学士,是深受乾隆皇帝信任的重臣,屡委军国重任。曾几次奉派审理官员的贪黷案件,都能秉公处理,所拟判决也多为皇帝所核准,甚至有几名满族显贵经他审理被定为死罪。他敢于上疏直言。年轻时曾奏疏首席大学士张廷玉及亲王纳亲,而以刚正清廉著称。他逝世后,乾隆曾亲临其丧,见其家室甚为俭素,即为恻容,痛感失去“股肱之臣”,并深情表示:“如统勋者乃不愧真宰相。”因赠太傅,谥文正,祀贤良祠(见《清史稿》卷302及《清代名人传略》卷中)。

刘墉本人,受家教影响,早登仕途,乾隆十六年中进士,先后授编修、侍讲,又历任安徽、江苏学政及太原、江宁知府、冀宁道。再累迁户部、吏部侍郎、工部尚书、湖南巡抚、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内阁学士,并曾充任各种大型典籍的总纂、总裁官,提领文渊阁事。嘉庆时,授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于嘉庆九年以85岁高龄无疾而终,“是日犹开筵款客,至晚端坐而终,被赠太子太保,谥文清,与其父刘统勋在清代有“父子宰相”之美誉(见《清史列传》卷26,《嘯亭杂录》卷3)。

刘墉的侄子刘鐸之,也于乾隆四十四年中进士,累官至户部、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死后谥文恭。也算是重要朝臣。其侄孙刘喜海,曾官浙江布政使,又是清代著

名的金石学家。

今存于北京国子监首都博物馆中的“清代进士题名碑”，其中刘家一门祖孙四代：刘荣、刘统勋、刘墉、刘钖之，皆列名于碑上。说其是书香门第，世代仕宦之家，确不虚传。

清廉持躬 名播海内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为了将刘墉的形象塑造得完美，突出表现他的清正廉洁，罚恶惩贪，蔑视权贵，又聪明机智、诙谐幽默、不拘小节，既做官又不像官，还把清代许多廉吏的美德和一些文人名士的故事集中到了刘墉身上，这对于历史上的刘墉来说，当然是一种美化和拔高。譬如剧中描绘刘墉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戏称乾隆“老头子”的故事，本来是纪晓兰（纪昀）的趣闻；再如剧中描绘刘墉曾冒生命危险，犯颜直谏反对清廷滥行文字狱，其实，历史上的刘墉还是文字狱的推波助澜者，乾隆时期一桩有名的文字狱徐述夔《一柱楼诗》案，曾滥杀株连了许多无辜，而这桩大案，就是由刘墉在任江苏学政时举劾而酿成的。这说明刘墉作为清朝要员，他并未能摆脱封建社会中一般封建官僚的阶级属性和历史的局限。

不过，根据有关史实记载，就总体而言，刘墉仍不失为清代官场中的一位清官廉吏，与刘墉同时而稍晚的礼亲王昭梈，在其著名笔记丛刊《啸亭杂录》中曾记载刘墉，“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包拯）比之”。昭梈不仅与刘墉同时，而且互有接触，昭梈曾自述：“余初登朝，犹及见其丰度”，因而昭梈的记述是可信的。这说明刘墉在世之时，就已是妇孺皆知“名播海内”的清官了。《宰相刘罗锅》还贯穿始终地描绘了与刘墉处于对立面的权奸宰相和珅。就历史史实而言，和珅比刘墉小整整三十岁，但他升迁极快，乾隆晚期，其二人确同时在朝居宰相之职。且和珅的声势更为显赫，也更为乾隆所宠信。目前，尚未发现有刘墉直接弹劾和珅的史料，但二者的立身行事截然相反，确形成有形无形的对立。如昭梈所述：“乾隆末，和相当权，最尚奢华，凡翰苑部曹名辈，无不美丽自喜，衣褂袍褶”，而刘墉却“敝衣恶服，徜徉于联中”，还安然自得地说：“吾自视衣冠体貌，无一相宜者，乃能备位政府，不致陨越者何也？寄语郎署诸公亦可醒豁矣”（《啸亭续录》卷2）。这表明刘墉有意识地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提醒同僚僚戒奢靡浮华之风，与和珅形成了鲜明对照。另外，在《清史稿》、《清史列传》中都还记载：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御史钱沅曾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等人的贪污营私事件。乾隆遂命和珅、刘墉、钱沅等同赴山东查办此案。由于国泰是和

珅的亲信死党，和珅在办案中总是暗地庇护国泰，竭力为之开脱罪责，而刘墉与钱沅则不畏和珅权势，秉公执法，尽力查明案情真相。终于据实将国泰等人绳之以法予以处决。使和珅也有口难言，这实际上是公开与和珅对立，只是心照不宣。此外，刘墉在任湖南巡抚时，还曾参奏新化县令的不法之行，并在该地盘查仓库、勤修城垣，革除陋习，抚恤灾民，而颇有政声。这些也都是清官廉吏的作为，而与和珅一类的贪官黠吏明显不同。

要了解刘墉与和珅的对立及其意义，还应将之置于当时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刘墉历仕于乾隆一朝并延续到嘉庆初年。这时，正值清王朝由盛转衰之际，乾隆皇帝继康熙、雍正两朝之后，又将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推向了鼎盛阶段，不愧是封建社会中雄才大略的君主，而以其文治武功彪炳于史册。但作为封建帝王的乾隆，他自诩为“十全老人”，又有其好大喜功、淫逸放荡、挥霍奢靡的一面。他嗜山水成性，游园林成癖。或东巡、南游，或做各种寿典与庆典，动辄大讲排场，挥霍靡费大量国库积累，又不得不于每逢出游或做寿典之际，纵使各级官吏，巴结逢迎，敬献大量金银财宝与各种稀世珍品，一时间上行下效，从中央到地方，都贿赂公行，贪污成风，吏治大大败坏，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使清朝的统治也迅速从鼎盛转向衰败。和珅这个大奸大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土壤中孳生的，和珅此人“面貌俊秀，性情温顺，举止从容，且口齿极其伶俐”，又极善阿谀奉承之能事（见《清代名人传略》），他与乾隆有说不清的特殊关系，深得乾隆的恩宠，因连连擢升，飞黄腾达，迅速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巅峰。他又心怀鬼胎，凭借权势，欺下瞒上，结党营私，把持朝政，聚敛钱财，贪污中饱，以致成为中国历史上富可抵国的贪污元凶。处于此时的刘墉，又与和珅同时在朝，和珅的作为，他当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加之，他阅历丰富，一门几代清官，他深悉官场弊端，也曾不断上奏指出吏治腐败之情况，还多次奉命查办各地贪污案件，个人的操守又较为清廉，正好与和珅形成一清、一贪的不同典型。大大小小的和珅们，给平民百姓造成的苦难可想而知。因而，苦难的百姓，憎恨和珅一类的贪官，也渴望有包青天一类的清官再现。这种情况下，刘墉自然受到正直官吏、文人和广大百姓的喜爱，有关他的生平经历不仅载入正史，又更多地见于野史笔乘。许多有关刘墉的故事，如“乾隆考刘墉”、“刘墉斗和珅”等，长期传诵于民间茶楼酒肆，至今不衰。评书《刘公案》就是记述刘墉的民间文学，这正是百姓的心理愿望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刘墉的许多民间传说，虽有虚构的一面，也并非都是空穴来风。譬如民间都昵称刘墉为“刘罗锅子”，那么，他到底是不是腰弯背驼的罗锅呢？细心的读者从本文所引刘墉自述的“吾自视衣冠体貌，

无一相宜者”来看，便会联想到，其体态显有异常，再联想有些记载说他“鸡胸、背微驼”，似乎刘墉确有些驼背。因此，有些传说讲，他在考进士时，以其才学品德，考官原拟提名其一甲状元。乾隆闻悉，要亲自面试，但一见其罗锅体态，便心生不悦之感，就想难为他一下而除名，因命其以自身形象题诗一首。聪明的刘墉看出皇帝的心意，便随口机智吟出：“背驼负乾坤，腹内满经纶。一眼辨忠奸，单腿跃龙门。丹心扶社稷，涂脑报皇恩。以貌取人者，岂是圣贤人。”这使得乾隆无言以对，不得不点其为二甲一名。

也有史料说刘墉“滑稽自容”，这正说明刘墉具有诙谐幽默的秉性。

上述所列有关史实，说明刘墉不愧是个名播海内的“清官”。《宰相刘罗锅》虽不是历史，但毕竟吸收了大量历史素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历史上的刘墉某些真实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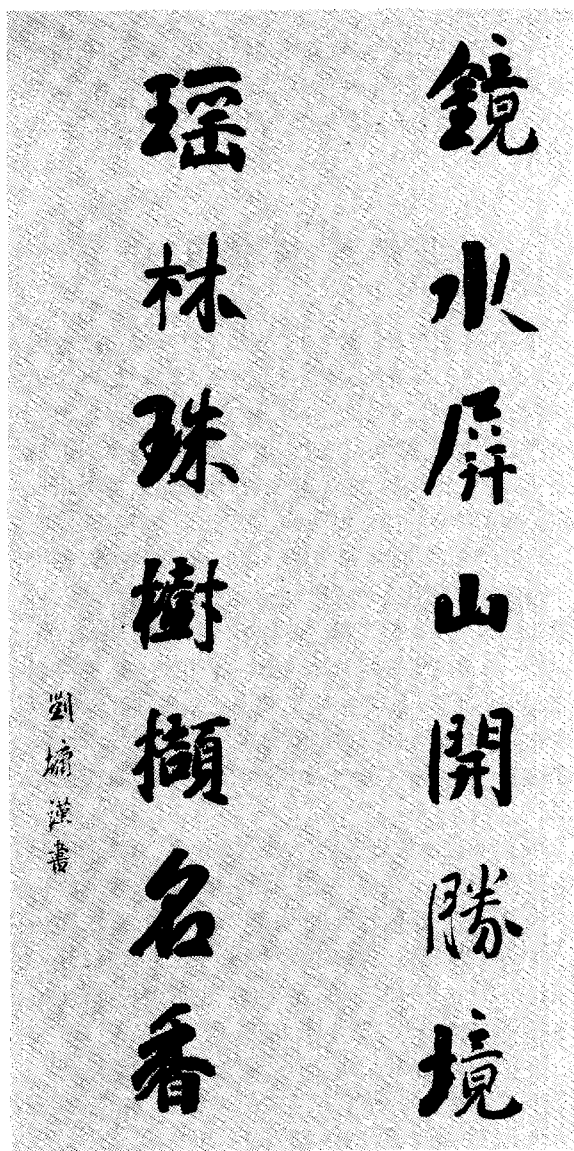
书法名家 墨宝犹存

刘墉不仅作为“清官”，以政声闻名于世，而且还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并有诗文集留世。

他的书法，在清代曾备受推崇，与翁（方纲）、成（亲王）、铁（保）齐名，并列为乾隆时期四大书法家。其死后，有大量墨迹存留于世，其中一部分曾由其侄子刘鐸之以《爱清堂石刻》之名刻印刊行。

最近，首都博物馆又将馆藏刘墉的多件留世墨宝展出，使人目睹之后，情不自禁地赞叹：刘墉确实是名不虚传的书法名家。如展品中有刘墉以行书书写的诗对：“花木一庭得骨气，图书万卷惟直观”，便充分显示刘墉的书法深厚雄劲、气势磅礴的风貌。又如他用卷条形式以草书书写的苏轼的三首诗，更是风姿翩跹，潇洒自如，与苏轼大有灵犀神合之况。因被近代著名书法家张伯英、张海若等视之为“神品”。近代著名书法家、书论家包世臣也评价刘墉的书法为“妙品”。（见包世臣《安吴论书》）。

刘墉除以书法著称外，又有《刘文清公遗集》十七卷，于道光六年刊刻行世。笔者粗略翻阅过此集，看到其中大量是与乾隆及一些达官显贵的“恭贺”、“恭和”之类的应酬之作，无太大社会意义。但也有些诗作，如《行路难》、《读东坡和陶诗》、《拟陶渊明归园田》等，也反映出作者感叹行事艰难，厌倦官场生涯，想过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的心境。还有些诗，如《田家留客》、《田家行》等，则反映出作者对农家生活的了解、



刘墉行书七言联

关注和同情，有一定的人民性。不过，总体说来，刘墉毕竟不是一个卓越有成就的学者和诗人，其诗文中真正具有学术文化价值的诗文并不多见。或许有些史料史实有价值，那就另当别论了。

从对刘墉身世经历，品德操守及其书法专长的介绍中，读者当可大致了解历史上刘墉的基本风貌，限于作者水平及仓促命笔，有疏漏不妥之处，祈请方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责任编辑 洛松）

山西有个“克难坡”

●孙觉民

黄土高原上这个小山村太普通了，一般分省、分区地图上也找不到她的名字。但是由于她的奇特经历，至今仍为国内外各方人士关注。

克难坡本名南村坡，隶属于山西省吉县文城乡。她是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的驻地，是山西省阎管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被称为“首脑部”。据说阎氏以“南村”与“难存”谐音，故避讳而改名“克难坡”。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因一度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和山西省东路总指挥，曾数次莅临，在附近古贤、霖雨等村向晋军高级军官、军校学员讲话，分析抗战形势，宣传中共抗日方针。朱老总当年在古贤村讲话处的大槐树，被命名为“朱德槐”，至今作为革命文物保留下来。朱总还和阎锡山商谈达成协议，设立以副总参王世英为处长的十八集团军驻晋办事处，长期驻克难坡，抗战胜利后撤回延安。刘少奇、杨尚昆、张友清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山西省委机关曾驻附近兰村。由爱国华侨陈嘉庚为团长的南洋华侨慰问团，由爱泼斯坦、赵超构等著名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先后访问克难坡，并从这里转赴延安。记者团发了大量介绍克难坡和山西战场的报道。

抗战期间，中央社播发山西战地报道都冠以“兴集”电头，其中访问朱德、彭德怀、续范亭和山西新军的报道也刊登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兴集”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的代号，阎部进驻克难坡后兴集即指克难坡，兴集战局报道也是当时人们关注的新闻热点。

克难坡位于吉县城西北，距县城60华里。从临汾—延安公路南村口向西经大圪塔、南村盘旋而下，就

是克难坡。克难坡是一个三面临沟河，一面通高原的葫芦状独立山梁，坡下黄河奔腾而过，直泻壶口，涛声雷鸣，静夜可闻。坡南群峰壁立，无路可通。四山沟壑纵横，重峦叠嶂，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据史书记载，这里自古为戍边重镇。东晋前秦（约公元356年）时，姚襄北出平阳，栖居于此，筑姚襄城以图关中。《唐元和郡县志》有“其城西临黄河，控带龙门、孟门之险，周齐交兵之地，城高二丈，围回五里”的记载。200年后的天和六年（公元571年），北周在此抵御齐兵。又约500年后金时杨贞筑牛心寨抗拒元兵。阎氏于1939年令晋军工兵师在此打了千余孔窑洞，构建了克难城，以后在此一住七年之久。

从姚襄城，到牛心寨，到克难城时间跨度千余载。古今兵家都有眼光选择此地筑城屯兵，防守御敌，可见其军事价值之重要。

阎氏抗战初期，标榜“新能存在，旧必灭亡”，故所有各沟均以“新”命名。其中心为一新沟，往东依次为二新沟、三新沟、四新沟、五新沟、往西为西新沟。各沟驻有阎部机关、银行、邮电、报社、出版社、印刷厂、发电厂及随军家属。八路军办事处在三新沟，山西大学，克难中学、小学在一新沟，女子医学校在西新沟。一新沟中央有一块小广场，坐南朝北建有砖木结构的“洪炉台”（舞台），为军政官员朝会之处，现已不存，旧址为农民的打麦场。

阎锡山当时曾有《克难坡感怀》一诗，诗曰：

“一角山城万里心，
朝宗九曲孟门深。

俯仰天地无终极，
愿把洪炉铸古今。”

洪炉台对面，建有“实干堂”（会议室），现为南村坡小学，有学生12人，教师1人。“实干堂”之后几排石窑为阎部军政机关各处办公室。正北面为纪念抗战牺牲将士建有昭义祠，大厅内供抗战忠烈牌位。两旁石柱刻有对联：一为“千秋庙貌光华胄，九曲涛声壮国魂。”一为“百战鼙鼓思壮士，三河袍泽仰英灵。”

“实干堂”之东的“杨经略祠”，有石室三间。石室前走廊两边各有石拱门，门额有“杨经略祠”四字，颜体。门前石柱上刻有对联：“时穷节乃见，身殒道不孤。”上款，“民国三十年”，下署阎锡山题。

据《吉州全志》记载，杨经略名贞，金代吉州人，明昌进士，官吉隰两州便宜经略使，即镇守边防的军事长官。杨贞筑牛心寨以御元兵，围急，命其妻、子、女、婿跳崖或自缢，杨则南望再拜，坠入黄河，全家殉难。杨贞墓、祠均在克难坡。但这个祠堂是阎驻屯后重新修葺改建的。他们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表彰古代英雄，宣扬民族气节，鼓舞当地军民抗日斗志。

实干堂往西有一排青石砌面的土窑，现为民居，其中一孔原是阎氏当时的住所，现在是村委员会主任之家。1985年6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吉县视察，曾到过克难坡，就在这个窑洞的炕上和村民促膝谈心。新华社记者所拍照片发了通稿刊登在各大报上。往南有几组石窑群，为阎部首脑办公开会的地方，石窑群有的呈“一”字形，即一字排列；有的呈“口”字形，即四周石窑，中有天井；有的两排石窑排和排之间有通道，类似现在的筒子楼。每组石窑建筑在门楣上均有题字，分别书写着“克难室”、“竞赛室”、“批评室”、“检讨室”、“合谋室”等，草体，署有阎锡山之名。

绕过这几组石窑群约100米，沟沿上有一个“望河亭”，石砌，也有三间，中间有通道，两旁有耳房。由此远望，可见滚滚黄河及对岸陕北群山。这里视野开阔，地势壮观，在此荒山野岭的地方，当时也算一个景观。亭背面有石刻“北天一柱”四字，楷书，未署名。前边正中有“望河亭”题名，现不存。两旁石柱上有阎锡山署名的对联。其联是：

“裘带偶登临，看黄流澎湃，直下龙门，走石扬波，淘不尽千古英雄人物；”

“风云莽辽阔，正胡马纵横，欲窥壶口，抽刀断水，誓收复万里破碎河山。”

对联是清秀圆润的行书字，有拳头那么大，据说为山西省政府秘书长宁超武代阎撰拟并书写。对联注明写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在此前后，日本侵略军几次进犯晋西隋，并曾到吉县窜扰，在前方抗日将士浴血作战，给敌人以重创。阎氏是在军务倥偬之际到此小憩，看见雄伟的黄河，想到千古英雄，面对日寇进犯，抒发收复失地之情。当然，阎氏和日寇也有勾结，但是他重返太原，统治山西这个“雄心”还是有的。自诩“北天一柱”则有些自吹自擂之意。

克难坡是阎部战时屯驻之地，是这个方面大员的战时指挥中心。解放后，文城乡政府机关、学校一度驻此，乡政府迁文城后，只有10余户村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断有国内外游人及台港澳同胞前来观光，对这一战时遗址的研究，正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本文所说的克难坡现在称南村坡，作为历史史实，其实恢复克难坡这个名称也未尝不可。

（责任编辑 洛松）

邮购启事

近日不断接到读者来信，反映在当地邮局订不到《炎黄春秋》。特敬告各地读者，如当地邮局不能订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函购。每月一期单价4.00元，补购任何一期或补订一个季度、半年、全年均可。免收邮费。

另本刊1995年合订本（总34—45期）已装订完毕。全部精装，每部47.00元，一律免费挂号邮寄。

请您汇款时务必将姓名、地址、邮政编码书写清晰，以免误递。

本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编：100802

电话：6170955

联系人：杜习



还历史本来面目

——关于“何世桢是爱国者”的反映

本刊今年第1期刊出何祚榕所写《被“选入”汪伪中央的何世桢是爱国者》后，上海市委统战部离休老干部陈一鸣致函作者并编辑部，赞成何祚榕的观点，并随函寄来他写的《一场反对日汪的群众运动》一文的复印件（原载1995年政协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政协之友合编的《血肉长城》一书）。文中说，抗战初期，何世桢接受最高国防会议的任务，要他利用孙中山先生旧日的日本友人关系，对日本做分化工作。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亲自拉拢何世桢，何不同意汪投敌，并组织了反汪活动。汪伪召开“六全大会”并将何列入未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何予以拒绝并抵制参加会议。但当时人们误以为何已投伪。实际上何一直坚持了民族气节。陈一鸣在文中还特别说明：“由于近几年来我从事上海学生运动史的工作，在一些老同志和持志（学院）老教师的帮助下，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弄明了历史真相”。

在此之前，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的《汪精卫》一书的作者黄鹤逸，也曾致函何祚榕称：因掌握资料所限，在《汪精卫》一书中错把何世桢误写为附敌的汉奸，是不对的，并表示该书如得机会再版，一定给以改正。

《赵登禹将军事略》一文的 几处订正

本刊去年第5期发表苗润青《报国敢云天职尽——赵登禹将军事略》（以下简称“事略”）后，先后收到读者赵勇田、金云祥同志的来信，对“事略”中的失实处提出批评。

赵勇田同志指出的“事略”失实主要有：

“事略”称：“赵登禹是山东省巨野县人”。此说不对。赵登禹是山东省菏泽县赵楼村人（旧称曹州人）。

“事略”称：赵登禹“1916年投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此说有误。应是：1914年初秋，刚满16岁的赵登禹投奔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

“事略”称：“赵登禹的老家叔叔赵学礼、老家兄弟赵登榜也都先后投冯玉祥部当兵”。这里颠倒了赵登禹

与赵学礼的叔侄关系：赵学礼不是赵登禹的叔叔，而是赵登禹的侄子。“兄弟赵登榜”，应是哥赵登尧。

“事略”两处提到“万福林部”，“林”字应是“麟”字。

“事略”称：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暗中从东北调来大量精锐部队”。确切地说应该是：暗中从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本土调来大量精锐部队。

“事略”称：1937年“7月29日……赵登禹不幸阵亡”，“时年47岁”。众多史书记载：赵登禹为国捐躯是1937年7月28日，时年应为39岁（赵1898年生）。

赵勇田同志的信中，还提到赵登禹将军的女儿赵学芬的意见，希望对于历史人物的介绍，无论作者和编者，都要持慎重、求实的态度，有错必纠，以免以讹传讹。

作者苗润青接到本社转去的读者的批评后，致函本社，诚恳接受赵勇田和金云祥两同志的批评，承认所指谬误，有的是自己疏忽造成的，有的是引用资料时“不够缜密，未加详察”。苗润青同志在来信中两处讲道：深知事略中的谬误给贵刊带来的麻烦，为此，向贵报诸同仁、向广大读者、向赵登禹将军的后人致以歉意。

原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 未在张国焘“左”倾路线下遭杀害

本刊去年第4期《朱德的大哥朱代历之死》（作者朱兆平）一文中说：1933年，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在张国焘“左”倾路线下，遭杀害。

此文刊出后，我编辑部接到四川省巴中地区林业局孙跃哲、四川省宜宾教师进修学校邓沛等同志的来信，指出上述说法不实。他们根据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的资料，扼要介绍了熊国炳的经历和逝世情况：

熊国炳，别名熊廷南，出生于四川省万源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夕，在中共党员的影响下，熊国炳积极参加侦察敌情、发动群众及给红军带路。后又组织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建立乡苏维埃政权，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2月，熊国炳当选为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此时，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杀害了大批高级军政干部。由于熊国炳出身贫苦，又无文化，对张不构成威胁，故未遭杀害。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时，熊国炳随军行动。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熊国炳随西路军西渡黄河，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去联系，化装成难民，躲避在甘肃酒泉一个偏僻山村的农民家中养伤。后化名“张炳南”，在酒泉乡村生活了20多年，于1960年病逝。

新年新春的祝贺和期望

——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新春联谊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首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元旦刚过，新春又至，虽处寒冬，腊梅独俏。在此除旧迎新时刻，我代表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代表北京炎黄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各位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真挚的问候，并预祝大家过一个祥和欢乐的春节，在新的一年里工作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自1990年成立以来，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为己任，并在收集、整理中华民族文化史料，研究、探讨中华传统文化重大课题，编纂出版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书刊；协同有关方面进行中华历史文物的保护、修缮，以及有重大意义的中华文化纪念工程的兴修，促进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文化交流，增进世界人民的友谊等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又团结了一大批包括在座各位在内的热心研究和弘扬炎黄文化的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和各界人士，在海内外受到广泛的重视与赞誉。

炎黄事业是一项承启上下五千年，功在千秋，利在当今的民族大业。弘扬中华文化，塑我国魂，是整个民族和全部华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它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关系到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关系到祖国的统一大业。特别在当今时代，海峡两岸切盼统一，中华民族为争强二十一世纪，更需要继承和发扬先祖的创业和拼搏精神，需要用中华先祖凝聚着天下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正如江总书记指出的：“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是实现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

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正是遵循这一宗旨，为弘扬炎黄文化，再塑中华精魂努力拼搏和奋斗，并在调查、研究了众多炎黄史料，依据历代史家、近代学者的考证，依据现今所存炎黄文化遗址的基础上，规划了“中华圣地炎黄城”，并延请了中国建筑研究设计院建筑历史所进行设计。总体规划包括九九八十一个景点，七十五个配套设施。它集寻根、朝圣、拜祖、旅游、度假、商贸为一体；将历史性和现实性、参与性和观光性、文化性和娱乐性相结合，堪称弘扬炎黄文化的载体和凝聚炎黄子孙的基地。

三年来，面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形势，虽然我们也面对种种困难，但我们矢志不移；虽然我们也坎坷曲折，但我们努力拼搏。值得欣慰的是，在我们为炎黄事业奋斗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各级政府、各位领导与各位前辈的支持，也得到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认同与支持。

开发新郑炎黄文化资源已列入河南省“九五”计划，1995年12月在泰国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华商大会得到了海外华人的高度赞誉和强烈反响。他们盼望中华圣地炎黄城早日建成，纷纷表示愿意和我们共建炎黄城，并愿成为中华圣地的第一批会员，与会的二十多个国家的中华商会积极参与并愿做中华圣地会员证书的代理。这说明，“炎黄子孙”与“龙的传人”这一主题，在华人心中，是多么地崇高和神圣，是何等地自豪和永恒！

当前，对中华圣地修复建设委员会的组建事宜，对中华圣地会员证书的发行事宜，以及中华圣地炎黄城的总体规划设计以及动工兴建，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我们殷切希望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与各位朋友，参与这项伟大的事业。

北京炎黄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工作基地，她肩负着沟通信息、疏通渠道、加强联系、宣传造势、招商引资等方面的工作，值此迎春盛会之际，北京炎黄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揭幕开业，在向各位领导和前辈拜年的同时，更希望得到您和各界的关怀和支持。

尊敬的首长、各位领导、专家和朋友们！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悠久的，中华民族的未来是辉煌的，炎黄文化永远勃发着无限的生机。让我们一道在弘扬炎黄文化、振奋中华精神的大旗之下，共同完成中华圣地炎黄城的建设大业，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光辉的未来！

谢谢各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华鹏

北京炎黄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一九九六年二月九日

炎黄春秋



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一家



“中国女婿”李敦白一家

谋杀刘少奇的“湘江案”泡汤记

邹韬奋在日伪鼻子下脱险

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国民党元老陈诚

“中国女婿”李敦白

历史上的刘墉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00元